

目录

[前言 羅密歐？ 13](#_Toc54606166)

[第一章  序言報告 17](#_Toc54606167)

[第二章  馳赴柏林 21](#_Toc54606168)

[第三章  跨越圍墻 35](#_Toc54606169)

[第四章  IM“指導教授”? 42](#_Toc54606170)

[第五章 IMV“米夏拉” 46](#_Toc54606171)

[第六章  IM“舒爾特” 57](#_Toc54606172)

[第七章  IMB“史密斯 59](#_Toc54606173)

[第八章 IM“R太太” 62](#_Toc54606174)

[第九章 波瀾壯闊在波蘭 64](#_Toc54606175)

[第十章  禁止入境黑名單 69](#_Toc54606176)

[第十一章  浮士德群像 71](#_Toc54606177)

[第十二章 冷戰終結 85](#_Toc54606178)

[第十三章  檔案效應 88](#_Toc54606179)

[第十四章 英倫諜影 92](#_Toc54606180)

[第十五章  檔案封存 100](#_Toc54606181)

[修訂后記 103](#_Toc54606182)



理想國譯叢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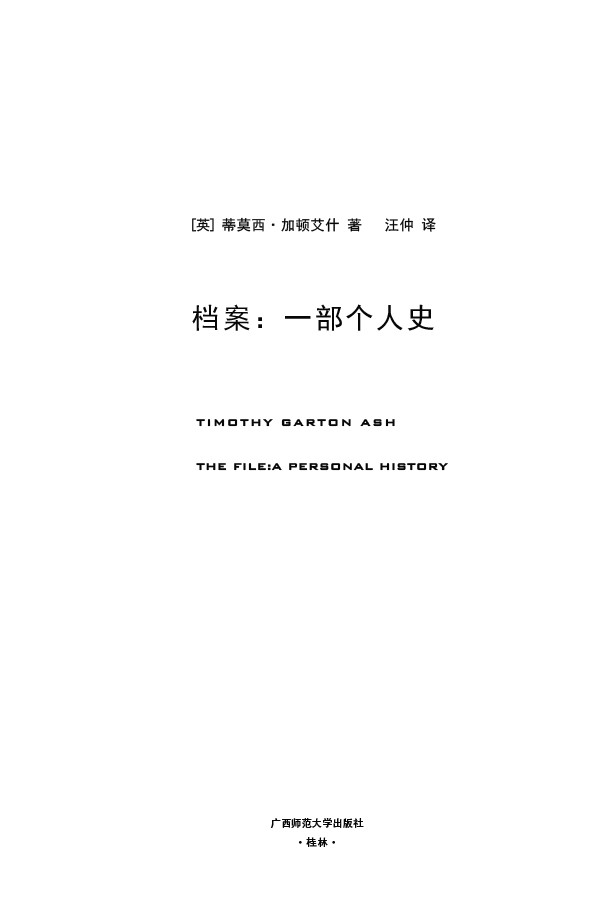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 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 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THE FILE: A PERSONAL HISTORY

by TIMOTHY GARTON ASH

Copyright©1997, 2009 by Timothy Garton As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檔案:一部個人史/(英)加頓艾什著;汪仲譯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9(理想國譯叢)

書名原文: The File: A Personal History

SBN978-7-5495-7048-5

Ⅰ.①檔…Ⅱ.①加…②汪… Ⅲ.①紀實文學-英國一現代

Ⅳ.①I5655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172153號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桂林市中華路22號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發行熱線:010-64284815

山東臨沂新華印刷物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臨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新華路郵政編碼:276017

開本:965mm×635mm 1/16

印張:16.75 字數:199千字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價:5800元(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系調換。

導讀

出賣作為一種美德

梁文道

1980那一年，蒂莫西•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還是一個在東柏林當交換生的英國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當時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來，把衣服脫光，走到面對街道的窗戶旁邊拉開窗簾，接著又開了足以點亮整個房間的大燈，然后才回到床上。這個舉動似乎沒有什么太深的含義，頂多是年輕人那種沒來由的浪漫罷了。可是近二十年后，已在牛津大學教授歷史，同時替英國各式報刊撰寫評論及報道的加頓艾什，卻對這件小小的往事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懷疑安德莉其實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安插在他身邊的線人；她那天晚上脫衣服開窗簾，為的是要方便外頭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這種疑慮，是因為他看到了當年東德國安部(Ministerium fur Staatssicherheit,簡稱MfS,更常為人所知的是其俗稱“斯塔西”，Stasi)的一份檔案。這份檔案的封面蓋著“OPK”三個字母，意思是“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Operative-Personenkontmlle)。而“作戰性個人管制”，根據東德的《政治作戰工作辭典》，它的意思是“辨識可能違反刑法，可能抱持敵意負面態度，或可能被敵人基于敵對目的而利用的人”（德國人似乎對任何事物都能給出精確定義，就連情報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才會有這么古怪的辭典）。此類管制的目的，最簡單的講法，就是要回答“誰是誰”的問題。而關于加頓艾什的“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就是當局對這個問題的答案。

類似加頓艾什手上這樣的檔案還有很多，將文件夾豎排起來，可以長達18公里。這也難怪，“斯塔西”大概是人類史上網絡發展得最龐大也最嚴密的國安機構，其正式雇員就有97000人，非在職的線民更有173000人。若以東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個成年人當中，就有一個和斯塔西相關，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間接為它服務。在這樣的一張大網底下，當年東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謂無可逃于天地間。“斯塔西”如此規模，不只蘇聯的“克格勃”遠比不上，就連納粹時代的“蓋世太保”也要自嘆不如。東德的這一系統實在堪稱完善，至少理論上它應該很清楚每一個國民“誰是誰”，知道他們在干什么想什么。饒是如此，最后它也還是逃避不了傾覆的命運，這是不是一個教訓呢？這個教訓的第一個意義是，再巨細無遺的維穩體系原來也無法挽救一個腐敗的體制（掌握一切的“斯塔西”當然知道東德的腐敗，它的頭目梅爾克[Erich Mielke]便曾親口對下屬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腐敗的國家”）。它的第二個意義是，原來東德干得還不夠出色，它們的工作應該再聰明一些細致一些才對。至于哪一個教訓更加重要，這就得看要領會這份教訓的人是誰了。說來奇怪，雖然“斯塔西”清楚東德的腐敗，但它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造成腐敗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敗可能還是比普通的權錢交易更加深層的腐敗。那種腐敗就是人際關系與社會道德的腐敗。

東德垮臺之際，柏林有一大群市民沖向國安部大樓，想要占領這座掌握一切國民信息因而也叫一切國民恐懼的建筑。建筑里頭則是一群手忙腳亂的特工，他們正趕著銷毀最機密的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絕大部分檔案都被留了下來，現歸“高克機構”（Gauck Authority)管理。這個機構負責保存“斯塔西”留下來的文件并將之分類，允許所有前東德國民調閱有關自己的檔案。

后果顯然易見，100多萬人提出申請，想要看看“斯塔西”有沒有關于自己的檔案，其中又有近50萬人確實看到了這種材料。在這些材料當中，他們就像看老日記似的重新發現了自己，并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謂“人家”，指的是他們的同事、同學、鄰居、朋友、親人，乃至于最親密的伴侶。于是有學者失去教職，因為他曾在過去向當局舉報同行，害得后者失業；有人被迫遷居，因為他曾偷窺狂似的監視鄰家的一舉一動；有些人離婚，因為他的另一半正是當年害他坐牢的“斯塔西”線人；更有些人自殺，因為他們的子女發現自己竟然被父母出賣，自此斷絕關系。

在這種情形底下，加頓艾什懷疑起自己的前女友，實在是情有可原。那時他正在牛津攻讀史學博士，論文題目是第三帝國時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為了搜集資料前赴東柏林留學。等他到了之后，便發現歷史即在眼前，遂把關注范圍移向當代。后來他以研究和評論德國及中歐事務聞名，得知“斯塔西”密檔公開，自然想要回來查看自己是否屬于“作戰性個人管制”的范疇，同時加深了解他所喜愛的德國，以及看看當局對于“他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取得檔案之后，他以熟練記者的技巧逐一回訪監視過他的線人（也就是他當年的朋友）和負責聯絡那些線人的“斯塔西”官員；又以歷史學家的素養細心檢索相關文獻，解釋其中的出入與歧義。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就是《檔案》（The File)這本書的主線。它是本奇怪的自傳，在自己的日記和記憶，以及他人的秘密報告筆錄之間穿梭來回。它又是本微觀史述，恰如加頓艾什自言，為那個前所未見的系統和在它管轄下的社會“開了一道窗口”，令讀者得以稍稍掂量“警察國家”這四個字的實際分量。

不難想象這本書以及其他一切近似體驗當中的情緒：發現事實之后的震驚，被出賣之后的痛苦，被背叛之后的不信任，被揭發之后的沮喪、自責與否認。所以很多德國人都說“夠了”，應該停止“高克機構”的檔案公開工作，它已經毀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關系，過去的且讓它過去，歷史的傷口就留待遺忘來修復好了。不過，這并不是今日德國人做事的風格，何況這是個在短短幾十年內經歷過兩次極權統治的國家。包括加頓艾什在內的許多學者都認為，東德之所以能夠建立起如此驚人的秘密警察系統，是因為它有一個在納粹時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礎，所以德國不認真清算自己的歷史是不行的。中國人總是喜歡比較德國和日本，夸獎前者坦白對待納粹的罪行，卻又總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們近二十年來在處理東德歷史上的細致（盡管很多德國人還是認為做得不夠徹底）。

與其抱怨“高克機構”的做法過火，不如想想這一切問題的源頭。難道沒有它，前東德的百姓，就會繼續擁有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嗎？不，他們很可能只會繼續猜疑下去。就像書里頭一個老頭的告白：“至少我知道怎么寫遺囑了。我原本以為我的女婿在背后打我的小報告，所以一直告訴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給他，就罪該萬死。但是現在我知道我還是該留給他了。”除了這個老人，當年到底還有多少人懷疑過自己身邊的人呢？這種事情并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會不存在的。“斯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對付自己國民的秘密警察，既秘密又顯眼，它以秘密的行動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種下恐懼的種子。恐懼，乃是這種體制的基石。它的雙重性質要求國民也要以雙重態度來對待它，在表面上愛它愛得要死，在心里則怕它怕得要死。結果是一群表里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個體；這就是它的深層腐敗，東德政權大廈的散砂地基。

對“斯塔西”而言，恐懼不只是用來對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還是吸收線人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加頓艾什就找到了一個純粹出于恐懼才來監視他的線民。這人竟然是個英國人，一個老共產黨員，在東德娶了太太，住了下來。“斯塔西”大概覺得他的身份很好利用，于是開門見山地威脅他，謊稱“他們從西柏林的一本有關西方情報組織的書中發現了他的名字”。這么一來，他就得借著合作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則的話，他會被驅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遠分離。

又有些時候，恐懼出現的形式并非如此具體。比方說這本書里頭其中一個色彩最豐富的線人“米夏拉”，面對加頓艾什二十年后的質問，她坦承自己的恐懼：“在內心，每個人都嚇得半死。因此，大家都會想方設法接觸體制對自己的懷疑，表現出合作的態度，喋喋不休，將所有無害的細節都說了出來。”這句話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點出了一種更廣泛的恐懼，似乎每一個人都會暗暗擔心體制對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當局眼中到底是不是個危險的人。于是一旦他們真的找上門來要你合作，你反而變得放心了，并且想用積極的表現去換取生活當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類本能需要，正是“斯塔西”以及它所捍衛的體制成功的原因。還是這個“米夏拉”，身為畫廊經理，她時時需要出國看展交易，這本是很自然的職業需要；然而，在人民沒有出入境自由的東德，它就成了特權與誘餌。和“斯塔西”合作，“米夏拉”可以換取這種在很多外國人看來十分尋常的權利，去美國看展覽，到西歐去開會。和當局合作，得到的并不一定是什么錦衣華服，不一定是什么權勢地位；在這種體制之下，合作所換來的往往就只是這樣或那樣的“方便”而已。

一旦開始合作，那就是一條灰度無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難知道界限何在，很難把握話該說到什么程度才不會太過違背自己的原則與良知。有些線人會試著把“斯塔西”要求的報告變成自己“從內部發揮影響”的手段，長篇大論地分析局勢，與負責跟自己接頭的特工探討國家政策的問題。可是到了最后，對方真正關注的其實全是他自以為不重要的“無害”細節，比方說某某人最近在什么地點說過什么話，某某人又在什么時間見過什么人；他們不必你為國家出謀獻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實資訊，一些能夠讓他們在既定框架下分類整理、詮釋分析的材料。多數線人都以為自己“覺悟”很高，給出來的東西不會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斯塔西”將會如何使用和判讀你那些不傷大雅的信息？“米夏拉”在和接頭人談話的時候便常常以為自己只不過是在聊天，“以表現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誠的公民、‘事無不可告人者’。所以她說的都是一些閑話。或許她從來沒有想到，所有她說的一切，都被如此詳細地記錄成文字”。對方也許只不過是輕松地問一句：“你繼女最近怎么樣了？”她則輕松地招出繼女有個西德男友；如此閑散的家常話，可能會帶來她想也想不到的后果。

雖然大家活在同一個世界，面對同一組事實，但每一個人理解這個世界和構成它的事實的角度是不同的。“斯塔西”這類機構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辨識敵人，找出引致風險的因素，于是他們解讀事實的心態就會變得很不簡單了。加頓艾什去“米夏拉”管理的畫廊欣賞包豪斯展覽，對這個展覽十分著迷，由是不免奇怪這么好的展覽為什么不出畫冊。很自然的問題是不是？可是你看“米夏拉”她們怎么理解：“這問題的提出暗示，‘G.’（加頓艾什的代號）希望能夠從‘IMV’（‘線人米夏拉’的簡稱）口中聽到，因為文化政策的關系，這種事是不可能的之類的話。”

加頓艾什是英國人，這個身份在“斯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壞人”，他就會越看越有“壞人”的樣子，其一言一行全都只會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須專案處理專人負責。于是一場朋友間的暢談打成報告交上去，“斯塔西”人員會用慧眼看出它的“軍事作業價值”。加頓艾什在東德四處走動，找人聊天，有時會透過已識的朋友來結識人，有時以英國媒體記者的名義提出正式采訪，又有些時候則回到留學生的身份；在“斯塔西”看來，這種本來很正常的多樣身份（誰沒有好幾個身份？誰不會用不同的身份來對應不同的處境與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加頓艾什“具有高度嫌疑”。在他們的檔案記錄里頭，他們還會把加頓艾什替之撰稿的英國雜志主編稱為他的“長官”。看到這個“有非常明顯的上下等級含意”的詞，加頓艾什不禁感慨：“他們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長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們竟將這種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讀出雷暴的預示，無事變成小事，小事衍成大事；每一個人背后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個行動背后都別有深意。這就是“斯塔西”這種機構看待世界的原則。

加頓艾什在這本書里表現得相當坦誠。正因如此，讀完之后，我居然感到當年“斯塔西”對他的懷疑原來還是有些道理的。因為他就像當年那些典型的西方記者，同情他們在東歐認識的異見分子，在能力范圍內會盡量協助他們。他又是那種典型的公學出身的牛津人，向往過有著輝煌傳統而又優雅神秘的英式間諜生涯，一度報名加入"MI6（"軍情六處”，英國對外情報單位），甚至因此在英國安全部門留下了“自己人”的檔案。這人分明就想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臺，而且就連英國相關部門都誤會他是能和他們合作的“朋友”，“斯塔西”監控他又有什么錯呢？

是的，他們沒錯。問題只在于“斯塔西”不只監控有嫌疑的外來人員，他們還監控自己人——每一個東德國民。就像曾經引起關注，拍得十分好萊塢的那部電影《竊聽風暴》（直譯為《他人的生活》）所顯示的，這本書里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會被監視，也都可能正在監視他人；于是他們難免就得出賣以及被出賣。被出賣的人，有時候可能只是個侍應，因為服務態度不善，充當線人的客人就把他寫進報告，利用這小小權勢惡意報復。更常見的情況則是出賣身邊的朋友，工作上的伙伴，隔壁家的少年，甚至自己的女婿。一個人該當如何理解這林林總總的出賣？難道出賣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愛情、背叛親情……）也能夠是對的嗎？加頓艾什注意到凡是受訪的涉外情報人員，皆能理直氣壯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為去外國當間諜，還在傳統的道德框架之內，是無可置疑的衛國行動。可是反過頭來看管自己人的線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對質問，他們往往要不就是否認，要不就是轉移責任。

自古以來，幾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賣看作德目的價值體系。尤其中國，例如孟子那句名言：“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蹤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沂然，樂而忘天下”，可見儒家絕對不能接受對任何天然情感聯系的背叛。所謂“大義滅親”，可能是后來皇權時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于少數個案而已。只有到了20世紀，我們才能見到這么大規模的告密、揭發、舉報和出賣，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它們非但不可恥，反而還很光榮，因為整套價值必須重估，在嶄新的最高原則底下，它們破天荒地成了美德。于是每一個告密者都能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義凜然的理由，讓自己安心；每一個出賣過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后多年把往事推給那個時代的道德錯亂。

本書人物表

舒爾茨女士(Frau schulz):高克機構管理人員

鄧克爾女士(Frau duncker):高克機構管理人員,舒爾茨女士的繼任者

安德莉(Andrea):作者前女友,化名

克勞蒂亞(Claudia):作者前女友,“小軟帽”

詹姆斯•芬頓(James Fenton):作者好友,詩人,英國《衛報》特派撰述員

弗里德里希(Friedrich):作者的記者朋友

馬克•伍德(Mark Wood):路透社記者

維爾納•克雷奇爾(Werner Kratschell):新教牧師、作者在東德的朋友,“山毛櫸”

勞倫茨•丹普(Laurenz Demps):作者在東柏林洪堡大學的導師

艾伯哈德•豪夫(Eberhard Haufe):德國文學學者,作者在魏瑪時拜訪過他

瓦姆比爾博士(Dr Warmbier):萊比錫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講座講師,曾批判豪夫博士,后被逐出學校

“史密斯”(‘Smith’):負責跟蹤本書作者的線民之

“舒爾特”(‘Schuldt’):負責跟蹤本書作者的線民之一

“米夏拉”(‘Michaela’):負責跟蹤本書作者的線民之

“格奧爾格”(‘Georg’):“米夏拉”的丈夫,國安部聯絡人,曾在路透社工作“R太太”:負責跟蹤本書作者的線民之一

愛麗絲(Alce):“格奧爾格”前妻,化名“紅麗絲”(‘Red lizzy’),曾為著名蘇聯間諜金姆•菲爾比( Kim Philby)的第一任妻子

文特少尉( Lieutenant Wendt):國安部官員

馬可•“米沙”•沃爾夫上校(colonel-general Markus’ Mischa’Wolf):國安部國外情報局HVA的領導

維爾納•格羅斯曼( Werner Grosmann):國安部國外情報局HVA的領導,沃爾夫的繼任者

黎瑟少校( Major Risse):國安部官員

考爾富斯中校(lieutenant-colonel Gerhard Kaulfuss):國安部官員

弗里茨上校(Colonel fritz):國安部官員

金策爾少尉(Lieutenant Kuntze):國安部艾福特辦公室官員

艾克納上校(Colonel Klaus eichner):國安部資深官員

馬雷施中校(lieutenant-colonel Maresch):國安部艾福特辦公室反情報組主任

克雷奇中將(lieutenant-general Kratsch):國安部官員

沃爾夫岡•哈特曼(Wolfgang Hartmann):國安部內線委員會領導人

庫爾特•蔡澤維斯(Kurt zeiseweis):國安部官員

埃利希•梅爾克(Erich mielke):國安部部長

關于部分人名的說明

本書下列名字為化名：安德莉、克勞蒂亞、”俗氣哈利”( Flash Harry)、鄧克爾女士、R太太。三位線人以他們的國安部代號出現:“米夏拉”、“舒爾特”和“史密斯”。如果有人想按圖索驥揭露這些名字后面的真人(對于本書的幾個案例來說這顯然并非難事)，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我奉勸他們最好不要這樣干。

# 前言 羅密歐？

“早安，”活力充沛的舒爾茨女士說，“你的檔案很有趣。”說著,她便將一個牛皮紙色的卷宗交給了我。檔案足足有兩英寸厚，卷宗上的橡皮圖章蓋上一排字：OPK-Akte，MfS，XV2889/81。下面，則用手寫體整齊地寫著：“羅密歐”（Romeo)。

羅密歐？

“是的，你的代號。”舒爾茨女士咯咯笑了起來。

我坐在舒爾茨女士的小辦公室里一張仿木塑料桌前。這里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特務機構的檔案管理局所在地。我一面打開牛皮紙夾，心中不由自主地想起當年在東德生活時發生的一段怪異插曲。

1980年，當我還在東柏林做學生時，有一天晚上，我和女朋友回到我在普倫茨勞貝格區威廉明尼公寓租的破舊房間里。房間的陽臺上，有一個大大的法國窗戶，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觀——如果沒有窗簾的話，外面的人也可以把里面看得一清二楚。

正當我們相擁在我那張狹小的床鋪上時，我的女朋友安德莉突然離開我，褪光衣服，走到窗戶旁邊，打開紗窗簾。然后，她把房間的大燈打開，回到我的身邊。如果這件事發生在牛津之類的地方，我或許會對她打開窗簾和大燈的舉動稍感奇怪。但是，因為是柏林，我也就沒有多想。

但是，當我知道檔案這回事后，事情就不同了。我想到了我們在一起的那一次，并開始懷疑安德莉是否替國安部（即俗稱的“斯塔西”，Stasi)工作，她是否故意打開窗戶，好讓對街的人可以照相。

或許那些照片就藏在檔案夾里，已經先被舒爾茨女士看過。她剛才不是說“你的檔案很有趣”來著？

匆促間，我翻閱完所有的夾頁，很寬慰地發現里面沒有諸如此類的照片，安德莉大概不是線民。不過，檔案中的其他東西吸引了我的注意。

例如，里面有一份觀察報告，對我在1979年10月6日16:07到23:55至東柏林一游的行蹤交代得清清楚楚。國安部當時給我的代號比較不浪漫，只是一個數字：246816

16：07

“246816”離開腓特烈大道車站前面穿越道后，便進入監視范圍。被觀察者走到前站報攤，買了《自由世界》(Freie Welt)、《新德國》（Neues Deutschland)、《柏林時報》(Berliner Zeitung )等多份報紙。接著，該目標（就是我）在

車站內游移張望。

16：15

在前站，“246816”與一名女性打招呼，握手，相互吻頰。此女代號為“小軟帽”。“小軟帽”攜帶一深棕色肩袋。兩人離開車站，一面說話，一面走到布萊希特廣場上的柏林劇團。

16：25

兩人進入餐廳

甘尼曼餐廳

柏林中心

造船廠街旁

大約兩分鐘后，被觀察者離開餐廳，經過腓特烈大道和菩提樹下大道，到達歌劇院咖啡廳。

16：52

“246816”和“小軟帽”走進餐廳

歌劇院咖啡廳

柏林中心

菩提樹下大道

他們在咖啡廳坐下，喝咖啡。

18：45

他們離開咖啡廳，赴貝貝爾廣場，從

18：45直至

20：40

兩人饒有興趣地觀賞東德建國三十周年火炬游行。隨后，“246816”與“小軟帽”沿菩提樹下大道和腓特烈大道，到造

船廠街。

21：10

兩人進入甘尼曼餐廳。在餐廳內，兩人不在觀察范圍之內。

21：50

兩人離開該美食機構，并直接前往腓特烈大道車站前穿越道。

23：55

兩人進入車站。“小軟帽”資料移至第六處進一步確認身份。監視結束。

       “246816”人身描述

性別：男

年齡：21至25歲

身高：大約1.75米

身材：精瘦

頭發：暗金色

短

服裝：綠夾克

藍色馬球套頭高領衫

棕色燈芯絨長褲

       “小軟帽”人身描述

性別：女

年齡：30至35歲

身高：1.75~1.78米

身材：苗條

頭發：中等金色

卷發

服裝：深藍布外套

紅色小軟帽

藍色牛仔褲

黑色皮靴

配件：深棕色手袋

我坐在仿木桌前，驚訝于有人竟然精準地為我重建起我生命中的一天，而且那寫作方式，令我聯想到學校的作業：每一個句子都要有動詞，而且故意使用一些不必要的夸張詞語，例如：“美食機構”。我還記得那間金紅相間的邋遢餐廳，甘尼曼，那間豪華的歌劇院咖啡廳，三十周年游行隊伍中那些穿藍襯衫、臉上長著青春痘的年輕士兵，和他們手上高舉著的煤油火炬，如何在神秘的夜晚中，發出閃耀的光芒。我再度聞到東柏林那獨特的味道，一種混合著老式家用煤球爐的排煙、二沖程“拖拉笨”（Trabant，編按：即“人造衛星”之意，是當年東德的國產車）小型車的廢氣、東歐廉價香煙、潮濕的皮靴和汗水的味道。但是，我卻無法想起，她，我的小紅帽，到底是誰？或許我不該說她小，因為她有1.75米至1.78米，幾乎和我一樣高。苗條，中等金色卷發，30至35歲，黑皮靴？我坐在那兒，在舒爾茨女士詢問的目光下，不禁對自己的過去，油然生出一種尷尬的不忠感。

當我回到家一-沒錯——在牛津的家以后，翻閱了當時的日記,終于發現了她是誰。事實上，我再度打開了對那段熾烈而不快樂的短暫情史的回憶，回想那段時間的日日夜夜，相互的電話與信件。而且，在日記后面，我還發現了兩封她寫的信，小心地保存在原始的信封中，有一封上還特別注明：“貼著——這樣你才會保持聯系。”另一封信里有一張她的黑白照片，是兩人感情結束以后，她寄給我的，讓我不要忘記她。蓬松的頭發，高高的顴骨，相當緊張的微笑。我怎么會把她忘記？

1979年10月，我的日記上還記著她，克勞蒂亞的“時髦紅色小軟帽和藍色制服風衣”。“在腓特烈大道，”日記上記載著，“他們把我鞋底都翻開了（我穿著迪克鞋，讓那軍官印象頗深）。”是的，我想起來了。在腓特烈大道車站下的地下通關所，一名穿著灰色制服的軍官把我帶進一個有拉簾的小房間，命我掏出所有口袋里的東西，放在一張小桌子上，非常仔細地檢查了每一件我攜帶的物品，甚至質問我隨身日記本上每一條記事內容。然后，他命令我脫下厚重的咖啡色皮鞋。那雙鞋是我在特爾街的迪克鞋店（Ducker&Son)買的。軍官往鞋子里瞄了瞄，又在手上掂了掂分量，說：“好鞋。”

“與克勞蒂亞手牽手，頰碰頰，到歌劇院咖啡廳我的日記上這么寫道：

反而變得更加親密……火炬游行。東風冷冽。兩人的溫暖。迷宮——繞圈子。溜過柱子，躲過警察，終于來到甘尼曼。晚餐差強人意。克勞蒂亞又談到她的“打工”。她的政治活動。我們穿過腓特烈大道，回到迪納。大約凌晨三點，回到維蘭德街。丹尼爾，滿臉發白，氣急敗壞地坐在公寓門前——他把自己鎖在外面了！

丹尼爾•約翰遜，作家保羅•約翰遜之子，現在已經是《泰晤士報》的要角。當時，他還是一個非常認真的劍橋研究生，研究德國悲觀主義歷史，總是樂于再多找到一個樣本。我們同住在維爾默斯多夫區維蘭德街127號。當晚，他忘了帶鑰匙。

日記里的迷宮和柱子，我猜想，是指著那些手持火炬的東德共產黨中堅青年干部，他們所屬的團體，自由德國青年團，是多么地名不副實。至于克勞蒂亞的政治活動，必須從她的世代談起。克勞蒂亞屬于讓人一眼就認得出來的世代，1968年。當晚，她告訴我，過去他們在鎮暴警察前面反復吟唱一句捕捉了1968年政治與性抗議的口號：“出外扮豬玀，床上無花果。”

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日記寫完后不久的一天，在柏林一達勒姆區教堂的墓地，參加學生領袖魯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的喪禮。她還是戴著那頂小紅軟帽。或者，這些細節只是出于我的想象？

國安部的觀察報告，和我的日記。我生命中同一天的兩個說法。秘密警察冷眼旁觀“被觀察者”的一舉一動，和滲人我個人主觀、情緒的描述。國安部的檔案，對我的記憶，是多么大的一份厚禮。比普魯斯特的瑪德萊娜蛋糕[14](#__14)[1]要好多了。

# 第一章  序言報告

檔案夾封面上蓋著的OPK三個字母，代表的是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也就是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根據東德國家安全部的高等法律學院所訂定的1985年版《政治作戰工作辭典》，所謂作戰性個人管制是指：辨識可能違反刑法、可能抱持“敵意負面態度”，或可能被敵人基于敵對目的而利用的人。作戰性個人管制的中心目的，根據字典的解釋，是要回答“誰是誰”的問題。每個檔案一翻開以后，便會有一段“序言報告”和一個“行動計劃”。

我的序言報告寫于1981年3月，執筆者為一名叫文特少尉的人。他很詳細地描述了我的個人資料，說明我如何從1978年起開始在西柏林讀書，從1980年1月到8月（其實應該是到10月）搬遷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首都”（東德堅持要這么稱呼東柏林）。我不時從西柏林旅行到東德及波蘭。我經常與“軍事策略性相關人物”聯絡。因此，他們認為“有理由懷疑‘G.’（就是我的姓氏加頓艾什[Garton Ash]的縮寫。不用‘G\_’時，他們便用‘被觀察者’、‘該目標’、‘羅密歐’等名稱來稱呼我）故意利用他學生兼記者的正式身份，從事間諜活動”。

文特少尉并閱覽、節錄了國家安全部主持反情報的單位，Ⅱ/9組，專門為部內其他單位做的類似情報報告，其中第一手資料包括：有關我個人的觀察報告；從我的朋友，如一名叫維爾納•克雷奇爾的新教牧師的檔案中節錄下的一些資料；我替西德的《明鏡周刊》Der Spiegel）所寫的一篇有關波蘭的報道影印本；我個人記錄下的波蘭相關筆記和文件——顯然是我有一次從舍訥費爾德機場飛往華沙時，他們秘密搜查我的行李時所拍攝下來的；連我在牛津的老師為我寫給英國領事館的推薦信，都被收進了檔案。檔案總共有325頁。

文特的報告特別注重資料來源，他大量釆用國安部線民所搜集來的情報。在安全部的語言中，線民的正式名稱為非正式職員(Inoffizielle Mitarbeiter,簡稱IM)。他們之間又有好幾個分類：安全、特殊、軍事作戰、敵后，甚至有一組專門監視線民的線民。從1989年開始，IM已成為德文的一部分，就好像SS(黨衛軍）在所有歐洲語言中，都代表著納粹主義的粗魯、暴力與野蠻獸性一樣。IM在德文中已經成為如德國共產黨獨裁一般的經常性、組織性的滲透、威嚇、通報行為，亦即成熟極權主義的一種靜默的腐敗形式。在1990年代初時，德國任何一個有名氣的政治家、學者、記者或牧師，只要國家安全檔案記錄中顯示他曾經是一名IM,—經發現以后，這個人就會從此消失于公眾眼前。IM是一個污點。

不過，污點還是先需要被指認、暴露出來，才算污點。秘密警察給每個IM，還有每個觀察目標，都取了個假名，以為代號。事實上，大部分的IM的假名都是自己取的。為自己挑一個秘密名字，幾乎可以說是成為一名常任IM的洗禮儀式。在兩德統一以后，一個東德知名的盲眼DJ,盧特•貝爾特拉姆（LuteBertram),被人發現是線民，他的代號是羅密歐。如果他曾經遇見過我的話，我猜想，那局面就變成羅密歐告羅密歐的密了。

我的序言報告總結了許多線民提供的有關我的信息，其中包括IM“史密斯”，IM“舒爾特”、IM“米夏拉”，還有她的丈夫，KP(代表Contact Person,聯絡人）“格奧爾格”，他的前妻愛麗絲，化名“紅麗絲”。報告撰寫人文特少尉還提到，紅麗絲在與格奧爾格結婚前，曾與金姆•菲爾比[15](#__15)[1]有過婚姻關系，而菲爾比正是英國最有名的蘇聯間諜。

文特少尉發現G.工作時有學者巨細靡遺的特性，但是態度上卻表現出“布爾喬亞的自由意識，對工人階級毫無責任感”，“表面上，G.給人相當隨和的印象，一般而言與‘典型英國知識分子’并無二致（這個怪異的評語來自IM史密斯）”。不過，我是有可能接觸過想要從我身上取得情報的人，并在他們心目中留下不同的印象。在往來波蘭時，我接觸的人毫無疑問屬于“反社會主義”陣營。所以，這些情報單位的人會想要知道更多有關我的事情，以決定能否以刑法第九十七條起訴我，是可以理解的。根據刑法第九十七條，任何人搜集、傳遞應該保留為秘密的“信息性物品”給外國政府、秘密組織或其他不確定的“外國組織”，得處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重大者，可處無期徒刑或死刑”。

接下來的“行動計劃”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為線民的部署。從“史密斯”開始：“考慮該員的主觀、客觀可能性后，他雖與G.失聯，可重建與他的關系”，并設定在1981年4月15日以前，“史密斯”應做出一份書面報告。“負責人：文特少尉。”“舒爾特”和“米夏拉”應恢復活動：這是文特少尉5月1日的報告上所做的建議。此外，該報告還表示，“HVA-I的一名IM，即G.在柏林洪堡大學的指導教授，亦應加入作業”。

HVA是東德的海外情報部門，全名為Hauptverwaltung Aufkiarung(可直譯為“啟蒙總管理處”，因為AufklSmng較為通常的解釋為“啟蒙”[16](#__16)[2]）。啟蒙部由綽號“米沙”的馬可•沃爾夫領導，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的小說《冷戰謀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中的部門“the Abteilung”就是以“啟蒙部”為藍本寫成的。HVA-I啟蒙部第一組，主要職責為監視在波恩的西德政府。

接下來，行動計劃談到了“作戰觀察及調查”，其中包括調查在我讀柏林洪堡大學時租給我那間有景觀的房間的房東，克來索夫婦。第三部分行動計劃，指示啟蒙部第六組，也就是負責控管越境交通的國安部第六處，以及“郵件管制”的第M組。計劃中提到了“G.在西柏林的地址”，想必是指將我的信件從西柏林轉來時的地址，因為國安部通常無法任意窺伺到任何人在西柏林的信件。文特少尉的任務，顯然是要做成一個報告，評估是否將調查擴大為全面性的作戰個案，簡稱OV。全面性作戰個案，是最高層次的作業，對象包括所有已知批評和反對東德政權的不滿分子。例如，我的朋友維爾納•克雷奇爾，就是OV“山毛櫸”（Beech-tree)。

在行動計劃的最后面，還有一項“與其他服務單位的合作”部分。計劃提議與XX/4組（負責滲透教會）合作，檢查我和“山毛櫸”之間的接觸。計劃還提到將“詢問蘇聯安全部門，目前英國是否仍汲汲追查金姆•菲爾比案”。“必須與AG4進行實質合作"，以便在我到波蘭訪問時，安排線民貼身監視與觀察。AG4是國安部在波蘭發生團結工會革命以后建立的一個工作小組。負責人是黎瑟少校。

報告的最后，不但有文特少尉簽字，還有負責所有西歐情報工作的Ⅱ/9組組長考爾富斯中校的批簽。

原來他們的“行動計劃”是這樣子的。針對這份檔案，我也策劃了一個行動計劃：調查他們對我的調查計劃。我準備循線追蹤，找到和我的個案相關的所有線民和官員，和他們討論，并將國安部的記錄，與我的個人回憶、當時的日記、隨筆、我曾經寫過有關那一段時間的政治史等，相互比對。然后，就會知道自己將發現些什么了。

全名累贅冗長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聯邦授權記錄局”，通常簡稱為高克機構（Gauck Authority),因為這個單位是由有力而辯才無礙的東德牧師約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管理，我的檔案便是從高克機構在柏林的主檔案室調出來的，事實上，該檔案室也是當年國家安全部的中央檔案室。東德的國家安全部組織龐大，辦公室綿延好幾棟，在東柏林市東端的諾曼街上，占據了整整一個半街口。部長的辦公室和公寓，幾乎仍保留著最后一任部長離去前的原樣：桌上的多臺電話（機密、極機密、最高機密），部長整齊的小臥室，一盤“理查•佐爾格”（Richard Sorge)幼兒園小朋友特別為他做的黏土模型，包括一根黏土香蕉、一個小精靈、一個上面寫著“吉寧”的小狗和一個由“克里斯汀”做的檸檬。

大部分的辦公室大樓，現在都已移作他用。過去密封起來，杜絕秘密文件遭雙面間諜泄露的窗戶，都已對外敞開。文特少尉、考爾富斯中校之輩或曾做過偷雞摸狗事情的地方，現在都只是一間間平常的辦公室：一家超級市場、一家健身房兼桑拿室、一家勞工中介所。可是，檔案室仍維持原有之功能。

在索引室，一些穿著明亮的粉紅色罩衫和尼龍長褲的中年婦女，穿著塑膠拖鞋在許多巨大的索引卡機器之間走來走去。我之所以說索引卡機器，是因為那些大索引卡盒子都是由馬達推動的，懸吊在一根大軸上，就好像游樂場內的大車輪一樣，只要按K鈕，大車輪就會一直轉到K盒在最上端為止。這個F16——大車輪系統的代號——索引系統內都是真實姓名，只不過安排的順序按照的是國安部自己的聲韻次序，例如，Muller,Mueller,Moller，Muller都排在一起（如果你是從偷聽電話而得到的名字，就不知道該如何拼了）。如果發生這類問題，穿粉紅罩衫的女性工作人員就會建議你去找F22索引系統——依照個案號碼排列——或者去找其他主管的個案記錄，然后再到該大樓七層加固的倉庫中，尋找想要的個別檔案。噼嗒、啪嗒，粉紅罩衫女士們的拖鞋踩過來、踩過去，資料庫就這么攪出一塊塊下了毒的瑪德萊娜蛋糕。

在走廊的另外一端，有一間“傳統室”（tradition room)，里面有各種獎杯、獎狀、列寧的胸像、“契卡”優良工作記錄。“契卡”為蘇聯對秘密警察的稱呼：“只有那些頭腦冷靜、心底溫暖、手腳干凈的人，才能成為契卡人”（契卡創建者捷爾任斯基〔F.Dzerzhinsky〕所言）。桌上有很多看起來像果醬罐子的玻璃瓶，瓶身上仔細貼著標簽，里面是一塊骯臟的天鵝絨布，也就是個人味道的樣本。警犬只需要從這里知道某一個人的味道以后，便可擔負追蹤任務了。根據國安部辭典，它們的正確名稱為“嗅覺保存物”。我站在那兒，不禁開始狂想：或許在這棟碩大的建筑的某一個角落，我過去的味道還像果醬一樣被保存得好好的？

接下來，是他們稱之為銅鍋爐的一間又深又大、四處用金屬包起來的房間。國家安全部原本計劃在里面安裝一部全新而龐大的電腦系統，把每個人的信息都放進去。用金屬將房間包起來的目的，在于隔絕外界的電子干擾。現在銅鍋爐里面堆放著的是幾百件大袋的紙張，也就是從1989年秋的大規模抗議開始，一直到1990年初民眾沖進國家安全部之間，部內大量銷毀的文件殘骸。假設國安部一定先從最重要、最敏感的資料開始銷毀，高克機構現在正努力地一片一片將它們拼回原狀。

總而言之，這個高克機構是個非常奇怪的地方：它是在過去可以稱為“國家恐怖部”的地盤上所新建的“國家真相部”。它位于柏林中央的行政部門內，很多大樓的走廊雖然現已裝上了西德的新式照明和塑膠地板，東德味道卻仍然彌漫在組織內：陰郁的啤酒肚門房，訪客必須別在身上的識別證，各種不合理的規定，三聯式的申請表，隨處收費的習慣切的一切，都令人回想到東德的官僚主義。當然，還有那傲慢的福利國家所留下的各種習性。高克機構的職員中，每兩個人中就有一人，不是去吃中飯，就是去休假，否則就是“去看醫生”了。我好像回到過去，幾乎可以聽到德國上班族之間的標準問候語“祝你用餐愉快！"（Mahlzeit!),此起彼伏，穿越時空而來，或似乎聽到了一名秘書對另外一名說“我可以用你的碎紙機嗎？”的聲音，從走廊另一端傳了過來。剎那間，我腦中浮現出一個形象：這個在原來的國家安全部之上建起的新機構，每天沒完沒了地嘗試將撕碎的紙張拼湊起來。

現在，每張我們所看到的文件，都經過機構的檔案室人員整理，將新的編號整齊地蓋印在國安部小心翼翼手寫的頁碼之上。這雖然可笑，但反映出的正是德國人一絲不茍的一面。一個極端接收下另外一個極端。東德想必是現代史中，秘密警察組織最廣泛、嚴密、滴水不漏的極權國家了。而新德國則是現代民主國家中，最大量將過去極權統治中的資料暴露于民眾眼前的政府了。

1991年，統一后的德國國會通過了一項特殊法，小心規定了這些檔案的用途。舒爾茨女士比我先閱讀了我的檔案，正是規定的一部分。根據這項徹底執行的法律，工作人員應該先將有國安部受害者或無辜第三者出現的特殊頁挑出來影印，將名字涂黑，再影印一次，確保即使透過強光，也無法讀出那些名字。同時，工作人員必須要抽出任何與當事人無直接關系的第三者資料。但是，秘密警察的工作就是要搜集、挖掘私生活中最不為人知的細節，其中哪些算是與被害者有直接關系，哪些不算呢？而高克機構的工作人員又憑什么來判別呢？

閱讀檔案的結果可以極為可怕。我腦海中浮現出一個現在變得非常有名的個案。薇拉•沃倫貝格（Vera Wollenberg)為維爾納•克雷奇爾牧師所在潘科教區中的一名政治活躍分子。她閱讀自己的檔案時發現，她的丈夫從認識她的第一天，就開始打她的小報告。例如，星期天全家出去散步，星期一，她的丈夫努德就會到國安部把所有的事都向她的個案負責人全盤托出。她以為她和努德結了婚，事實上，她的結婚對象為IM“唐諾”。（薇拉在回憶錄中稱呼他時，不是努德唐諾，就是唐諾努德。兩人現已離婚。）另外一個有名的案例為作家漢斯•約阿希姆•舍德利希（Hans Joachim Schadlich)。他發現他的哥哥一直在監視他。上面的兩個例子中的當事人，都是看過檔案才知道事情真相的。如果沒有檔案的話，他們或許還是親愛的兄弟、和睦的夫妻——只不過愛是建筑在謊言之上的堡壘而已。

副作用中也有輕松的一面。當特別法通過后，柏林洪堡大學的學生向女朋友吹牛時會說：“當然我得想辦法去看我的檔案。簡直不敢想象里面會寫些什么，不過，我非知道不可。”甜蜜性感的女孩對這樣的男生，能不印象深刻嗎？然后，高克機構的回信到來：到目前為止，本機構還未發現你的檔案。羞辱。甜蜜的性感小貓轉而去找另外一個有檔案的男孩做她的男朋友。

當我告訴朋友有關我的檔案的事時，他們的反應非常奇怪，說什么：“你好幸運！”“真特別！”如果朋友中有人曾和東德有關的話，他們可能會說：“對，我也得去申請看我的。”或是：“看起來我的已經被銷毀了。”還有人說：“高克說我的檔案在莫斯科。”從來沒有人說：“我確定他們沒有我的檔案。”如果由弗洛伊德觀點來看，這些人得的可以說是“檔案嫉妒癥候群”了。

其實我的檔案和其他人的相比算不了什么。我的全裝在一個檔案夾內，而作家尤爾根•福切斯（Jiirgen Fuchs)的資料，需要三十個檔案夾。我的只有325頁，而異議歌手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則有4萬頁。不過，小鑰匙也可以打開大鎖，一塊小敲門磚可以讓我進入大房間。不僅在德國，任何有秘密警察的地方，一般人都會抗議，說那些秘密檔案非常不可靠，充斥扭曲、偽造的情事。果真如此的話，這種事應該也會反映在我的檔案上。為什么不從我開始測試一下？畢竟，我最想要知道的就是這個了。另外，負責我案子的軍官和線民心中是怎么想的？把我當成什么？難道檔案和檔案后面的男男女女，能夠告訴我們比有關共產主義、冷戰、間諜工作有意義或無意義更多的事情嗎？如此大規模、有系統地對民眾公開秘密警察檔案，是史無前例的。過去從來沒有任何地方或任何人做過。這種做法是對的嗎？對相關人士會有什么影響？經過這個事件，我們應該對歷史、對記憶、對自己、對人類本身，都獲得更多體會才對。因此，我要先聲明，如果我在書中表現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的感覺，請別誤會。我只是一個窗口、一個樣本、一個達成目的的方法、一個實驗的目標。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不僅得探索一份檔案，還要走進一段人生：一段我曾經走過、擁有過的人生。萬一你有任何懷疑的話，我必須先澄清，這本書中述說的“一段人生”，和“我的人生”是不一樣的。通常當我們談到自己的人生時，談的只是自己的過去，集合了自己生命中走過的許多事件的心理自傳。然而，真實發生的一段人生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尋找那個失去的自我中，我同時也在尋找那失落的時代，并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人如何形塑另外一個人？歷史時間和個人時間，公眾和私人，偉大事件和個人生活。歷史學家基斯•托馬斯（Keith Thomas)在寫到傳統政治史忽略了絕大部分的人類經驗時，引用了薩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的話：

那律法或君王能成或能懲的部分，

較于人類內心所能容忍，何其渺小。

回顧過去，我至少看到了我的內心所承受的當中，有多少是由現代的“律法或君王”，也就是因為東西不同的體制以及兩者之間的沖突所造成的。或許，畢竟，約翰遜所表達的道理并非放諸四海皆準，而僅適用于他的周圍。要是哪個國家真有這種情形，就算它的運氣好了。

# 第二章  馳赴柏林

1975年7月12日，就在我二十三歲生日那天，我開著嶄新的深藍色阿爾法羅密歐跑車，經過英國高速公路至哈維奇渡口，前往柏林。從荷蘭之角（Hoek van Holland)上岸，飛馳在快速道路上，直抵黑爾姆施泰特邊境，通過東西德之間的“鐵幕”，然后緊張地盯著穿過東德、進人西柏林的特定道路兩旁的限速標志。在西柏林住了一年半以后，復于1980年1月，開車經過查理檢查哨到東柏林，租了一個房間，停留了將近一年。我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寫我在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探討希特勒統治下的柏林。

根據我最近完成的兩德編年史表，1978年7月至1980年1月間，發生了許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中包括“七大工業國”（G7)在波恩開會，卡特總統宣布對蘇聯進行制裁，破壞了簽署第二回合戰略武器限制條約（SALT Ⅱ)協定的原定日程，并威脅要抵制莫斯科奧林匹克運動會。比較次要的事件則包括：卡羅爾•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當選教宗，是為約翰•保羅二世，并首度訪問波蘭；歐洲議會第一次直選；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雙軌”（twin track)決議（如果蘇聯不愿意談判減少核導彈，北約將在歐洲部署新核導彈）；以及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現在看來，當時是冷戰期間最后的一次大規模對峙：里根對勃列日捏夫，美國巡弋導彈對蘇聯的長程導彈（SS20),東方陣營的波蘭革命對西方陣營的和平運動。

我的日記寫的則是完全不同的記錄。我沒有記下七大國高峰會議，倒是記下了與詩人詹姆斯•芬頓一段很長的對話，我們談到德國文學、麥考萊爵士和新聞寫作成為一種藝術形式的（遙遠的）可能性。我沒有記下導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達成雙軌決議的瓜德羅普高峰會議，卻記下和大學本科時代的同學杰伊•雷德韋在東柏林的莫斯科餐廳午餐，還有一天晚上我們先到西柏林的“比利提斯”喝一杯，再去“福非”吃飯（真的嗎？），然后又到“艾克斯•巴克斯”續攤。波蘭裔教宗雖然在我的日記中寫了不少，但是歐洲議會第一次直選時，我卻在愛因斯坦餐廳吃早餐，逛畫廊，沒來得及交稿給《旁觀者》（Spectator)周刊等等。

在歷史學家以嚴厲的筆觸記錄葛羅米柯的波恩之旅時，我正在法蘭科尼亞，豪飲黑啤酒，參觀希特勒紐倫堡大游行現場。蘇聯人侵阿富汗時，我正搭乘往海德堡的夜車，前往阿爾伯特•施佩爾[17](#__17)[1]的姜餅小屋的路上。當吉米•卡特威脅要制裁蘇聯時，我正忙著準備派對呢。這種生活，用我的好友，路透社駐東柏林記者馬克•伍德刻意的混合比喻說法，正是我在“冷戰期間的熱烈氣氛”下的生活。

在這一年半的時間中，國安部對我的情報也是斷片式的。除了我與“小軟帽”在東柏林共度一晚的觀察報告外。XX/4組（主管教會）的一個總結報告中，他們不但非常正確地指認出小軟帽的身份，還提到了另外兩名西柏林的聯絡人，英格麗（姓氏被舒爾茨女士涂黑）和亨利（姓氏同樣被涂黑），以及我在西柏林的電話號碼。他們還記錄下我的出生地為溫布雷多（Winbredow,系溫布爾登[Wimbledon]之誤），我在牛津念的是圣安索特（St.Ansowt’s,應該是圣安東尼[St.Antony’s]之誤）學院，并將我的某一次波蘭之旅前后挪移了三個月。他們指出，我和英國公民莫理斯（姓氏被涂黑）共同研究納粹德國時期教會與政權之間的沖突。不過，“經證實，G.對東德的文化重要里程碑和地點、文化[原文照錄]和文化人物，知之甚詳，特別對包豪斯藝術學派[18](#__18)[2]研究甚精。1979年6月，G.自稱為英國《觀測者》（Speita)周刊之所謂自由撰稿者，想要寫一篇有關反法西斯斗爭的文章”。從《觀測者》周刊來的人。

這份資料主要來自XX/4處偵察山毛樣牧師所得，以及艾福特(Erfurt)辦公室的金策爾少尉在與聯絡人“格奧爾格”和IMV“米夏拉”會商以后寫成的一份四頁報告。在線民IM后面，加上字母V，代表米夏拉是國安部的最高線民，負責與敵人直接接觸。金策爾少尉報告，1979年6月30日，格奧爾格博士（姓氏涂黑）住在魏瑪的史洛斯某區（地名被涂黑）時，接待過一名帶有英國或美國口音的訪客。他自我介紹為提姆•加多艾什（TimGartow-Ash),—家英國周刊《觀測者》的自由撰稿人。

如你所見，不難發現，涂黑并沒有什么實質上的效果，因為居住在魏瑪史洛斯某處的格奧爾格[某某]博士到底不多。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法律只準許隱匿國安部檔案中無辜的第三者或被害人，并不保護密報者。我只要比對日記，就可以找出格奧爾格博士的身份，并發現國安部再度將日期搞錯了。

格奧爾格博士是一名年老的猶太裔共產黨員，不僅是全東德，也是全部共產黨統治的歐洲地區內，最有趣的談話對象。在我拜訪他的時候，或許就已經知道他曾經當過東柏林一家日報的主編，以及一家在政府容忍范圍內表演諷刺劇的餐廳酒吧主持人。或許當時我也知道在納粹期間，他住在英國，替路透社做事。但是，一直到后來，我才知道，當他在英國的時候，遇見了一名女子，化名“麗絲”的愛麗絲•科曼，兩人并進而結婚。愛麗絲是個奧匈猶太裔女子，個性溫暖，精力充沛，曾為金姆•菲爾比的第一任妻子，有人說，她正是引領年輕的英國人菲爾比為蘇聯做間諜的關鍵人物。但是，從國安部這份報告中，我才第一次發現，格奧爾格博士自己在替路透社工作時，便已經進入蘇聯情報圈了。

在這種背景下，他會對我提出的說法感到懷疑，就不足為怪了。根據金策爾少尉的報告，格奧爾格很快發現，其實我并不認識桑達[姓氏涂黑]，也就是我提到建議我去和他談談的人物。當我問格奧爾格博士，他的英語怎么說得這么好時，他告訴我，他在英國居住多年，曾替路透社工作。“說到這里時，G.假裝非常感興趣，并問某人[名字被涂黑]是否為當時路透社的主任。G.得知答案為肯定時，高興地叫了起來：‘想不到吧！好個巧合。錢瑟勒的兒子，現在是我的長官（Vorgesetzter)。’整個過程都是裝的，因為格奧爾格博士可以感覺到，G.早已知道他曾經替路透社做過事。格奧爾格博士開始產生懷疑，并深信指使G.前來找他的，背后應該另有其人。從那以后，格奧爾格博士表現出疏遠，卻不至于無禮的態度。”

這一個段落具體而微地顯示出，國安部的記錄為何會悄悄地出現出許多微小的扭曲。例如，我絕對不會稱呼友善溫和的亞歷山大•錢瑟勒（Alexander Chancellor),亦即當時《旁觀者》周刊的主編為“長官”，因為這個詞有非常明顯的上下等級的含意。“長官”很可能是格奧爾格博士，或更可能是金策爾少尉的措詞，因為他們才生活在每個人都有長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們竟然將這種概念套用在我身上，并且用來直接引述我說的話。萬一，讓我們暫時假設，這段話的內容比實際表露得要嚴重得多，而其解釋完全取決于對這個詞語的看法——這種事并非不可能；假設，我日后成為一名顯赫的東德政客；有一天早晨，我醒來，發現西德的一家小報將那段話引為頭條，弄成不利于我的重要新聞。轉瞬間，要求辭職之聲立刻四起。這時候，如果我提出抗議，說：“不，我從來沒有那么說。至少，不完全是那么說的。況且，他們把日期搞錯了，還有《旁觀者》雜志名稱，還有連我名字也拼錯了……”有誰會相信我？

不過除了一些小小的扭曲和用詞錯誤以外，那段記述大體而言是正確的。無論我當時是否已經知道格奧爾格博士在路透社的關系人，克里斯托弗•錢瑟勒（Christopher Chancellor),也就是亞歷山大•錢瑟勒的父親，《旁觀者》的總經理，我可以想象自己努力地維持一段相當膠著的對話，對這樁不怎么樣的巧合做出夸張的喜悅反應。我只不過想要誘導格奧爾格博士開口，輕松地多說出一些。

“當時，[格奧爾格博士的]妻子（指IMV‘米夏拉’），從廚房走了出來，”報告繼續寫道，“她丈夫介紹她為：‘我太太，魏瑪藝廊主任。’IMV頗感意外，她以為客人只是來拜訪她的丈夫的……因此，當G.立刻轉換話題，開始詢問該畫廊所舉辦的包豪斯展覽時，她更感到異常驚奇。G.解釋他看了展覽，并且非常著迷。不過，他無法理解為什么畫廊沒有發行任何畫冊。這問題的提出暗示，G.希望能夠從IMV口中聽到，因為文化政策的關系，這種事是不可能的之類的話。不過IMV并沒有落入陷阱，只解釋說因為紙張缺乏……”

“格奧爾格博士非常憤怒G.的粗魯，因為這時候他已經完全將[格奧爾格博士]冷落在一邊靜聽，也不再回到原來的主題。[格奧爾格博士]起身，離開G.,隨便說了一個必須要到城里辦事的借口，就走了。到這時候，談話大約已進行了四十分鐘。現在，G.對IMV解釋，他正在寫一篇有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藝術與文化生活的文章，因此，想要聽聽IMV的評論。他提出的問題包括：

——為什么一直到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魏瑪）才舉辦包豪斯的展覽？[19](#__19)[3]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對包豪斯的態度如何？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對這個展覽的觀感如何？

——國際上對這個展覽的觀感如何？

談話中可明顯看出，G.對藝術界，尤其對包豪斯藝術流派方面，掌握了豐富的知識。”

拜會結束后，我顯然將自己的名字寫在一張紙上一一“不知道為什么，他拒絕留下完整的地址”——并表示繼續深談的興趣。“與IMV對話長達二十分鐘。由是，G.大約在公寓里停留了一個小時。”

金策爾少尉覺得前述情報在許多層次上，極有“軍事作業”價值。他注意到格奧爾格博士可能已引起了“敵方單位”的興趣，因為他早期與金姆•菲爾比的關聯，也因為在東德，他表現出對現有文化政策的不滿，可能對“異議分子”有所同情（金策爾自己加的引號）。敵方單位，金策爾忖思道，可能有興趣“扶植異議分子”（金策爾再度畫上的引號）。因此，格奧爾格博士在擔任線民的同時，自己也遭到懷疑。

而我則具有高度嫌疑，因為按照金策爾少尉的分析，我同時動用三道“幌子”來交代自己的來歷：朋友的朋友，記者，東德文化生活的學習者。通常國安部只將“幌子”這個嚴重用語放在重要的情報搜集上，通常只有替全職干員或比較資深的兼職線民布局背景時用到，但是他們竟然將它框在我的報告中。

報告建議措施包括通知“米夏拉”和“格奧爾格”，如果我和他們再度聯絡，他們應該如何處理，并通知負責監視西方記者的反情報組Ⅱ/13。

報告中一些小細節有誤，細節的闡釋更充斥著偏執妄想。然而，國安部的確如傳說中聽說的，無所不在，無人不查。只因一次無心的對話，以及接下來一兩次無辜的接觸，他們便將我登入了中央檔案，成為一名嫌犯。等我在西柏林住了十八個月，準備要越境進人東柏林時，他們已可以將所有相關信息湊合起來，寫成一篇綜合報告，把與我的接觸、我在西柏林的地址與電話號碼、我的車、我的發色、身高（檔案副本已將“米夏拉”估計的1.65米至1.7米更正為1.8米），連我似乎不抽煙的事，都被寫進報告了。

不過，他們沒提到的資料同樣驚人。例如，報告中沒有提起我曾經在柏林替BBC(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廣播過，或者我替《旁觀者》撰寫的有關東德報道，其中包括一篇以愛德華•馬斯頓的筆名寫的贊揚東德最著名的異議分子羅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rm)的文章。另外，有一年圣誕節，我到德累斯頓和朋友一起度假，以及其他的幾次旅行，也都沒有留下任何記錄。

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們對于我在西柏林的生活所知甚少。即使如此，那些部分涂黑的名字、地址與電話號碼，也足夠打開記憶的大門，把我送回到日記中。

我一從英國抵達柏林，便驅車前往一名老太太的公寓。這名老太太名叫烏蘇拉•馮•克羅西克，是出版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也就是同名的小說家的侄子介紹我認識的。小格雷厄姆•格林的父親，修•格林，1930年代曾在柏林擔任《每日電訊報》的駐外記者，在被納粹強制出境前，認識了烏蘇拉。烏蘇拉白發蒼蒼，但腰桿挺直，終身未婚，在在體現普魯士貴族女性的風范，但是，她個性溫暖，不矯揉造作，不拘于傳統。她那昂頭一甩頭發的習慣動作，仍令人聯想到五十年前，她在波茨坦嚴厲的寄宿學校中逃學游玩的淘氣模樣。她大半輩子居住在柏林，甚至還記得大蕭條時期，一群艷裝華服的人，如何在布萊希特的《三便士歌劇》首演后，涌出劇院，經過造船廠時，看見兩邊站著的都是失業者、戰爭受傷者等真實生活中的乞丐的模樣。她的許多朋友都曾參與了反抗希特勒的運動，但是她的叔父，盧茨•什未林•馮•克羅西克(Lutz Schwerin von Krosigk)卻是希特勒的財政部長。她還記得納粹奪權時，發動暴民在一夜之間打破所有猶太人商店玻璃的“水晶之夜”后，有一天和他一起開車到他鄉間別墅，街上到處仍可看見猶太人的店面被砸以后的殘骸遺物、玻璃碎片。“一路上，我們不發一語。”

烏蘇拉居住在安靜而富裕的維爾默斯多夫區巴黎街上一棟19世紀公寓的四樓。從窗戶，我可以透過樹梢，看到一間紅磚砌成的威廉時代的教堂。樓下，是一座相當氣派的大理石樓梯和一扇巨大而精巧的玻璃與金屬雙重門。當晚上門房下班以后，住戶每人自備一套很特別的鐵制鑰匙，從鑰匙孔的一端插入，另一端拉出。在柏林的第一個夏天，走出那一扇門，準備去探索這迷人城市的那股興奮心情，至今仍令我難忘。

室內，烏蘇拉的公寓內堆滿了一度非常精致而高雅的家具和汗牛充棟的藏書。我就在客廳地板上打個地鋪，旁邊一張積滿灰塵、老舊的沙發腳下，墊著一本貝德克爾公司于戰前出版的德累斯頓旅游指南；每晚入睡前，我總會忖思，或許拿來墊沙發是這本戰前德累斯頓旅游指南現在唯一的用途吧。我之所以需要打地鋪，是因為烏蘇拉的客房已經住了一名房客，詹姆斯•芬頓。芬頓是《衛報》（Guardian)的特派撰述委員，他也曾替《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寫過文學、印度支那以及英國下議院的政治。

我和芬頓很快成為好朋友，相處時間甚長。我的日記中留下了兩人晚上一起喝冰啤酒和涼酒的許多記錄。我們涉足過的地方包括附近的一個叫“小酒館”（Bistroquet)的館子；街角那間破舊的庫赫角（Kuchel-Euk),里面到處是布墊、水果盤，而音響翻來覆去地放著《巴比倫河畔》；或是在記者酒吧（Presse-Bar),我們喜歡是因為沒有新聞媒體的人會去那里；洋蔥魚（Zwiebelfisch)和艾克斯巴•克斯（Ax Bax),當時正紅的1968年事件經歷者愛去的地方；布爾喬亞的莫林餐廳（Cafe Mohring);還有，“荻克•威丁”（Dicke Wirtin,肥老板娘之意）餐廳，有一天還不太晚時，鄰桌一名極端絕望的阿爾及利亞人，燒了他的居留證，接著，一名穿著黑色皮夾克的醉漢掏出一把手槍，對著他。

“小心，那家伙有槍！”詹姆斯說。

“不可能。”跟我們在一起的德國女孩說。她替仍然處在軍事占領之下的柏林市英國軍事政府做事。“柏林不準私人擁有手槍。”但那把槍是真的。

蒼白，專注，衣著襤褸，略微徇僂的身形，頂著一顆大光頭，詹姆斯的外表看起來像極了一名異議和尚。他剛到時，對德國和德語的知識相當有限。事實上，當地的各國特派員起初都覺得詹姆斯一定是間諜，因為他們用非常奇怪的邏輯思考，認為沒有一名記者可能在對一個國家知道得這么少的情況下被長期派駐到當地。不過，情形很快改觀，因為詹姆斯不但眼疾腦快，而且有一股記者追蹤故事的十字軍狂熱——尤其是當故事牽涉揭發有錢、有勢或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在搞鬼的時候。

詹姆斯為了很多理由，有些或許我根本猜不著，當時并不快樂。但是對我而言，他卻是個非常迷人的伙伴。他與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有詩人一般的文采與綺想，經常有出人意表、習鉆古怪的想法。有時候，他會非常瘋狂地任思想偏離現有的共同經驗之外，遠走高飛。我從他身上學到了許多寫作的技巧，并與他成為非常親近的朋友。

那年秋天，烏蘇拉遷出公寓，搬到慕尼黑。我們只好拔營到巴黎街上，隔了幾個街口的一家小旅館，巴黎角。那家小旅館俗氣得可愛，橘紅色的燈光，房間的墻壁非常薄，隨時可以聽到隔壁的聲音，非常格雷厄姆•格林。秋天逐漸轉為寒冬，庫弗斯坦達姆大街上的寒冷東風，好像直接從西伯利亞吹過來似的，我們就在這個糟得不能再糟的時候，搬進一間小公寓。那間公寓僅有的暖氣設備，便為房間角落的一個泥灶，要不斷地喂煤塊，煤塊則需要從地下室自行搬上。其間，我短暫地逃離西方的貧困生活，到東邊去慶祝了德國傳統的圣誕夜。邀請我去的是新認識的東德朋友，克魯格一家。他們屬于當地的中上階級家庭，在德累斯頓附近的拉德波爾，高墻與大花園之后的“世紀末”家庭別墅內，他們過著一種“國內移民”的高等生活。在去的路上，我的汽車因為不習慣北方的風雪，在抵達東德那一邊的查理檢查哨以后，便拒絕再啟動，必須靠一名和善的東德警衛幫助我重新發動。

有訪客從英國來的時候，我和詹姆斯便會帶他們到卡恩街的巴黎酒吧，或克羅伊茨貝格一家維也納逐客所開的“放逐”餐廳，或羅米哈格（Romy Haag)有易裝癖表演的酒吧餐廳，以及其他一兩家我們常去的酒吧。柏林果然不負小說家依舍伍德（Ishenvood)(在《酒店》[Cabaret]中）所創造出的神話氣氛。我把小說中莎莉•包爾斯一角，套在了一名新朋友叫艾琳•獲喜的身上。她是個非常迷人的德國猶太裔美國女孩，來柏林嘗試寫作。時過境遷，現在與艾琳談話時，我可以看出來，她當時顯然將我們當成了作家奧登（Auden)和依舍伍德或者是詩人斯彭德（Spender)。

在真實生活中，影響我們西柏林經驗最大的，恐怕并非依舍伍德的陰影，而是1968年的青年學潮。當時，柏林是一個重要的中心，和巴黎、阿姆斯特丹、法蘭克福、伯克利連成一線，成為重要的抗議中心。十年以后，維蘭德街上就再也沒有那種專門店，游行者只要走進去，就可以找到所有抗議示威所需的道具：紅旗子、標語牌、防毒面罩、合宜的皮靴等等。但是，柏林自由大學的墻上仍然滿布著政治涂鴉，而我的朋友中至少有一半——包括克勞蒂亞在內——都屬于1968年那一代的人。你不用問，一眼就可以看出那種人：牛仔褲，大翻領襯衫，手上不是一根煙就是一根草，回答人說話時大多用比較隨便的“嗯”而非比較正式的“是”，自己開口時則滿嘴的社會心理學新邏輯理論，分析關系，談“結構性暴力”，等等。他們的公寓地板上必然是空無長物，墻壁上必然是白漆，松木書架上則免不了有一系列的《讀本》，以及恩岑斯貝爾格(Enzensberger)[20](#__20)[4]、布洛赫（Bloch)、阿多諾（Adorno)、馬爾庫塞(Marcuse)等大部頭代表作。

然而，當時在1968年一起游行的學生，而今各彈各調。有幾個成為紅軍派（Red Army Faction,或稱巴德爾和邁因霍夫幫[Baader-Meinhof Gang])等的恐怖分子，專門放置炸彈、謀殺知名的企業家與高級官員。西德政府以鐵腕處理這件事，禁止任何具有敵對意識的嫌疑人士從事公職，從最高級公務員到郵差、掃街的，一律不準。在我到達柏林不久以后，德國曾經放映過一部電影《德國的秋天》（Germany Autumn）將德國描寫成一個武裝警察、組織和權力威脅無所不在的地方。難道西德又要變壞了嗎？

有一些朋友會告訴我們，才過去不久的I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社會情況，以及他們如何幾乎也成為恐怖分子的情形。然而，他們不但沒有變成異議分子，反而成了老師、社工人員或學術界精英，盡管仍不準擔任公職。還有一些人則選擇進人了詩歌、繪畫，或轉至出版界、新聞界，甚至有些人成為各種主義的擁護者：環境主義、女性主義、結構主義等等。克勞蒂亞當時便是一名教師，保羅為萬年學生和兼差藝術經紀商，彼得為藝術家，伊馮娜為心理學家及翻譯家，艾瑪為政治學家。弗里德里希為自由撰稿記者，當時正專注于調查一個題目：為什么西德政府不繼續追查納粹的犯罪行為——尤其執法的德國律師和法官本身的犯罪行為。德國六八世代的人最感興趣的，依然是這類專門發掘他們上一代罪行的題目。

1979年初，我搬到舍訥貝格區的特勞斯坦納街，一個六八世代人所謂的公社公寓中。和我同居一棟公寓的，或者可以說是我的公社社友中，有一位名為休伊的溫和左翼美國學者和一名叫伯恩特的男子。伯恩特的父親曾在納粹政權下擔任飛機工程師，后來則加入了美商公司。1968年青年學潮興起后，伯恩特不但成了一名左派分子，而且還加人了西柏林社會統一黨——東德共產黨的一個傀儡姊妹組織。照他后來告訴我的，他當時只是想加入一個“認真”的組織，也就是說，想要和一個權力機構有點掛鉤。當時，蘇聯的力量看起來還在成長之中。畢竟，在越戰爆發以后，美國的力量有削弱之勢。在他的黨員證的力量下，伯恩特在一家東德貿易公司中找到一份工作。雖然我當時并不知道，但是那家公司顯然是一家和國安部有密切關系的東德政府企業的子公司。

伯恩特身材魁梧，但暴躁易怒，眉頭一皺，更是一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樣子。他的存在不容忽視。納粹和馬克思提供了最佳的語言彈藥，供他日常興之所至的評論與辱罵使用。我的日記中記載著有一天，我在浴室里待得比規定的時間要長了一點，擾亂了他的日常作息。他一面用拳頭大力敲門，一面叫囂道：“統治階級！”當他把孩子帶進來住，而主要的房客，海納，威脅要去法院告他時，伯恩特對著他大罵：“你這個納粹豬玀，跟集中營的警衛一樣，白天謀殺平民，晚上彈琴、喝酒……”

事實上，我之有幸能夠進人這個公社，還虧他們兩人之間大吵了一架。吵了以后，海納決定搬家。在將他兩間高挑、寬敞、漂亮、白墻上還有兩個空白畫框的房間讓給我以前，海納拉著我坐下，在燭光下與吞云吐霧之中，與我長談了兩個半鐘頭，讓我經歷了一次多半由他談、我聽的心理分析之旅。在日記中，我記錄下一段很典型的他的談話。說到他十四歲時候的自我意識時，海納說：“一開始時，我假設自己有旺盛的正面自我意識，異性戀，不過或許比較傾向肛交。”一切的一切，只為了取得新住房的鑰匙。

他走了以后不久，正好有一名在英國讀公學和牛津時代的朋友杰伊來探望我。我注意到他們兩人之間的不同：“一個是個性保守、言詞閃爍、譏諷嘲笑、高傲不遜、自我壓抑、情緒糾葛的英國人，一個是開放、直接、誠懇、左派、滿嘴甩詞、思想自由、同樣情緒糾葛的德國佬。”幾天以后，電話鈴響，我拿起聽筒。

“哈啰，海納在嗎？”無名氏問道。

“不。”

“那么，你是同性戀嗎？”——他用的是德文“Schwul”。

“不。”我說，放下電話。幾秒鐘以后，電話鈴聲再度響起。

“哈啰，”同樣聲音的人說，“你是英國人嗎？”

“是的。”

“嗯，我剛才的意思是：你和男人睡覺嗎？”

“不！”

海納，我后來聽伯恩特說，在那之前幾年，便決定自己是同性戀者。當時他正通過實證來探索那檔子事。不過，我認為他那時未必是在引誘我。或許，他只是想要讓我感覺賓至如歸。

我從伯恩特那兒聽到，海納最近得艾滋病身亡。

對于六八世代人，我的感情很復雜。他們很特殊、有趣，和我所有其他的朋友非常不同。有時候，我可以理解甚至同情他們的政治目標，例如，當弗里德里希努力地想要揭露出德國司法是一套根本無法為納粹受害者伸張正義的失敗制度，我很能了解他的感受。然而，我同時覺得他們有時候太歇斯底里、自我中心、自我沉溺。他們的痛苦呻吟令我厭煩，在我看來，簡直小事化大、自尋煩惱，與東西隔離相比較，那些只是小事。海納告訴我，卡特總統訪問西柏林，就好像勃列日涅夫到東歐訪問暴吏一樣，然而他對于僅相隔幾英里之外、圍墻另外一邊的那個自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東德，卻漠不關心。對于他們那批人而言，圍繞在西柏林外的墻壁，似乎只是一面碩大的鏡子，通過鏡子，他們得以思考自己和他們自己的“關系”。“紙水仙”，我在日記中評論他們道。

然而，如果六八世代人在我眼中異常的話，那么我這個穿著大頭鞋、蘇格蘭呢夾克的英國年輕人，不知在他們眼中又是何方妖怪。回顧過去，那個過去的我，連我自己也覺得怪異。有人或許會羨慕那些有案可查的人，但是被自己的、有毒的瑪德萊娜蛋糕騙到，卻不是愉快的經驗。波蘭作家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在小說《費爾迪杜凱》（Ferdydurke)中，幻想自己有一天醒來后，回到了十六歲的模樣。他聽見自己那“早已埋葬、小公雞一般尖銳”的聲音，看到自己“沒有長高的鼻子，嵌在那還沒有成型的臉龐上”，并可以感覺到他不協調的肢體與器官，相互嘲笑：鼻子嘲笑腿，腿不齒耳朵。帶著檔案在時間中旅行的效果可能也很相似：一次不好的旅行。

國安部的金策爾少尉在報告中所謂我的“幌子”，其實并不是身份掩護，而是我還沒有成型的身體延伸出來的好幾個枝節。就好像現在會到我的牛津辦公室中要我指點他們人生迷津的頭腦混亂、但野心勃勃的二十三歲研究生一樣，我同時想做的事太多了：完成以第三帝國的柏林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寫一本有關東柏林的書，寫一篇有關包豪斯藝術的文章，還要寫許多篇文情并茂的文章給《旁觀者》周刊，甚至成為喬治?奧威爾、外交部長和戰爭英雄。都是一些我講給自己聽的掩護故事。

日記提醒了我過去那些笨拙的探索、自以為是的行動和勢利高傲的態度——還有貿然闖入他人生活的莽撞。姑且將窘迫放在一邊，要重建自己過去真正的感覺，真是何等的難事。然而，要重建別人的，可就容易多了。有時候，那個過去的我，對我是那么陌生。一路寫下來，寫到最后的幾頁時，在寫“我”時，我幾乎覺得我應該寫的是“他”才對。

個人回憶就好像是個滑頭的客戶。尼采在他寫的一篇諷刺短詩中，抓住了其中的神韻：“‘我做了。’我的記憶說。‘我不可能做的。’我的自尊堅持己見。到最后——記憶投降。”我們會禁不起誘惑，想要選擇自己的過去。國家也是一樣，我們會記得莎士比亞和丘吉爾，卻忘了北愛爾蘭。但是我們只能全取或全舍，而我也一定要說“我”。

雖然有很多事情讓我分心，但是我的日記中仍然記錄我花了很多時間，在聽起來就充滿邪惡感的“普魯士國家秘密檔案局”和柏林文件中心，翻閱蓋世太保檔案和納粹“人民法庭”文件。“人民法庭”的文件任意地堆放在金屬架子上，灰塵滿布，無人建檔。文件中心的主任為美國籍，因為檔案屬于美國駐柏林軍事政府財政的一部分。但是，檔案室主任每天只知道去打高爾夫，任由檔案荒廢。

我非常驚駭地打開好幾件起訴案件，發現提出控訴者并非支薪的蓋世太保線民，而是普通的市井小民：一名顧客指控理發師，一名助理指控藥房老板，一名雇主指控他的管家，甚至有一些兄弟、夫妻相互指控的。這些都是我當時影印下來的真實個案。許多案件最后甚至以被告者被判處死刑結案。

看了一天的檔案，我會再度走進街道的綠蔭與陽光之中，對于人類無止無盡的陰險殘忍，內心激動不已，久久難以平復。經常，我好像覺得自己手上也沾滿了血。我會去游一趟泳，將血洗凈，然后到咖啡廳內，看著隔壁桌的老太太講閑話，一面喝上一杯。老祖母們，你們在戰爭的時候，都做了些什么？

檔案室不是我唯一沉浸自己的地方。我還會去找一些退役軍人和戰爭幸存者，和他們談話。例如，海德堡的阿爾伯特·施佩爾，告訴了我他如何做一名縝密、忠誠的非政治任命專業行政官。還有很多偶然認識的人，每個人都有一段令人難以相信的歷史：一名機械師，他的父母在他還是嬰兒的時候，便因紅軍逼近，匆忙逃難，而在途中死亡。他從小長大，既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名，只知道家鄉一度曾為德國領土，但現在已屬于立陶宛的默麥爾（Memelland,編按：一譯“梅梅爾”，即今立陶宛克萊佩達）。我還知道一群曾共同反抗希特勒的了不起的老人家，每年七月二十日在當年的納粹國防軍總部會合，以紀念他們的領導人，施陶芬貝格伯爵[21](#__21)[5]被槍決。

施陶芬貝格伯爵在一九四四年被槍決前，曾高聲抗議。但是，他當時到底說的是“神圣德國萬歲！”（Es lebe das heilige Deustchland)，還是“秘密德國萬歲！”（Es lebe das geheime Deutschland)——后者同時指秘密反抗行動和詩人斯蒂芬·喬治（Stefan George)的半神秘思想——至今仍有爭議。然而，在秘密德國的鬼魅之中，我想要搜尋的，是一個私人問題的答案：什么力量使一個人成為抗暴斗士的同時，卻使另外一個人成為極權統治下的忠實奴仆？一個是施陶芬貝格，另外一個是施佩爾。今天，經過多年的研究，以及與極權統治下的許多反抗者和許多奴仆有過個人接觸以后，我依然在搜尋答案。

不僅對于我這個專業的歷史學者，而且對于任何在這個時候居住在德國的英國人，甚至對于大部分英國報紙的讀者，德國最有趣的一部分，大概還是它的過去——而所謂的過去，最主要的便為十二年的納粹統治。戰后的重建、民主制度的建立、施密特總理所架構起的社會市場經濟，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非常枯燥。甚至極左派恐怖主義的威脅，和一般對西德成就的強烈反應，都靠邊站了，只因為在希特勒陰影下，大家仍然忐忑不安：德國會再度成為有危險性的國家嗎？

詹姆斯幾乎和我一樣對納粹的過去深感興趣。我們合寫了好幾篇文章。我和弗里德里希，我的六八世代記者朋友，共赴迪塞爾多夫旁聽對馬伊達內克集中營警衛的審判。當一名猶太裔老太太作證說，她被關在集中營時，曾被迫將齊克隆B毒氣筒搬運到毒氣室。這時，一名德國的辯方律師立刻跳了起來，要求將那名老太太以協助殺人的罪名，予以拘捕。

我們還一起追查了有關西德總統身份的神秘案件。有人舉報說，當時的德國總統卡斯騰斯（Karl Carstens)年輕時曾加入納粹黨。一名杰出的畫家漢斯·特勒克斯（Heinz Troekes)告訴我們，他記得當他在步兵學校讀書時，卡斯騰斯系該校一名年輕教師，他曾非常驕傲地將納粹黨徽掛在身上。然而，到了這時，消息雖然曝光，身穿皮短褲民俗服裝到德國鄉間各處不斷進行親民之旅的卡斯騰斯，其聲勢卻依然不墜，沒過多久，這案子便從公眾眼前消失了。我當時還是初出道的歷史學者，也是一名實習記者，而詹姆斯這時已是資深記者，但他還是一名詩人。根據那次的經驗，他寫了一首詩《德意志安魂曲》（German Reguiem)，非常生動地抓住了德國人回憶中那閃爍、鬼魅的特質：

多么安慰，每年一兩次，

大家相聚，忘卻往事。

有一天晚上，弗里德里希打電話來，說一個叫“維京青年”的新納粹團體會在一家叫“祖國餐廳”的新開張酒吧公開露面。前些時候，美國電視連續劇《大屠殺》（Hotocausf)在本地上演并造成轟動后，他曾經去采訪過學童，并和他們討論這部電視劇。當時，弗里德里希便和他們交過手，而他們的“理論家”威脅說他們將在德國重設集中營。

祖國餐廳坐落在陶恩沁恩街上一棟難以描述的現代大樓的一樓內，內部裝飾奇異得難以用言語形容。墻壁上掛著一些小古玩，還有一張很粗糙的油畫，主題為希特勒坐在馬桶上。我們到達時，咖啡座內大約半滿，坐著的是穿著皮夾克和皮靴的年輕人。他們大口嚼著涂滿了料的面包，相互以喜劇明星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式的納粹敬禮打招呼，右手彎彎地只舉起一半的樣子，甚為滑稽。咖啡座內另一半，則是坐著的記者，前來觀察這些維京青年的行徑。大約到了午夜，什么事都沒發生，我們便離開，走到我停車附近的一條黑暗后街角落時，突然好幾個穿著黑夾克的影子沖向我們。他們手持破啤酒瓶瓶頸，而將鋸齒狀的尖角部分朝外。

從那個時點開始，我的記憶進入了慢動作放映模式。我看到惡棍從黑暗中沖進街燈照射范圍內。我看見自己緩緩地——愚蠢地——繞過汽車，打開駕駛座位的門。詹姆斯站在人行道上，徒然地揮動著手上的雨傘。弗里德里希斜斜地跑過馬路，往另外一邊高層停車大樓奔去。我一點也不記得那玻璃瓶擊中我頭部邊緣時的感覺。或許我曾失去了幾秒鐘的意識，接下來我記得的，就是詹姆斯和弗里德里希彎下身子，俯望著我，而我則從骯臟的柏油馬路上掙扎著站起來。我看著他們襯托在耀眼的街燈與叢叢樹葉之上的臉孔，和臉上恐怖的表情，才發覺事態的嚴重。接下來，就好像一部典型B級爛片一樣，我把手提起至頸部，放下，看著手指上滿布的血跡。

顯然一名惡漢的破玻璃瓶擊中了我的后腦。在昏沉與流血狀態中，一名路過的司機將我送到了最近的一家醫院急診處，由一名非常沒有同情心的老護士幫我縫合傷口。詹姆斯和弗里德里希在旁邊非常聒噪地嚷嚷說，他們馬上、立刻要打電話。那名老護士對我說：“你那邊的朋友，簡直比納粹還惡劣。”第二天，德國一家小報的記者來采訪我，聽說我已把沾到血的襯衫洗干凈了，非常惱怒,因為他想要拿著襯衫拍照。“沾血的襯衫呢？”他不斷地問。

東德共產黨機關報《新德國》（Neues DeutscWaxid)也報道了這一則新聞，他們的標題是：“西柏林成為法西斯游樂場”。為配合法西斯源自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報道指出“在多特蒙德-舒爾特海斯（Dortmund Union-Schultheiss)聯合啤酒公司贊助下”，酒店老板：

在西柏林市中心建立了一個新納粹主義和軍事主義的中心。新納粹集團“維京青年”的成員自覺受到鼓舞，對那些與他們政治理念不同者展開了第一輪的恐怖行動。他們威脅了三名記者，其中兩名為到德國來尋找有關納粹政權資料的英國人。維京青年尾隨記者到馬路上，將他們痛打一頓。到目前為止,國家司法機構尚未出面處理此事。

事實上西柏林政府和英國軍事政府都對這件事表示了濃厚的關注。我被當地的治安單位盤問了甚久，還被一名叫斯賓格勒的醫生在停尸間內做了詳細的檢查。他們找到了肇事的維京青年并將他們逮捕。我們在冷峻的法院大樓提出證言，順利地將他們定罪。

詹姆斯并非和我一樣對東德感興趣。然而，我的日記中留下了不少我們兩人認真討論那些議題的記錄。他當時曾經說，社會主義社會將往何處發展，是對像他這般左派分子來說最重要的政治問題。1989年以來左翼發生的事顯示，這個觀點極為正確。但是在當時，西方的左派分子是不會接受這個冷酷的事實的。唯一例愿意接受這個觀點的就是六八世代人。那些人曾在西柏林大街上示威過，而那些心存害怕的老太婆則揮動著雨傘、對著抗議者大叫：“到那邊（意指東柏林）去！”他們的感受自然不同。

六八世代人用自己的笨拙手法處理這種令人困惑、局促的狀況。有的人退后一步——或者應該說前進一步——設想，發現東德其實也有很多好的、進步的地方，如社會安全措施、完全就業、男女平權、所有幼兒都可進人幼稚園等等。當六八世代人年紀稍長，以記者和學者的身份描繪出他們理想中的東德后，形成的竟然是一個全然扭曲的圖像。他們其實想要反抗的是他們父母那一代粗糙的冷戰反共思想。他們并不一定親共，而僅為了反對反共而抗議示威。另外，他們心中還存在著一線希望，希望社會主義的跨世紀大計劃不會因為東柏林所施行的“社會主義”而被人輕忽、看扁了。

有一些人，如伯恩特成為東德系統，包括圍墻和所有其他東西的最積極、大聲的辯護者。有幾個人甚至更進一步。所有我后來接觸過的國安部海外情報官員，包括綽號“米沙”的馬可?沃爾夫本人都說，從六八世代人中，他們招募了許多情報員。當然，從總數而言，這些人僅代表同世代中極其少數的一群。話說回來，恐怖分子的數量也不多。不過，非常政治的那一代，大部分人卻沒有選擇政治的生涯，而僅僅將注意力轉往其他方向。他們將注意力從西德轉移至東、西、南、北，往各個方向旅行。即使在西柏林，雖然東德如此緊密地包圍在四周，他們仍努力向外看。

就以詹姆斯為例，我不覺得他對政治理念的憂慮和他對東德缺乏興趣之間有任何關聯。今天，當我們再度談起同樣話題時，他讓我聯想到一名《衛報》的東歐特派員，他小心保衛自己地盤，神勇的態度并不下于勃列日涅夫。東德也是他的地盤之一。如果詹姆斯企圖走過柏林墻的話，他們很可能會開槍把他斃了。

生于1949年的詹姆斯，是英國的六八世代人，而比他小六歲的我卻不是。國安部在我的序言報告中，對我思想的評估是有“布爾喬亞自由”傾向，大體而言，這一點也沒錯。我熱心關切我的所見所聞，而且一方面內心有一股單純的浪漫愛國思想，一方面又承繼了英國的個人自由思想傳統。我想要將那份自由傳播給其他人。我的學術英雄為麥考萊[22](#__22)[6]喬治·奧威爾、以賽亞·伯林[23](#MSDG1_ba8e26cf39784ac5a81deafac6)[7]。過去我常引用肯尼迪在柏林危機時的名言，說“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事實上，我只是取用“柏林”兩字，我內心真正的意思是說：“我是以賽亞?伯林的追隨者。”我從來不曾在這些個人政治思維中，感到他們覺得應該同情東德。不過，這種自由思想下的反共產主義，也不是我對東德感到極有興趣的原因。令我感興趣、迷惑的是，東德人在全盤與政府合作和拼死反抗極權之間，其實有無盡的選擇。在東德，我可以在一個真實的環境、真實的時間內，繼續探索成為施陶芬貝格還是成為施佩爾的問題。

在這里，我還發現了一個極端類似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在《藍胡子城堡》（In Bluebeard’s Castle)中所描述的高度歐洲文明與有系統的殘暴之間的組合。那本書，我17歲時閱讀過，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日記中，我稱這現象為“歌德橡樹”，因為在魏瑪附近的艾特斯堡有一棵古老的橡樹，傳說就是在那棵樹下歌德完成了他的傳世作品《流浪者的夜歌》（Wanderer's Night Song)。然而那棵樹后來卻被圈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營區之內。歌德和布痕瓦爾德，人類歷史上最高與最低形式的代表，在同一個地方出現。一個叫做魏瑪的地方。一個叫德國的地方。一個叫做歐洲的地方。

我對于分別代表邪惡與善良、野蠻與文明兩個極端的獨裁和反抗，有著高度興趣，驅策我進人共產主義統治的歐洲。1978年夏，我與七名英國利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一名蘇格蘭工程師和一名叫戈賽先生（Mr.Godsave)的前帝國警察，一起到阿爾巴尼亞進行了一次“進步之旅”。當地有一種摻入烈酒以增加風味的咖啡，阿爾巴尼亞人將它取名為盧蒙巴，以紀念剛果的獨立英雄派屈斯·盧蒙巴[24](#__24)[8]。我和戈賽先生一起品嘗盧蒙巴咖啡時，他對我坦白說他已經去過世界上每個共產黨國家了。為什么？“一定要認識敵人。”

第二年夏天，我開車至當時一般人心目中的東歐六國旅行。在波蘭，我發現了自己尋找已久的反抗精神。從外表看起來，波蘭窮困、骯臟、荒涼，只剩下少數孤立的地方仍展現著往日的美景。但是，在人民的力量以及波蘭籍教皇的超級力量推波助瀾下，她卻散發出耀眼的光芒。在克拉科夫，我和羅莎·沃茲尼考斯卡[25](#__25)[9]，一面吃一種叫“尼爾森香腸”的牛肉菜式，一面笑談不屈不撓的克拉科夫大主教，也就是后來的教宗，如何在當局明令禁止以后，仍打開教堂大門，讓“奧威爾的一九八四與現代波蘭”的演說能夠順利開講。在華沙，不知道挫敗為何物的瓦迪斯瓦夫·巴托謝夫斯基[26](#__26)[10],兩次分別從奧斯維辛集中營和斯大林監獄中生還，在一家熱鬧的餐廳里，以穿透滿屋噪音的嗓門對我大吼：“我們相信，21世紀的時候俄羅斯帝國必垮無疑！”和懦弱的東德是何等的對比。

回到西柏林，我發現詹姆斯決定要離開了。他問我是否愿意接下他在維蘭德街127號的租約。歷經戰亂，那棟公寓的外表只剩下一個丑陋的水泥殼子和墻壁上一些淚珠般的大小斑點，這讓人聯想到過去一度存在的美麗裝飾，不過公寓里面倒仍然十分氣派。從大門進去后，里面是一座獨立的大理石樓梯，向上經過一座威廉二世時代的石膏半身像和一個散花童子，抵達公寓的灰色的木制門。門打開，是一條長廊，足足有一座大鋼琴寬，而高度則至少有15英尺。走廊的左邊先是兩間房間，然后又是三間有明亮大窗的房間。房間與房間之間以美麗的地毯相連。過去，曾有幾名伊朗政治難民租過這房子。他們已經回到——他們以為——解放了的祖國，但是在雙人床的上方還高高懸掛著一張海報，向世人宣示：“伊朗國王去死！”

我如何能抗拒這樣的誘惑？我立刻告別特勞斯坦納街的公社，搬了進來。我的日記留下了我最后一次看見伯恩特的情景：他正要到東德出差。雖然在理論層面上，他完全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比較好的那個德國，但是實際上他并不很喜歡去。那一次，他的汽車里塞滿了罐頭、瓶瓶罐罐、各種各樣的西方產品。“你知道那里的食物非常糟糕，”他解釋道，“還有服務……”再見了，同志。

維蘭德街的公寓對一名學生而言貴得離譜。事實上，自從我到柏林以后，我非常愉快但也非常快速地掏空祖父留給我的小遺產。我祖母家中的鋼琴上面還保留著一張祖父的照片，曾經擔任過特許會計師公會總裁的祖父，照片中的他表情嚴肅。我有一種感覺，節儉成性的他不會樂于見到我把錢都用在福非、羅米哈格、艾克斯?巴克斯等酒吧，更不用說到華沙、地拉那之類的地方揮霍了。

我的銀行經理來信的口氣越來越嚴厲。為撙節開支，我做起二房東。首先，前面的兩間房，我租給了特勞斯坦納街的公社中一名美國社友的德國女朋友伊莎貝拉。然后，又來了手上總是拿著一本尼釆的白面書生丹尼爾·約翰遜。他白天會沖進房間，興奮地告訴我說他又找到了一名悲觀主義的信徒。最后，還來了波蘭雕塑家麥爾和他的妻子朵特。兩人舍棄了在波蘭的一切，來到德國，尋求政治庇護。“波蘭好，波蘭共產黨壞……”朵特用她結結巴巴的德語對其他人解釋。我完全了解她的意思。在早餐桌上，麥爾一面喝著白蘭地，一面閱讀著德國某個雕塑比賽的規則細節，他突然大叫一聲：“空襲倫敦！”他所推出的參賽作品是一對男女相互依偎，背對著令他們害怕的新世界。這就是麥爾和朵特。馬路另一頭，依然有很多咖啡廳和漂亮女孩。丹尼爾會突然開口對那些女孩說：“你可曾注意，斯坦納在用‘瞬間’這個字眼的時候，是從黑格爾的角度出發的？”把那些女孩嚇一跳。

1979年底時，我已經準備搬出這個各說各話的快樂巴別塔，進入東柏林，因為在英國和東德新近簽訂的文化協定下，柏林洪堡大學接受了我的入學申請，讓我去做研究生。

經過將近兩年的時間，牛津和倫敦似乎都已離我非常遙遠。偶爾，我會飛回倫敦幾天，看看我父母，到《旁觀者》吃個中飯，看一兩場戲，和朋友共進晚餐，并掙扎著回答朋友的問題：“他們那邊怎么樣……”雖然我知道他們問者無心，但是我這個答者卻搜腸刮肚地尋找答案。我有時候會坐火車到牛津，和我的指導教授談一談，到黑井書店走動一下。還有一次，我回到倫敦參加公務員筆試，接下來又為參加“駐外服務”的口試而回去了一次。

我們一般所謂駐外服務，大都指外交工作，但是在英國，它卻可能有另外一重意義：秘密情報工作。關于這一點，一直到我決定追查自己的國安部檔案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過。我必須要深深地掘進我的記憶、日記，翻開家里儲藏室中塵埃滿布的箱子，恢復那些細節，并重新建立起那個已遙遠的我。

記得十九、二十啷當歲，還在牛津大學部讀書時，我曾一度對間諜這個行當很感興趣。我看了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真實故事。在戰爭結束后三十年，終于有人開始寫出英國當時許多大膽驚人的間諜行徑，其中有不少還牽扯到牛津教授。我越來越感覺到其實戰爭并沒有結束，只是對象從納粹德國換成了蘇聯共產黨。我對那些替蘇聯做間諜的英國人感興趣：菲爾比、勃吉斯、麥克萊恩，以及那不知名的“第四者”。而且我熱愛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說——間諜原本便為“格林王國”最主要的行當。

當時，我特別喜歡與一名大學部的同學聊天，兩人常常喝著咖啡，一聊就是大半天。后來，我發現他的父親是MI5的特工。不過，雖然那時候我很迷格雷厄姆?格林，對間諜工作的興趣，大致可以說和戲劇、現代建筑、文學、政治平分。

在我記憶深處，還保留著那么一幅圖片：一個陽光滿地的早上，在艾克塞特學院的前庭，一名看起來穿著隨便、面容和善的大個子，站立在學院院長旁邊。我只記得他神秘兮兮的語氣，但已想不出說話的詳細內容，只記得他大致上說：他聽說我對這種事情有興趣，他是否該替我與倫敦的某個人聯絡一下？

今天回想起來，那簡直像電影的開場，而不是真實發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情。陽光斜灑在牛津學院的草地上，金黃色的砂巖墻，一名穿著蘇格蘭呢夾克的導師繞過前庭，到教堂下，在一名面容清新的大學生前停了下來。我們只能隱約聽見他們分手時的片段對話……“和倫敦聯絡……”“謝謝，院長……”

在我家儲藏室的一個埋藏在雜物中的大箱子里，我找到一封信，日期為1976年8月6日。信頭上印著的發信機構，是默默無聞的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部，地址則在倫敦中心。“據聞，閣下有興趣了解在本部追求職業生涯，而本部門的功能便為征才。”隨信附有一張表格，建議“進一步談話”。“如果你需要特別為此來到倫敦，本人自將補助二等車廂火車票價。”下面簽字的名字，我1995年查“外交事務人員名單”時發現，是一個真名。

現在，我在腦海中，還可以看到那個略帶佝僂、頭發漸禿、下巴上有個疤的男人。在對話中，我只記得他對我強調，在這個單位工作生涯中，將不會獲得外在的名聲，也沒有榮譽獎勵、頭銜或社會認可。以當時——二十一歲——的我而言，只覺得他的話可笑。就算今天，我仍覺得那情勢很可笑，但我已比較可以想象年屆四十，在那單位工作，表面上為外交官，實際上眼看著和你同年代但或者還沒有你能干的人往上爬——成為領事、公使、大使，獲得贈勛、贈爵，是什么滋味。正如同一句玩笑話說的：“叫我上帝，請叫我上帝，上帝都叫我上帝。”[27](#__27)[11]1995年時，我查到“外交事務人員名單”上當年負責與我談話的人，現在的職等為“一等秘書”。沒有人叫他上帝。

當時，無論如何我太年輕，不適合進人這種單位，因此回到牛津繼續讀歷史。根據我自己的陳舊檔案，1978年離開柏林以后不久，我再度提出申請，而且還保留了一份申請的影本。在“興趣（社會及政治活動，主要閱讀方向、藝術、科學興趣等等）”欄下我發現自己寫了一段：“國際事務、兩德、東歐……閱讀時事、現代歷史、現代歐洲文學、英國文學、一般性評論、報刊。”我還承認自己為英中了解協會（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的會員。該會是一個溫和的左派組織，我的加入完全是因為當時對中國感興趣(那本《毛語錄》的小紅書，現在還擺在我的書架上）。在介紹人欄上，除了院長以外，我還寫下了我的叔公休伊?林斯特德爵士，他是退休國會議員，也是我的教父和快要成為高等法院法官的律師。他的杰出成就尊貴，他的尊貴源于杰出。

我于1978年秋參加公務員考試（“建設性思考”只占總分的百分之十，我在日記中寫道），然后又于1979年初參加了所謂的“文職人員甄選委員會”考試。委員會同時選拔外交和秘密情報工作人員，而就像許多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一樣，那僅為我人生——定型以前——許多選擇中的兩個而已。1979年5月17日，我特別從柏林回到倫敦，參加秘密情報機構冗長而仔細的面試。我在日記中寫道：“兩個半小時。面試。好一場游戲。”然后，我去參加了一次皇家學院的展覽，打了一個電話給麥爾文-拉斯基（Melvin Lasky,《邂逅》[Encounter]雜志主編兼冷戰老兵），才回到柏林，“心中仍甚為起伏”。

現在回想起來，我在腦海中還依稀可見白廳內的辦公室，厚厚的地毯，紅色的皮沙發，深色的木頭裝潢，一張長桌子。桌子后面坐著一排人，我認識其中一名為牛津歷史學的老教授。整個面試過程，我只記得其中有一段，是他們要我假裝自己是一名英國“外交官”，在巴塞羅那與一名可能的線民接觸。線民的角色由桌后的一個人扮演。我唯一記得很清楚的是，我自己在那段假裝的對話中，隔不多久就重復一遍：“再來一杯吧！”桌后的人似乎覺得很有趣。

在我檔案里，我還發現了另外一張手寫的紙條，是和那次面試有關的。自己已有部分難以辨識，不過除了提到“巴塞羅那”以外，還有利比亞、“對歐洲共產主義觀感”以及一行“背叛朋友”的字樣。難道在面試中，他們問了如何在背叛朋友和背叛國家中做一選擇的老問題，還是什么來著？

從日記中，我似乎在1979年6月日，再度從柏林飛回倫敦做身體檢查，并至秘密情報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簡稱SIS,更常被稱為MI6)的總部接受安全檢查。完了以后，我被帶到泰晤士河南邊的一個無名辦公室，接下來又到“河之南”餐廳吃中飯。有關那次訪問，我的記憶稀疏，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接待大廳和辦公室毫無特色到非常特別的地步：灰色的檔案柜、擁擠的辦公桌、穿西裝的男人；和旺茲沃思區自治會的住宅科辦公室沒什么兩樣。

然而，有關那次，我的日記記載卻比較豐富。在回到特勞斯坦納街公社以后，寫下了部分的印象：“辦公室、公司、情報工作……快樂的秘書和小弟。有個醫生，看起來像馬科爾·蒙格瑞奇[28](#__28)[12]……正在為一名有酗酒問題的人做咨詢。手法業余。故意的馬虎。”“總之，”我寫道，“相當荒唐——但毫無疑問，貝蒂，雖然看起來有一點毛毛躁躁，其實是極其銳利的。”那個貝蒂還問到我的父母和兄弟：“他們知道這件事嗎？”

我注意到：“GG成分（GG指格雷厄姆·格林）……神秘感。一種屬于精英階層的感覺。游戲般的挑戰。”但是，我同時覺得非常不安。一方面我可以感受到帶我去午餐的那名官員很圓熟、有文化，但我對他的評論卻是“或許這也算（當然在程度上要小太多）英國版本的‘歌德橡樹’”。當我提到我想到蘇聯陣營內旅行時，他那“邪惡的警語”在我耳邊響起：“我們寧愿你在我們控制范圍之內。”日記的結論是：“在回程的飛機上，讀著朋霍費爾[29](#__29)[13],發現——再發現——自己對學術的高胃納量，我幾乎立刻決定，要往哪邊跳了。”

不過，檔案夾中最后一張文件，日期為1979年6月21日，是我從特勞斯坦納街公寓發出的一封短信，里面只寫道：“我希望能將開始加人貴部服務的時間，展延至1980年9月。”顯然為謹慎之舉，保留未來的可能性。辦完這事后，我便開著汽車，到蘇聯陣營內旅行了兩個月——在無人控制的范圍之內。日記中最后一次和這事有關的記錄，是在1979年11月，我寫道：“‘我們要你在我們控制范圍之內。’所以，不必了。”很顯然，我在去東柏林前，就已經決定不加入秘密情報工作了。

在英國，和秘密情報工作有關系，向來可以沾惹上一種莫名的冒險與魅力的形象。許多有名的作家、傳記家、歷史學家，在人生的某一段時間，都曾和秘密情報工作組織有過往來，從毛姆到霍恩(Alistair Horne)到休·特雷弗一羅拍（Hugh Trevor-Roper)都如此。但是，在看過國安部檔案，在經過了多年沉浸于中歐事務，我現在就不如以前覺得那么有趣了。雖然我從來沒有加入過秘密情報工作，但是我可以想象自己對一名捷克或波蘭的朋友解釋自己身份時，他們立刻會將“秘密情報工作”聽成“秘密警察”。我不知道要如何解釋，才能夠讓他們理解——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當時一名經過公立高中、牛津大學怪誕教養養成的大學畢業生對那職業的神秘向往。這就好像他們如果不追溯到已經記憶模糊的童年，幾乎無法對我解釋一些事情一樣。

是怎么開始的？是孩提時代所閱讀的吉卜林（Kipling)小說《金姆》（Kim)嗎？我不是想找借口，但那很可能是真的。由于我的祖父曾在大英帝國下的印度政府中擔任過公職，使我對參與印度東西前線的“大博弈”的那種壯烈與浪漫極感興趣。當我去祖父母家玩時，他們告訴我很多以前的故事，令我神往：騎著大象進人叢林，走路到俱樂部的途中一只老虎突然跳了出來等等。

還有我父親對戰爭的記憶。他曾經告訴我，他如何隨著第一波的兵團，在1944年登陸諾曼底海灘。還有我母親，她曾把我拉到一邊——當時我好像才六七歲——給我看父親在軍中得到的勛章和獎狀：“在諾曼底連續激戰中，展現出冷靜、不顧危險的軍人特質……在整個軍事行動中，他的品德、勇敢和盡忠職守的態度，令人欽佩……”盡管文字僵硬、古板，但內容至今仍能深深地讓我感動。

八歲起，為“塑造堅毅的人格”，家人遵循傳統，將我送進了只收男生的寄宿學校。在圣愛德蒙教堂的紀念日禮拜，通往舍伯恩那座教堂的冰冷臺階上，刻在墻壁上的陣亡者姓名，耳提面命著我們不要忘記愛國、服務、犧牲；每次畢業典禮，學校更會邀請戰爭英雄，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真實故事。除了吉卜林，我還讀過約翰?布坎（John Buchan)的作品，以及青春期在好奇心驅使下讀了托爾金(Tolkien)和弗萊明（Ian Fleming)的兩度空間、虛構的“007”邦德(Bond)故事。再加上，為在寄宿學校生存，所有孩子必須從非常小就學會獨立，以及，像金姆一樣，建立起秘密的習慣。

我如何將這一切的一切，解釋給一個從來沒有經驗過類似過程的人聽？

我可以理解為什么有人會想加入。基于秘密世界的本質，只有他們才有資格說里面是什么樣子的，然而他們卻不能說。雖然我并不完全知道自己錯過或避免了什么，但是我很高興我并沒有真的加人。我仍然反對共產主義，但是卻是以作家的身份，用的是自己的方法來對抗它。

從那次以后，我再也沒有和MI6有任何接觸，或至少，我應該比較小心地說：我從來沒有和他們進行過任何有意識的接觸。不過，偶爾，當我旅行到不同的國家時，英國大使館中都會冒出來一個奈吉爾或迪克或凱瑟琳之類的人物，高高興興地要請我吃中飯，或邀我去喝一杯。這時候，我心中不免一驚：可能是間諜。我毫不懷疑，其中有一兩人必然如此，但是他們不會告訴我——而我更寧愿利用時間與本地人談話，因此經常放棄這類約會。

然而，英國秘密情報工作組織的確包圍在一團神秘的云霧之中，許多英國海外的記者、作家、學者，經常被認定為情報組織的外派人員。不僅國安部會懷疑我，在柏林的德國新聞記者也會懷疑詹姆斯?芬頓是間諜，例如，我在柏林認識的波蘭朋友也會懷疑我是否另有身份。而詹姆斯和我兩人坐在酒吧中閑來無事時，也會聊起某斯蒂芬或某凱爾文之類的人物會不會替MI6兼差工作。在很多時候，那只是隨便閑聊，甚至惡意中傷，但是有的時候，懷疑中卻不免有幾分真實。有的“記者”或“學生”的分量不僅為其外表身份所代表的。

所以，國安部決定要好好調查一下我的身份，我既不驚訝，也不生氣。真正令我震驚的是他們偵察自己人并讓自己人互相偵察的部分：在那個碩大的監視、恐嚇、鎮壓的系統下，什么“舒爾特”、“史密斯”、“米夏拉”，都只是微不足道的爪牙而已。相較之下，對我的事實調查還算在秘密情報工作的“正常”范圍之下。1994年，在我展開了這本書的調查后不久，英國保安局（MI5)局長斯特拉?里明頓夫人發表了一次演說，在演說中她提到：“有的政府仍然想以各種辦法——包括招募他們在英國大學的學生——違反國際協定，獲取他們想要的情報。我們現在正與各方密切合作，設法找到這些人，并防止他們工作。”

當時，雖然我對英國政府沒有秘密任務，但卻有一些私人的秘密任務。我利用假名替《旁觀者》寫稿子，并且，顯然在不準備告訴東德當局的情況下，大力搜集有關東德極權主義的資料。而我知道得愈多，對那個政府便愈厭惡。我是否秘密地在為文字顛覆做準備？答案，毫無疑問，是肯定的。

對東德這樣一個建立在媒體控制、新聞檢查和組織性欺騙的共產國家而言，探索性研究或批評性新聞當然是有顛覆作用的。西方記者，經常在國安部反情報部門n/13的監視之下。監視的部分理由是，他們想要找到以記者為掩護的間諜，同時也因為在國安部的眼光中，記者與間諜之間其實并沒有明顯的界線。他們認定，西方記者和西方間諜同樣都為西方搜集情報，而且同樣都是共產主義體制的威脅。

當然，所有國家政府都希望能適時制止令他們尷尬的調查詢問，而且能夠隨時指對他們的批評為“顛覆行為”。西方政府在冷戰期間，便多次犯下類似的錯誤。然而，我在東德的所作所為，在西德、英國或美國再怎么也不會被認定有顛覆嫌疑。兩者之間的差異，并非一邊為純白的新聞自由，另外一邊則為純黑的新聞完全管制，而在于淺灰的大致自由與深灰的大致不自由之間。東德的灰色屬于非常深暗的那一種。

我和國安部不同，認為秘密替政府做間諜工作與（有時候也需要秘密地）寫作是涇渭分明的兩回事。不過兩者之間到底還有一些相似之處，而且從德文來思考時相似處就更明顯了。例如，西德的秘密情報局（Bimdesnachrichtendienst),照字面上翻譯，是“聯邦新聞局”。相反的，德國人最早稱報紙為Intelligenzblatter,也就是“情報紙”的意思。甚至在英國，《旁觀者》19世紀的創刊號上揭示：“新聞的主要目標便是傳遞情報。”作為《旁觀者》的一分子，從古老的角度來看，我的確是在做“間諜”，只是我們是在為讀者做間諜，搜集情報。

我并非唯一私下搜集情報者。許多寫下獨裁政府暴行的記者，也都經常做類似的事，甚至我們不妨說，大部分的記者有時候總不免做同樣的事。而且不僅記者，作家有時也不免涉獵情報搜集的工作。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自傳中便提到：“每個小說家，和間諜至少有一個相同的地方：他觀察別人言行，傾聽別人間的對話，尋找別人的動機，分析他們的人格，而且以文學之名，如此寡廉鮮恥。”可是，他為什么能有資格寡廉鮮恥？為什么以“文學”之名，他就能如此做？

# 第三章  跨越圍墻

終于要跨墻進入東柏林的前一晚，我開了一個派對，將維蘭德街127號公寓內各個房間之間的雙重門都打開，并把我在西柏林認識的朋友全請了來。根據我的日記記載，當我終于上床睡覺時，已是1980年1月7日凌晨4點45分。6點過一刻，我便起床，將行李打點完畢，開車經過查理檢查哨和東德邊防哨（“滿臉是笑”），沿著白雪覆蓋的菩提樹下大道，經過亞歷山大廣場和申豪森大街，來到我的新家——東柏林工人階級住宅區的普倫茨勞貝格區埃里克維納街24號。

檔案中，線民舒爾特的報告特別提醒了我當時的居住狀況。字打在擁擠的稿紙上，舒爾特寫道：“房間不算大（尤其以陳舊的房屋而言），有一扇窗戶直接面對大街。房間的門從里面開出，有安全鎖，顯然是最近才安裝上去的。除了一張床鋪以外，房間內還有—張桌子、一雙椅子、一個大柜子，該住客——經我發現——大多用來儲放書籍。報紙散在桌上（我注意到最上面有好幾份‘星期天’[Soxmrag]，從標注等可看出是經過仔細閱讀后閑置于桌上的）。除此以外，桌上還有幾本字典。”舒爾特沒有寫出來的是——或許他已經太習慣了——房間內燈光昏暗、墻壁棕黃、地板上有咖啡色的污點、燈泡外是廉價的塑膠燈罩和屋外足以將人凍僵的冬寒。

在這個房間內，我居住了整整九個月，一直到1980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建國三十一周年的那一天，我離開了東柏林為止。那年東德，與往常一樣，以軍事游行來紀念建國周年，而西方，也與往年一樣，無力地提出抗議，指稱俄國違反了1945年四強所簽訂而至今仍在理論上有效的軍事協定。我在前往觀看游行的路上，遇見了一名愉快的美國黑人大兵，手上抱著一個紀念莫斯科奧運會的玩具熊，在亞歷山大廣場游蕩著。當嘰嘰咕咕笑個不停的少年先鋒隊員把巧克力和花送給恩格斯侍衛部隊時，我看見一名穿著卡其制服、戴著綠扁帽的英國軍官，用一個攜帶式樓梯一會兒上、一會兒下地忙著拍照記錄下整個過程。隨后，我看見恩格斯侍衛隊，槍管上塞著民眾送的康乃馨，操著大步離開廣場。

歷史書上記載的1980年1月至10月，為東西沖突升級的時分。5月，西德不情不愿地加人了由美國主導的抵制莫斯科奧運會行動，以抗議蘇聯人侵阿富汗——很顯然美國人的信息，并沒有傳達到那個抱著玩具熊、在東德大街上閑晃的大兵。8月底，波蘭出現新一波的罷工，迫使副總理不得不與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內的罷工者簽訂協議，接受了工人成立獨立工會的要求。這是共產黨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新的工會取名為“團結工會”。有些作者認為這是“第二次冷戰的開始”，雖然聳動，但是卻忽略了一項事實：冷戰其實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我的個人生活也開始直接進入大世界的歷史進程中，我首先在東德、然后在團結工會革命期間進人波蘭，公私交錯。從絕對距離上來說，我在西柏林的寬敞公寓和我在東柏林的小窩之間還不到十里，但是心理上，兩者的距離卻似在好幾千里以上。我不時地往西方跑，我的檔案正確地記錄下我每次跨越邊界的日期和時間。另外，西柏林的朋友也會打電話過來，或到我東柏林的小窩拜訪。

然而，我卻發現自己在搬到東柏林不到十天以后，竟然認真地思考起來：“對與原來在西柏林生活時認識的人保持聯絡，不僅漠然，甚至……簡直是積極逃避。為什么？我發現，他們大部分關心的事（相對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人類的尊嚴在公平、正義、和平之名下被矮化了、蹂躪了。重要的是有人只因為想要離開那個正好是他們出生地的國家，就被關進牢中，而且一關好幾年。重要的是阿富汗現在發生的事情。”過了幾個月，艾琳打了一個電話給我，我才想起：“哦，那個世界，那個電話‘關系’，永遠扯不完的‘關系’的世界。”

在東柏林，我還是想繼續研究畢業論文的主題：第三帝國下的柏林。國安部檔案中，有一份我在牛津時的導師蒂姆•梅森和托尼•尼古拉斯寫給柏林英國辦事處的信，要求替我這個在新文化協議成立后的第一名研究生妥為安排。蒂姆•梅森是一名非常能啟發學生思考的老師。他在牛津所有歷史學家中非常異類之處在于，他是一名馬克思主義信仰者，雖然他信仰的是非常不傳統的、摻有英國帝國思想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因此，用國安部的尺度來衡量的話，他還算不上是馬克思主義同路人，因為在我的檔案中，他們對他的評估是“布爾喬亞一般民眾”。蒂姆•梅森在圣彼得學院的辦公室中，懸掛著兩張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海報，上面宣示著：“每個人都在談天氣——我們可不！”這基本上反映了蒂姆•梅森內心對英國中產階級生活于瑣碎之中的不屑，更表達出他高度的認真，以及幾乎讓人痛心的清教徒式的工作倫理。很不幸，幾年以后，他以自殺結束了生命。

讀罷他的推薦信，我的內心充滿了感激與恩典。他和托尼•尼古拉斯恐怕對我很失望吧，因為我最終并沒能以希特勒統治下的柏林為畢業論文題目，不過我想他們會看出我為什么要改變題目。牛津歷史學院最好的地方之一，便在于它能納百川，就算偏執怪異者也能融人其中。“在歷史的屋宇中，有許多大殿。”當時的現代史教授理查•庫伯如斯說。他自己便是個血性漢子，喜歡探索這門學科的極限。我還記得每在陰沉的星期五下午，我坐在泰勒利安中心(TaylorianInstitution)一"暗郁的角落，教室中稀稀落落的學生一同興致盎然地聽他大放厥詞的模樣。

事實上，我的確花時間在資料庫中，東德政府卻嚴格限制我使用相關的檔案，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他們害怕在完全閱讀過納粹記錄以后，我會發現共產黨對納粹的反抗是多么微弱，而他們對蓋世太保的滲透又是多么深。然而，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反法西斯抗爭”，是東德建國最原始的神話。此外，我也經常跑菩提樹下大道上的老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在它的所謂特別研究部中，保留著所有國家不想讓一般民眾閱讀的書籍和刊物。在我翻閱泛黃的納粹報紙《國家》（Vo止r'scAerBeobaArer)時，國安部手下的武裝部門“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侍衛部隊，便派遣一名資深官員坐在我旁邊的一張桌子上，順便研讀西德的新聞刊物和西方的武器雜志。

每當我將目光從納粹報紙轉移至國安部軍官身上時，我的注意力便從希特勒的德國切換至昂納克的德國。在當時，我便打定主意，要寫一本有關德國極權主義的書。共產主義堅持清貧，我的日常生活也被迫大大地簡化：房間從五個變一個，面包從可選擇長的、短的、甜的、咸的等變成只有一種厚重的黑面包，而且還只能在晦暗的國營街角商店才買得到。但是生活被強迫簡化后，我竟也就更專心一致，將精力全部放在搜集資料上了。

線民舒爾特非常正確地觀察到，我非常仔細地研讀媒體報道。我看電視、聽收音機、閱讀寫作風格比較大膽的現代小說，以彌補新聞不自由的缺憾，并且我時常去看戲。柏林劇團已經快要成為一個布萊希特陵墓，但是在德意志劇院或民眾劇場，我卻似乎能嗅到一種詭異的文化抗拒氣息，與我所研究的1930年代柏林的感受非常類似。有時候，不同的抗拒感可能會從同一間劇院甚至同樣的劇本中發出。我記得，例如，在德意志劇院中，有人朗誦了一段海涅的《德國：冬日故事》（Germany\_•AWafer’sTaie)，讓我感受到莫大的震驚：

我又看到了普魯士士兵，

他們總是一樣的。

一陣笑聲。

他們昂首闊步的樣子還是一樣的僵硬，

又直又細，像蠟燭一般，

就好像他們吞下了士官長的棍子，

老弗里茨知道怎么處理這檔事。

那棍子從來沒有完全消失過，

雖然它的原始用途已被禁止。在手套里有更新的方法，

但是那只手還是原來的鐵手。

我在東柏林的行動非常自由，因為我持有研究生的簽證，可以在全東德自由旅行。相較之下，西方報紙的通訊員每次離開東柏林前，都要申請特別許可，想必所受的監視程度在我之上。我的日記中多次怨嘆，在東德坑洼不平的道路上旅行時，汽車不幸拋錨，必須付出大筆的修理費。我第一次去萊比錫參觀商展，有機會近距離看到東德共產黨黨魁昂納克，非常驚訝他的個子竟然那么小。我去德累斯頓，參加一個紀念1945年2月英美聯軍轟炸該市的周年活動。“啊，你們為什么要轟炸我們？”一名中年婦女在咖啡館內問道。我去格來弗斯瓦爾德拜訪我的朋友羅爾夫\_阿希姆•克魯格，當時他正在那里學醫。我還去了波羅的海的呂根島，并和安德莉及她前夫一起去什未林看了一場很不精彩的歌德《浮士德》戲劇表演。另外，只要情況許可，我盡量會到圖林根的小山區樹林里走走，那是我最喜歡的一塊德國土地。另外，當然，我還會去德國歷史上最美好也是最惡劣的地點魏瑪。回到首都以后，我和一名波蘭朋友一起到柏林大舞廳，那種每張桌子上都放著一臺專線電話的舞廳，看到漂亮女孩，我們便撥她們桌上的號碼。不過，那里是東柏林，可想而知，電話是壞的。

通常，我無論走到哪里，都會設法和當地人交談。不過，他們事后都將我們的談話記錄下來。相互的溝通在剛開始時便不免因懷疑而有了障礙，加上對國安部的恐懼，以后溝通上的困難只會越來越大。我并非事后想到，才將恐懼加諸記憶之上。在當時就有很多朋友警告過我。例如，在什未林時，有人告訴我們：“小心！演浮士德的那個演員就是替國安部工作的。”密探在萊比錫的商展中，更多得像蒼蠅一樣。羅爾夫懷疑連我的汽車里都被人裝了竊聽器。夜晚急駛在公路上，羅爾夫教我一面唱沃爾夫•比爾曼的抗議歌，一面還不忘調侃道：“樹枝上的綠葉有接收功能的話，那他們就學會歌譜了。”

我居住的公寓附近有一家小酒店，是我經常流連之處。亮木漆裝潢和年老色衰的女侍，令我至今印象深刻。東柏林無論哪家餐廳或酒店座位總是不夠的，因此我在酒店中經常必須與人同桌。有一次，我一面喝啤酒一面等著我點的炸牛排時，同桌的三名年輕人大聲地開始抱怨他們的軍役。突然間他們停下來，以懷疑的眼光看著我這個安靜但顯然在聆聽的桌友，并展開了他們的非正式訊問。首先發難的是三人中留著濃密胡子的小伙子。“如果你說你是歷史學家的話，”這名穿著加州大學T恤衫、右手少一根手指頭的年輕人對我吼道，“你說，卡爾•馬克思出生在哪里？”幸好我知道答案。“好吧，誰是1930年德國共產黨領袖？”我又答對了。“嗯，誰讓希特勒獲得實權？而且”——他已經無法控制自己——“別他媽的告訴我，是專制資本主義。”

最后我掏出一張英國的付款卡，讓他們完全解除戒備，不再對我有任何懷疑。加州小子向我道歉，并告訴我他的故事。他二十二歲，父母都居住在西柏林。柏林墻堆高起來的那一天，三歲的他，正好到東柏林的祖父、祖母家過夜。東德政府從此就不讓他離開。他被人認養、長大，在軍中服役時丟了一根手指，現在是電車司機。有的時候，他的父親會開著發亮的奔馳汽車，帶著小禮物，從西柏林過來看他。他身上穿著的加州大學T恤衫便是父親送的禮物。

這就是他的故事。或許令人難以置信，雖然毫無疑問，中間一定有很多重要的細節——可能是錯綜復雜的家庭關系——他沒有說出來，不過，曾有一名處理過這種案件的律師估計，1961年8月圍墻一夜間砌起來時，有四千名之多的兒童因此和父母分隔開來。在我最近發現的一批前總理勃蘭特的文件中，就有一篇機密報告，表示在1972年8月的時點東德還控制著一千名這樣的孩子。所以，加州小子的故事很可能是真的：他就是那些未能離開的孩子之一。

無論如何，他對體制有極大的仇恨。“阿富汗？”他說，“美國人應該從巴基斯坦開進去，把俄國人都趕走。”的確，他們需要從內部邀請。不過，俄國人不是已經創下先例，顯示這種事該如何安排了嗎？看看捷克共產黨，不是就在1968年邀請了蘇聯去“拯救”他們的國家嗎？還有巴布拉克•卡爾邁勒[1](#__1)[1]最近不也替阿富汗提出了類似的邀請嗎？

在埃里克維納街的另一頭，一個后院的閣樓上住著一名藝術家，是我在普倫茨勞貝格的溫和異議藝術社區中所結識的。他寫詩、作曲，胡須永遠看起來像兩天沒刮一樣，我給他取了一個諢名“青年布萊希特”。1968年，青年布萊希特，為抗議蘇聯人侵捷克，與在讀同學組織了一次朗誦會，宣讀了真正的布萊希特《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史維克》（Schweyk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中一段精彩的反納粹反抗歌：

但是時間無法駐留。

現在掌權者無盡的野心，正在走過它的路，

就像滿身沾血的斗雞，必須為地位而爭，

但是時間無法駐留，就算用暴力也不行。

在興奮中，他寫了一封信給朋友：“我們正在搞一個反抗組織。”就因為這封信，他被判了兩年半的徒刑，真正在監獄中則待了十五個月。等他被釋放時，母親已移民西方，他們不準他母親來探望他，也不準他去探望母親。

他考上了柏林洪堡大學，但是因為曾有坐牢記錄，結果沒能錄取。然后，他申請移民，也被拒絕。他的妻子離開了他。現在，他一星期在一個公共墓園中工作三天，其他的時間則游晃在普倫茨勞貝格的波希米亞社區中。我還記得西德一家很有名氣的自由派報紙的駐東柏林記者，也認識青年布萊希特。她有一次對我說，她覺得青年布萊希特在圍墻后替自己經營起一個相當快樂的生活圈。

加州小子和青年布萊希特是極端的例子。比較典型的，應該是我的房東夫婦。柏林洪堡大學便是替我向這對年輕夫妻租的房子。他們有知識，受過高等教育，經常觀看西方電視節目，因此也非常了解外界發生的事。不過，他們將全部精力傾注于個人生活中。他們在離柏林開車半小時左右的一個小湖邊擁有一棟小別墅，里面的一釘一木都是兩個人親自動手完成的。他們非常驕傲地向我展示房屋的電動打水泵、屋頂上的小陽臺、為夜間打乒乓球而裝的聚光燈。他們甚至在屋后搭建了一個小碼頭。

我的朋友安德莉也專注于經營她的私人世界，在柏林市郊老舊別墅區域的獨特氣氛中專心帶大她的孩子。假日的下午，她會在慵懶的氣氛中，蒔花植草、騎腳踏車、到附近的湖泊駕駛帆船或游泳。優美的田園生活，尤其對孩子們而言。他們的生活隱藏在“內部移民”、“無關政治的德國人”之類的大字眼之后。

我故意很少和西方記者團接觸，一方面因為我想要獨力發掘這個世界，另一方面也因為我害怕與他們接觸會引起當局的懷疑。不過，我卻或許在這一點上不夠細心，經常和一名路透社的記者馬克•伍德會面。在路透社的申豪森大街辦公室墻壁上，釘著一圈老式電報的長紙條。上面是一篇悼念希特勒副手魯道夫•赫斯（RudolfHess)的文章。他是斯潘道森林監獄的納粹戰犯中存活到最后的一個人。在馬克之前，恐怖小說作家弗雷德里克•福賽思（FrederickForsyth)也曾是這辦公室的主任。他曾替路透社寫過一篇有名的稿子。1964年4月的一天深夜，他正在回辦公室的路上，看到許多俄國坦克車正轟隆轟隆地駛向市中心。他立刻寫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文章，急電至倫敦。在文章上他特別標明“八鈴快報”。老式的電報機，讀到這個地方的時候真的會響八次。故事發出去以后，他便出門去偵察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等那篇宣布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文章已傳到全世界后，他才發現坦克車是為了例行性五一勞動節游行而開進城里的。福賽思很快就被調離柏林辦公室。

在1月的一個下雪天，我和馬克驅車至萬德利茨，一個高墻厚壁警衛嚴密的社區，里面都是黨政高官的別墅，擁有特別的商店、大片的花園。門口的警衛非常仔細地檢查我們的護照。當我們假裝無知地問他，那個社區是干什么的時候，他非常緊張地回答：“沒什么。”接著，一名資深的軍官告訴我們那是一個“軍事標的”。

在檔案上，我發現“部門”的個人安全（負責領導人的安全）主任打了一份報告給XX/4部門。報告中將高官的住宅區形容為“高級代表的居住標的”，并記錄下我們是于17點55分乘坐一部深綠色（實際上應該是深藍色）阿爾法羅密歐來到門口，詢問有關如何到萬德利茨一家餐廳的事宜，而于18點15分被“驅離”標的。讓我并不驚訝的是，報告中還提到，馬克是在Ⅱ/13(記者）的監視范圍之內，而我則因為“山毛樣”牧師的關系仍屬XX/4管轄之下。

我們在馬克辦公室旁邊的公寓中喝酒、聊天。到半夜一點左右，電話鈴聲響起，只聽到一陣沉重的呼吸聲，然后電話便掛斷了。又過了半個小時，電話鈴聲再度響起：“我知道你有客人。”我們猜想他們一定太無聊，或者想催我們快點睡覺，以便早早收班。知道這地方一定有竊聽器，我們便故意大聲地譴責起《旁觀者》中“愛德華•馬斯頓”——也就是我——最近寫的一篇文章。“你看見馬斯頓那家伙最近寫的文章嗎，蒂姆？”“看了，真糟糕，對不對。他一定又喝醉了。”我問了舒爾茨女士，有沒有馬斯頓這名人民公敵的檔案，但是，老天保佑，中央建檔中心沒有“愛德華•馬斯頓”這檔案。

今天，馬克已成為路透社總編輯，在兩德統一后，有人告訴馬克他的隔壁就是一個國安部的監視中心。監視中心的線路，直接連接上路透社墻壁里面的竊聽器，其中有好幾個還是裝在臥室中的。另外，他們還在對街設立了一個視覺監視點。在技術面上，國安部的手法經常超出了西方最狂野的幻想。

當我想從一片無盡的晦暗與服從中逃脫出來時，最喜歡去的一個地方便是維爾納•克雷奇爾牧師的家。克雷奇爾個子高大，臉龐寬實而線條堅毅，完全反映出路德教徒的形象，而他的聲音厚重如音樂一般悅耳。克雷奇爾先祖中有許多神父與軍人。當年柏林墻筑起來的時候，他還是一名二十一歲的神學院學生，正非法在瑞典度假。經過和兄長冗長的討論后，他終于決定回到東柏林。當時西柏林有一群學生非常熱衷替人偽造證件，幫他們從東德逃脫出來。當他們知道克雷奇爾要從西柏林偷偷溜回東邊，因為他理論上人還應該在里面時，不禁感覺可笑。今天，他說他仍然只能夠從當年錯綜復雜的思緒中理出一半的動機，其中之一便是他覺得回去會比留在西方“更有需要”。

東德的確十分需要他，一名教區牧師。這個號稱從襁褓到墳墓都由政府照顧的社會主義國家，什么都缺乏，牧師的照顧自然也非常缺乏。后來，他成為潘科區主教，更被周圍人所需要。那些前來教堂的人想要尋求的，倒不是真理中的信仰，而是一些自由，因為至少在教堂中他們可以說一些實話。

每次一面在喝咖啡或葡萄酒時，維爾納便會一面用他豐富、略帶老調的德文告訴我，他如何與黨政官員溝通談判。維爾納沉浸于朋霍費爾和第三帝國期間教堂告解的傳統，仍然相信與共產黨進行對話能產生良好的結果。然而，他也告訴了我政府的鎮壓以及他的家庭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他的大兒子約阿希姆受到了和許多其他神職人員的子女同樣的待遇，沒能獲準上普通中學。

我非常珍惜與牧師的談話時間，以及在牧師家中特有的溫暖與寧靜。偶爾，我們也會一起出去吃一頓晚餐或聽一場演講，甚至手持著馮塔納（Fontane)的《勃蘭登堡之旅》（Travels around the Mark Brandenburg）當作旅游指南，一面開車駛過勃蘭登堡鄉間。一百年來的改變竟然如此之少！

我的檔案中，記錄下好幾次與維爾納的晤面。有些在我的檔案里，有些在他的檔案里，有的則同時存在于我倆的檔案中。最短的一次記錄為1979年10月17日，一名線民在腓特烈大道上看到我，時間為18點35分，但是在18點45分時就跟丟了。根據我的日記，那天我正要去見共產黨作家斯蒂芬•赫姆林 (StephanHermlin)。

根據記錄，1980年2月27日，“羅密歐”、“山毛櫸”和他兒子一起到市立圖書館。“17點40分，白櫸樹將他的寶馬車停在市立圖書館前面。三人一起進人建筑物，將大衣交給衣物寄存室，前往二樓演講廳。三人共同聆聽了一場有關普魯士歷史及普魯士帝國的演講。”有人或許可以說，這線民的報告本身，便是普魯士歷史上的一小頁，與普魯士傳統之間雖然有著深厚聯結的維爾納并不愿意接受這個說法。

在維爾納本人的檔案中，我發現同一份報告，但是卻小心地保存在一個襯里的信封中。與報告一起的，是幾張我們三人正要走進圖書館時的黑白照片，想必是用隱藏式照相機所攝下的。我可以看見維爾納的大個子、堅毅的臉部線條。他當時四十歲，和我現在同年。年輕的約阿希姆身材瘦小，幾綹卷發貼在臉頰兩側，神情像極了羅曼•維希尼克[2](#__2)[1]動人心弦攝影作品中，1939年以前東歐猶太社區消失前的那些小男孩的模樣。約阿希姆當年十二歲，正好和我大兒子現在同年。而那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二十四歲，沒蓄胡子，短短的頭發幾乎中分，蘇格蘭呢夾克的上面口袋還塞著一條手帕，法蘭絨長褲，還有，毫無疑問的一雙牛津鞋。

我的日記，還記錄下在聽演講前三十六個小時中，那個似我非我的我所安排的生活。早上，上波蘭文課。然后打電話給阿爾巴尼亞大使館：“找到阿爾巴尼亞人，談話。”日記標明，很虛假。跑去英國大使館取信。在東德居住的幾名英國人都選擇如此做，因為這種方法似乎比較快、比較安全。讀了幾小時書。在申豪森大街內的施托金格餐廳用餐。與我共進晚餐的為烏蘇拉•馮•卡多夫。她是一名神采奕奕的柏林戰爭幸存者，當時正在為柏林寫一本新的旅游指南。將日記放在一邊，我從書架上取下卡多夫旅游指南，并翻開了施托金格餐廳的一頁，“標準東德風格的淳樸，口味不凡”。

當晚稍后，我跨過柏林墻，“越過查理(.檢查哨）”到巴黎酒吧，然后到名為英格麗•席克的女士家中，“在紅酒與大放厥詞間，從晚上10點，一直到凌晨5點15分”。從英格麗家我直接到了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咖啡廳“毛毛”吃早餐。再度跨過柏林墻，在7點以前回到家，正好“在樓梯前碰到一名邊境警衛，準備去上班”。小睡兩小時。在圖書館做了點工作。與丹普博士會晤，他是大學指定給我的“指導教授”。然后，我便與維爾納及約阿希姆去聽普魯士和普魯士帝國的演講。聽完后，我們又到施托金格吃晚餐。然后上床。

維爾納和我成為非常親近的朋友。很多年后我的長子出生時，維爾納成為我兒子的教父，而他搖身一變成為我們家的維爾納叔叔，圍墻后面的那個干爹。我們共同為這本書做了很多研究。在兩德統一以后，他曾經和國安部一名專門負責教堂的資深官員維甘德(Wiegand)上校晤面。維甘德上校一開口便告訴他，他們對維爾納在西柏林打給我的一通電話感興趣。當時我已經搬回牛津，而維爾納是在非常難得獲準進人西德時，在西柏林一名朋友家中借用他們的電話打給我的。維爾納假設從西方打電話應該是安全的，但顯然錯了。國安部能夠竊聽任何在西柏林的電話。他們竊聽西柏林和西德之間的電話，所使用的是布洛肯山上的竊聽站，一個狀似巫婆城堡但極為有效的接收站。布洛肯山竊聽站內有最先進的設備，可以用關鍵詞語自動錄下某特定主題或特定人物之間的對話。

到了1980年8月，我已經搜集到足夠的資料，可以開始寫作了。在與安德莉告別以后，我乘坐火車到意大利，與我的朋友格林夫婦同住，并開始在我的書上下工夫。我對當時西方媒體上有關東德的報道深感挫折。作者大都為六八世代人，明顯地在反抗他們眼中老一代的粗糙反共思想。我翻閱英國出版的一本有關東德一般狀況的書籍，已是當時最好的一本了，但是竟然在長達二十頁的索引中，找不到一條國安部或“國家安全部長”、“秘密警察”的說明。相反的，喬納森•斯蒂爾（JonathanSteele)的《德國面孔的社會主義：寒地來的國家》（Sociailsm with a German Face:The State that Came in from the Cold)—書中，結論是：東德的“總體社會與經濟體系已成為一個可行的模式，東歐的極權福利國家都正往這方向發展中”。可是，何謂可行？對誰可行？不，至少對我見過的大多數東德人是不可行的。我并沒有什么左右之見。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寫出他們是左派，而是要寫出他們是錯誤的：不正確、不公正、傲慢、偏袓，市井小民都可以隨口說出他們的錯誤，但是他們卻不愿意聆聽。我想要照事情的原樣將事實寫出來。

事實中必須包括國安部。“到處都疑神疑鬼，”我寫道，“它可能存在電話中，可能坐在酒吧里，可能與你一起乘火車旅行。只要有兩三個人在一起，就不能不生疑。”我引用了西方世界的估計，說東德國安部至少雇用了十萬名線民，替他們工作。特別讓我感興趣的是，在這方面，共產黨政權善用了德國人的古老傳統和他們服從的習慣。我剛開始寫作沒幾天，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全球新聞便開始報道，格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發生工人罷工事件的新聞。意大利的報紙刊登出一張顆粒粗糙的照片，并介紹照片中那個留著小胡子的人物為造船廠的工人瓦文薩（LechWa^sa)。我立刻感覺非去不可。縮短假期，我跳上火車，回到柏林。坐在慕尼黑火車站的餐廳中，我閱讀著《世界報》Monde)上的一篇報道，說抗議的工人拒絕當局以超市換取紀念碑的條件。工人提出要求為早先在波羅的海海邊城市的抗議活動中犧牲的先烈建立紀念碑。星期一的一大早，我到東柏林波蘭大使館取得了簽證，不久以后，就抵達了列寧造船廠。

我與那些胡須未刮、滿臉倦容的罷工者坐在一起，看著電視上播放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開會的情形。當黨領導人站起來唱《國際歌》時，我周圍的人也同時站了起來，唱起波蘭國歌：“起來，欲望的囚犯”。“波蘭還沒有吃敗仗，”罷工者怒吼道，“只要我們活著一天，就不會被擊敗！”他們高舉雙手，伸出兩指，展示出勝利的標記。我們所有人在心中，都認為蘇聯的坦克，就像十二年前碾碎了布拉格的春天一樣，隨時會轟隆隆地開進來。

# 第四章  IM“指導教授”?

國安部心目中，最寶貴的信息來源是“非正式合作者”，也就是線民——IM了。線民的數目大得驚人。根據東德內部統計，1988年，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后的一個“正常”年份，“非正式合作者”的人數達17萬，其中有萬定期提供情報，其他則提供“共謀”式服務，例如，將公寓讓出來給秘密集會使用，或僅僅被視為可靠聯絡人等等。國家安全部本身另有9萬名全職人員，其中只有不到5千名屬于HVA海外情報組織。如果將這些數字與東德全部的成人數目相較的話，就表示每50名東德的成年人中，就有一名直接與秘密警察相關。即便是每一名直接相關者只有一名眷屬的話，那么每25名東德人中便有一名是與秘密警察有關聯。

這種規模是納粹所不能及的。1941年，納粹秘密國家警察蓋世太保的全職員工，也不過只有1萬5千名，而它所涵蓋的地區包括兩德、奧地利，以及今天的捷克。就算將帝國秘密安全局和其他可\_能的相關單位人員都算進去，還是無法達到國安部在東德的比例。我們無法取得納粹時代正規的線民人數，但想要與東德政權比較，相差還很遠。第三帝國當政時間雖然很短，卻是在全民狂熱歡迎下建立，到最后經歷了五年半戰爭不支瓦解為止，一直非常仰賴民眾自愿性的相互譴責，以控制社會內部——這是我在塵封的舊人民法院檔案中發現的。然而，東德政權從一開始便不得民心，持續越久，就越需要這個龐大的線民網路的支撐。

我一個人顯然就獲得五名線民的注意力。文特少尉仔細評估了這五名線民所提供的證據和他們的操作潛力。在我研讀那些有關我的報告，并設法辨認、找到那些報告人，親自與他們談話的過程中，我不但被拉回到自己過去的生活，而且進入了那些生命曾與我短暫交錯的人的生活之中。

不像很多東德人被線民害得很慘，我并非這些線民手下的受害者。他們并沒有對我造成嚴重的損害。然而，在知道系統如何運作后，我可以大概猜到，同樣一批人很可能對其他人造成多大的傷害。雖然我知道夠多的個案，可以指認出其中一些共同特征，但是我仍無法確知盯我的線民是否便是典型的國安部工作人員。不過，正因為他們在偶然的機會中以我為監視對象，報告我的事跡，讓我有了一個機會，測試那些檔案的正確性一-并進人他們的經驗之中。他們為什么要那么做？做的時候有何滋味？現在回顧，感覺又如何？

我從“HVA-I部門的線民：G.(我的代號）在柏林洪堡大學的指導教授”著手。根據檔案開頭的行動計劃，他們準備將這名指導教授帶進“作戰方案”中。我對我的指導教授勞倫茨•丹普博士識之甚深。他是個高大開朗的柏林人，對柏林的歷史了如指掌，并且具有一種獨特的黑色幽默感。我至今仍保留著在離開柏林前他送我的海因里希•齊勒（Heinrich Zille)畫冊。他也是一名死硬派共產主義擁護者，至今仍對共產黨在魏瑪柏林的巷戰懷念不已。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丹普教授是少數幾名在東西德統一以后仍能保有原職的歷史學家。不但如此，在大學引進新的西方管理并對前教職員進行了大肅清之后，丹普教授不但沒有被迫離職，反而被升為洪堡大學歷史學院的正教授。在打電話給丹普以前，我與兩個人談過這件事。一個是洪堡大學歷史學院主任的海因里希•溫克勒，他是一名杰出的歷史學家；另外一個則為斯蒂芬•沃勒。生長于東德的沃勒拒絕以政治妥協換取在學術體系內的晉升，因此在東西德統一以后，仍必須從比較低微的職位開始向上爬。他們兩人都指出，大學在統一后曾展開過一次非常嚴密的消毒檢查，丹普是少數通過這項檢查的人。而消毒檢查中的一個關鍵步驟，便是比對高克機構內部資料。

不過，勞倫茨•丹普雖然曾做過馬可•沃爾夫的HVA海外情報組織的線民，卻被宣告“清白”，其中是有原因的。大部分的HVA資料已經被銷毀，有一部分——據說——被送至莫斯科。一名前HVA上校，紅光滿面的克勞斯•艾克納，曾告訴過我，在1989年深秋時，他們還如何忙碌地撕碎、焚毀大部分的敏感檔案，并將特工的卡片從辦公室的最機密檔案中取出。1990年1月中，國安部的總部被抗議者占領后，這項工作曾一度中斷，但是在統一后的圓桌會議，也就是討論如何將權力從共產黨手上和平轉移的共同協商會議上，大家做出一個特別決定，正式授權給海外情報組織，使之獨立于其他國安部單位之外，繼續“自我溶解”。因此，整個春天和初夏，他們都忙著銷毀所有能夠指認出個別特工和線民的檔案。“我用自己的雙手，將我這一輩子的工作成果毀了。”艾克納上校說。

雖然西德政府隨后收到了兩份備份的索引卡，而沃爾夫手下部分資深官員在統一后也曾對外發言，透露了HVA過去一些不為人知的活動，為幾次司法審判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但是，不論索引或是自身官員的證言，所牽扯到的主要都是在西柏林工作的特工，而沒有牽扯到線民。只有幾個線民，因跟其他部門的檔案交叉對照而曝光，但到底那只是少數，大部分，如丹普一般，仍然沒有被“高克”到。所謂被“高克”，就是那一陣子的俗話所稱的被查到與高克機構有關系。在那段時間，另外發展出來的一個流行語是“他過去和國安部有關”，意思就和得了艾滋病差不多。

“或許你想知道，”1970年代曾在洪堡大學讀過書的斯蒂芬•沃勒告訴我說，“以前是有人說丹普過去和國安部有關。”接下來，他又表示：“現在，嗯，如果你想要把他掛了……”他說話時，語氣略帶憂慮，我聽得出來他背后的意思是在說：“現在，嗯，如果你一定要把他抖出來……”而說這句話的人是斯蒂芬，那個自共產黨垮臺以后，一直熱衷地主張將過去所有與國安部合作過的人統統肅清的人。

“現在，嗯，如果，你想把他抖出來……”這是何等的責任！只為了檔案中短短的一句話：“HVA-I的IM——G.在柏林洪堡大學的指導教授”，如果我想要的話，便可以摧毀了一個人的生涯，甚至取下他的生命也不一定。IM就好像一記死亡之吻一樣。我有什么權力，扮演法官和劊子手的角色？而且，為了什么？報告一共只有兩頁，抬頭上的標題為“線民報告影本”，自1980年7月從II/9傳到HVA,內容毫無攻擊性。丹普博士在報告中寫下他對我的印象：我以布爾喬亞的自由思想和態度，勤懇而仔細地從事我的研究工作——雖然我完全缺乏對工人階級的責任感。在報告最后，他建議（是他一廂情愿的想法，雖然我或許在口頭中曾如此暗示過），他可以到牛津擔任我畢業論文的評審委員。報告本身顯然并沒有對我造成任何傷害。

唯一使事態變得嚴重的地方在于，因為那份報告，使我確定丹普為線民。如果這果真屬實，我應該考慮，是否為了忠于歷史判斷，至少將這事實報告給學校當局。很多其他人都曾因擔任線民而被“肅清”出學校。更明確地說，所謂肅清，并非完全失去工作，而僅為失去擔任大學教授這個敏感的職位，而且并非所有被認定為線民的都因此被開除。根據洪堡大學的第一任西德校長表示，該校每六名教授及每十名職員中便有一名，曾以某種形式與秘密警察合作過。當然，這其中有不少因東窗事發而自動離職，而大約有七十名被撤職。不過，大學的“榮譽委員會”也曾發現其中許多人的罪名并非嚴重到需要開除的地步。公平地看來，一個人不能夠因為一個歷史的意外，一些特定的檔案不見了，就免于接受那嚴苛的判斷。

在上述沉重的心思下，我于1995年6月打電話給丹普教授，約他見面。從1981年以來，我便沒有與他聯絡過。他顯然非常意外我會打電話給他，更意外我“想和他討論”一點事情，不過，他同意見我。我們約定到威廉街上的一家咖啡屋碰面。他最近才出版了一本有關威廉街的書，反響不錯。他因對柏林的地方歷史知識異常豐富而受邀參與了非常德高望重的街道改名委員會。馬克思恩格斯廣場成為宮殿廣場（Schlossplatz),卡爾一李卜克內西街(Karl-Liebknecht-Strasse)的一部分成為申克爾巷（Schinkelallee)，卡爾一馬克思大街成了黑格爾街等等，都是委員會之功。

11點整，他已經端坐在咖啡屋的戶外座位了。他個子高大，但是臉上松松垮垮，眼睛則濕黏黏的。他穿著一條灰色長褲、紅色上衣，衣服上還釘著肩章。初見面的寒暄有一點僵硬。招呼過茶水以后，我立刻進人重點。我閱讀了自己的國安部檔案，發現他們顯然把他列為HVA的線民。

“我的天啊！”丹普說。

我向他解釋了檔案的內容，并展示出相關的幾頁。他一面微微搖頭，一面接過文件，閱讀時，手稍微發抖。當他點燃香煙時，不慎將煙灰沾到他的毛衣上。“你看得出來，我有多么激動。”

但是，不，他說，他不是線民。他和國安部毫無關系。“我也感到奇怪，但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我。”不過，他的確記得曾經和大學的國際主任談過我的事情。“他叫什么來著？你記得，我們有一次在歌劇院咖啡廳吃過一次中飯的？”

當他一說到這里，我立刻就明白了。我原來便很奇怪，在那份海外情報服務組織的“線民報告影本”中，并沒有寫下線民的代號，而只是在報告內容中間將我的指導教授的全名寫出來：“勞倫茨（姓氏被涂黑）博士同志”。不過，我推論：如果國安部反情報部門的文特少尉閱讀這份檔案時，將丹普認定是海外情報服務組織的線民的話，那么我還懷疑什么？文特必定知道他在做什么。或許海外情報系統的工作方式和其他部門不一樣，規則也不同。

我現在知道，原來線民是大學國際部的那個主任——他居于那個職位，顯然會使沃爾夫的間諜對他有興趣。海外情報工作組織傳過去的是一份“他”寫的報告，因此才會把丹普的全名寫了出來。因此，真正在工作上不夠謹慎的是文特少尉，如此粗心大意，便出賣了線民，并將線民的消息來源透露了出來。

丹普小心地閱讀報告后指出，大部分的資料應該是從他那里取得的，但有一些事也非他所知：如我在英國大使館中與維爾德什(Wildash)先生的接觸。“你看這個句子。”我們兩人同時彎身以就文件。這正是兩名歷史學家討論該如何解釋一份主要的文件該有的樣子。

完全否定指控，有人告訴我，是最常見的線民第一反應。有時候，即使鐵證如山，擺在他們眼前，線民還是從犯罪學以及心理學的角度堅決否認。然而，勞倫茨•丹普的反應讓我覺得他是無辜的，他的解釋讓我立刻可以接受。在我回牛津的路上，我翻閱了1980年3月27日那天與他在歌劇院咖啡廳吃飯的日記。在日記中，我形容國際關系部主任為“滑頭亞歷克斯/俗氣哈利（SmartAlex/FlashHarry)。咖啡色夾克。大花領帶。桑丘•潘沙（SanchoPanza)式翹胡子”。我另外注意到旁邊有兩名小聽差一般的黨員，交談的時候用比較隨便的“你”（Du)相互應答，但是在對我說話的時候卻用比較正式的“您”（Sie)。俗氣哈利曾在萊比錫的大學研讀“科學共產主義”。“你知道我們這里流傳一個笑話，”他一面喝著一杯濃烈的飯后酒，一面故作神秘地告訴我，“我們常說：‘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到處都是，但是專政在那里呢？”等等，等等。現在我很高興聽到丹普說，這個令人惡心的家伙已經被踢出大學。不知道他現在做什么？

然而，丹普在當時又是怎么看我的？

他指著國安部的報告說：“大部分都寫在報告上了！指導一名英國學生是相當有意思的一件事，但是你也知道，指導學生，必須犧牲很多自己做研究的寶貴時間。”然后，他也問我，我當時是怎么看他的。

全然相信共產主義，仍心存浪漫幻想，將共產黨視為戰前的革命政黨一般。

是的，沒有錯，他回答道，雖然，我對他的印象仍屬片面，因為他有一些話是不會對外國人說的。根據1980年時我的筆記，他卻對我說過一些話，包括那天在午餐會上說的：“我們不期待你加人英國的共產黨……只希望你能很嚴肅地看我們，并告訴英國的人，我們是非常認真的。”可是，接下來，他又加上一個個人請托：“你能不能替我在丘吉爾墳墓上吐一口口水？”

或許就是因為這些小笑話，我對他感到索然無味，在我再度被允許進人東德以后，也沒有再去拜訪這名指導教授。不過，我對于他處理我給他的震驚方式，內心充滿無限同情——以及相當的敬意。

“當你打電話來時，我想到各種可能，”他說，“但就沒想到這個。”事實上，不久前，他才收到朋友寄給他的檔案，顯示他被線民懷疑有不忠的思想，因為他主持過一個私人的讀書討論會。談到我所說的浪漫，他不禁莞爾：“是的，不過浪漫主義也可以是非常危險的。”

他必須先走，因為他答應引導一個美國學生團參觀威廉街。“引導完了以后，”他說，“我可得去好好喝一大杯水果酒壓壓驚。”他顯然仍處于震驚狀態，就好像曾站在絞刑架下又走了出來的樣子。如果他是一名非常顯赫的公眾人物，而我又是一名粗心大意的記者，那么他可能就真的被抖出來，“掛”了。我幾乎可以看到《明鏡周刊》上出現一張他的黑白檔案照，旁邊故意鑲描上紅邊，下面寫道：“HVA-I的線民：洪堡大學G.的指導教授”。類似的報道，在近年來已不知出現了多少次。譴責，但錯誤的譴責。

就我個人而言，我感到非常、非常松了一口氣。我簡直迫不及待地回到旅館，打電話給沃勒和溫克勒，向他們解釋國安部的錯誤。

就在我要結束這本書前，斯蒂芬•沃勒用傳真送了一份剪報來給我。那是有關一個柏林一勃蘭登堡普魯士協會新成立的消息。報紙上唯一提到的創始會員，便為洪堡大學歷史學教授勞倫茨•丹普。

我按照剪報上的電話號碼打了過去，不久后便收到了一個資料袋。從資料中，我發現該協會的目的是要“培養普魯士的真正價值與美德”，并且“為復興祖國精神奠定基石”，因為德國已經快要淪落為一個“由毫無容忍力的個人集合而成的多文化混合體”。

在協會的規則中，特別提到了“腓特烈一世充滿哲理的作品”。而在成立大會的專題演講上，主講人特別提到腓特烈一世和他的士兵在1757年魯騰會戰時的精神。“真正的普魯士精神”，他說，與愛國、無私、容忍、謙遜、忠誠和責任感有關，但也應包括了“比較次要的守時、守秩序、愛整潔等第二層次美德”。

# 第五章 IMV“米夏拉”

最孜孜不倦、勤于觀察我的，是住在魏瑪的線民“米夏拉”女士。2月9日，艾福特辦公室再一次給反情報部門Ⅱ/13(記者）打報告，說我再度與IMV“米夏拉”聯絡。艾福特而且提供一個附件，是“米夏拉”和她丈夫的對話錄音與抄錄本。在抄錄本中，格奧爾格博士回憶了他從1943年開始在倫敦路透社工作的經驗。一開始，他擔任歐洲組的副主編，每每看到一些“蘇聯死敵”寫的稿子就非常痛苦。這些死敵包括現在為柏林自由大學教授的理查•勒溫塔爾(Richard Ltiwenthal)、阿爾弗雷德.蓋林格（Alfred Geiringer)和瑞士的洋•金契（Jon Kimsche),等等。

于是，國安部檔案再度像一個紙做的時間機器一樣，將我不僅帶回至十五年前，而且到了五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倫敦。格奧爾格博士在第一頁中便提到了三個名字，反映了當時從中歐到倫敦的許多流亡者，那些為了追求自由而從希特勒手掌中逃到孤立的英倫的男男女女，隨后對英國——以及歐洲——做出極大的貢獻。翻至另外一頁，我讀到更多的中歐流亡者的名字，包括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安德I®.多伊奇（Andre Deutsch)、賽巴斯蒂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喬治•麥克斯（George Mikes)。另外還有一名年輕的中歐流亡者，當時在英國國家廣播電臺的帝國及北美服務部門擔任新聞評論員，但是現在全世界都稱他為喬治，也就是切爾西郡的韋登菲爾德爵士（Lord Weidenfeld)。

身為共產黨員的格奧爾格博士，針對他自己的痛苦，曾經和他的同路人漢斯（姓氏被涂黑）同志討論過，漢斯在《時代》雜志的職位和他類似。他覺得要刪改“蘇聯死敵”的文章很困難，他很想要改寫那些反蘇聯的評論，將“最毒辣的部分刪除”，但是這個工作卻隨著戰爭即將結束而日益困難。因此，他決定與作戰部的一個相關部門接觸，以便到戰后的德國謀得一個適當的職位。進行到這一步時，他得到了“我們同志的同意”——他所謂的同志，就是他們在倫敦的一個小團體，當時的領導權正交到菲利克斯•阿爾賓（Feliks Albin),亦即庫爾特.哈格爾（Kurt Hager)的手中。庫爾特•哈格爾后來成為東德政治局內在位時間最長的政委，成為黨內最重要的理論家。作戰部接到他的申請后，便將“在漢堡建立（戰后西）德第一家新聞通訊社（DENA)”的工作，交到了這名德國共產黨員手上。英國作戰部的人不僅政治判斷不佳，連地理觀念也很差勁，格奧爾格博士很輕易地便說服上司，他必須從倫敦，經過柏林，前往漢堡。

于是，1946年3月13日，格奧爾格博士得到了一張官方發給他的通行證，準許他前往柏林。“我和倫敦的同志達成協議，我到了以后便向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簡稱CC)報到... ...當地的同志會決定我應該至漢堡接受工作還是留在柏林，”經過冗長的討論，他們決定他應該留在柏林，設立一個新的東德新聞通訊社，“但是最后，我竟然到了蘇聯設在白湖市（Weissensee)的新聞通訊社。”

他寫信給剛在漢堡成立的通訊社，說他不同意英國對德國的政策，基于政治理由他無法擔任新的職務。格奧爾格還幾乎帶著幾分愉悅回憶道，通訊社在幾乎有兩個半星期都沒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后，英國報紙還刊登了一則相關報道，并臆測他可能已被俄國人綁架。“自從我回到當時的蘇聯占領區后那份抄錄本最后的結論寫道，“便不再與任何在倫敦活動中認識的人有任何聯絡。”

在戰時的格奧爾格博士自畫像上，我必須加上兩筆。第一筆和當時的路透社老板克里斯托弗•錢瑟勒有關。我的檔案中只記錄道：格奧爾格博士聽說錢瑟勒對他決定離開路透社非常不以為然，認為那項決定“傲慢”。當我在寫這本書時，曾與錢瑟勒的兒子亞歷山大•錢瑟勒晤面。亞歷山大•錢瑟勒是我在《旁觀者》工作時的總編輯。我們在《泰晤士報》總編輯為《紐約客》總編輯所舉辦的一次歡迎派對上見面。在眾多總編輯的談話聲中，我問他曾否聽說過他父親提到這個“格奧爾格”（我用的是真名），并向他解釋了前因后果。剎那間，中歐痛苦的歷史進程侵人了夏夜北倫敦花園中的鬢香酒語。亞歷山大將“格奧爾格”的名字打進他的手提電腦，并說他會和他的長兄商量一下。兩個星期后，他再度與我晤面，并告訴了我結果。他的長兄并不知道那個名字，但是卻記得在那一段時間，他父親曾經非常擔憂、氣憤地回到家中，說在路透社發現了蘇聯間諜。

另外一筆則與格奧爾格博士當時的女友有關。他的女友為別號“麗絲”的愛麗絲•菲爾比。金姆•菲爾比于1936年與猶太共產黨員麗絲分手時，他表面上為法西斯同情者，在西班牙內戰時站在佛朗哥元帥的一邊，麗絲則住在巴黎。菲爾比似乎便是通過她與蘇聯情報組織取得聯絡。1939年，她遷居倫敦，并設法將父母從維也納及時營救出來。在倫敦，她與格奧爾格相遇。她如何終于與金姆•菲爾比離婚、離開英國，情況并不清楚，一般只知道在1947年時，她在東柏林與格奧爾格團聚，兩人結了婚，但她仍繼續使用原來娘家的姓。九年后，她再度與格奧爾格離婚。格奧爾格走進了另外一次婚姻，與“米夏拉”搬到魏瑪，并開始了共同的生活。麗絲則繼續留在柏林。

我剛到東柏林不久時，曾去訪問了麗絲，這位生命與20世紀歷史息息相關的女性。她有一間狹小的公寓，位于卡爾一馬克思大街。書架上仍擺著丁尼孫、濟慈、《牛津英語詩詞大典》以及伊尼阿齊奧•西洛內（Ignazio Silone)的《獨裁者學校》（The School for Dictators)等書。品嘗著美味的栗子蛋糕和紅茶，我們在她公寓談了一個下午。我的日記中記載，她是一位身材嬌小、迷人、精力充沛的女士，頭發卷曲，說話帶有維也納腔，“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當時她已經七十歲了。我另外記下了一件比較突出的觀察：她對于錯誤抱著追根究底的態度。“如此小心翼翼，是受蘇聯訓練之故嗎？”我自問，“還是因為曾在海外擔任……時，有過不好的經驗？另外一個我比較希望成真的假設：是否可能是她那維也納資產階級出身的習慣使然？”或許三者兼而有之。在經歷過一個多彩多姿的青年時代后，她在退休前的二十年，主要的工作轉向替國營電影經銷商做外國電影的配音。當我遇見她時，她正在“反法西斯主義斗士”之名下享受極高的退休待遇。

談到金姆時，她仍語中多帶親昵與景仰。“他非常聰明。”她說——最后兩個字是用英語說的。麗絲很有語言天才。然而，她加上一句，他個性有點保守。她非常確定1934年維也納工人的罷工以及隨后的殘忍鎮壓事件，對金姆往共產黨方向發展有極大的影響，使他從一名同情者變成了毫無保留的共產主義信徒。事實上，她認為自己在這方面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通過她，這名來自英國寒地的年輕金姆，落入了嶄新而熱絡的政治氣氛、快速而溫暖的友誼、表面上毫無困難的團結以及或許是相當程度的性解放之中。同時，通過了她，金姆•菲爾比認識了許多人，包括蘇聯情報人員。

我覺得我幾乎無法開口問她有關兩人間性愛的事情。因此，我繞個彎子問她，如果當時知道1930年代蘇聯內部真相的話，她和菲爾比還會選擇同樣的路嗎？思考了許久以后，麗絲非常嚴肅地說：“我實在無法回答。你一定覺得不可思議，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她對現在的東德感想如何？

“嗯，這么說吧，并不是我們希望的或我們相信的。”

她批評了社會一般的不信任感、恐懼感、領導的懦弱膽怯、缺乏言論及行動自由，以及——包括她自己在內的——特權。不過，她仍然相信有一個叫做社會主義的東西。“有其他選擇嗎？我看沒有。”

回到檔案。“米夏拉”報告1980年1月5日，她接到一份別人寄來的展覽畫冊，題目為《反抗與順從之間：1933年至1945年的德國藝術》。她確定在內夾卡片上的字跡與上一次我拜訪她家、留下名字時的字跡一樣。“為了進一步工作，加強接觸，并為維持他繼續在視線范圍內，本人將寫一張卡片，寄到下列地址：

蒂姆•加多艾什（Tim Gartow Ash)

孔斯特畫廊（Kunstgalerie)

西柏林”

下面，則以打字簽上了“米夏拉”。報告不是親手簽名，但是最后面，似乎有一個IM檔案的標記。

五個月后，根據“IMV‘米夏拉’的口頭敘述”，檔案又有一份簡短的記錄，“米夏拉”丈夫告訴她，在4月26日至27日的周末中，我曾嘗試再度拜訪他們。格奧爾格博士表示不想見我，自稱病得太嚴重。不過，他從當時照顧他的醫生口中得知我去魏瑪的一些細節。醫生的丈夫艾伯哈德•豪夫是“德國文學學者，沒有特定雇主”（檔案如此記錄他的身份)。我在魏瑪時便住在他們家。

我還記得那個周末，許多在魏瑪的“莎士比亞日”中的一個。當天的主要活動是喬治•斯坦納的演講。斯坦納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他的演講向來內容豐富，極吸引人，從《李爾王》到《第十二夜》，中間順便會提到俄狄浦斯和《唐璜》。在演講后，我與他共進晚餐。我覺得人在魏瑪，同時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和歌德橡樹的陰影下，一個斯坦納以優雅的文字道出高度文明與野蠻現象并存的不安的地方，與斯坦納談話應該特別有意義。但是我的日記中記錄下的相關題材非常少：“不，他只想閑聊——我們盡量、不停、傾盡所能地，在大象（旅館）的餐廳內談了一個多小時。‘你最近聽到雷吉烏斯教授的事情嗎？’等等。‘噢，你一定很想念這些啰！’”我在日記中寫下我的失望。今天回顧，我覺得自己不很公平，因為畢竟，超凡的斯坦納教授已經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在談攸關人類文明的大事了。

無論如何，那個周末中真正值得紀念的，并非莎士比亞及喬治•斯坦納，而是歌德和艾伯哈德•豪夫。

Wer den Dichter Will vestechen

Muss in Dichters Lande gehen.

歌德曾寫過，要理解他的詩句，必須先拜訪他的家鄉。而且，歐洲沒有一個地方，比魏瑪更能培養出如歌德一般優雅的作家了。首先是歌德的房屋，房屋內仍完整保存著他的書房和站桌。黑貝爾稱那張歌德站立著寫東西的書桌，是德國唯一值得驕傲的戰場。然后是施洛斯•科堡（SchlossKochberg),在那里，歌德暗戀著夏洛特•馮•施泰因，卻與比較令他自在的克麗斯丁睡覺。然后是席勒的房子，旁邊有兩位詩圣的美麗墓園，一座在伊姆（TheIlm)和提福（Tiefurt)之間，一座在施洛斯大道上。席勒的房子，在兩百年前的安娜一阿瑪莉亞（Arma-Amalia)女公爵使用之后，成了線民IM“米夏拉”的居所。

魏瑪不僅文風鼎盛令我感動，而且能與艾伯哈德•豪夫一家人共度周末，也令我印象深刻。我的日記中留下了在公園中散步和參觀施洛斯•科堡的記錄。艾伯哈德•豪夫矮小而瘦弱，用字遣詞精確而略微老派。1950年代末，因為政治原因被萊比錫大學驅逐出校園以后，他便以文字編輯與撰寫評論為生，尤其傾注大量時間編輯德國古典文學。他特別熱愛東歐詩人約翰內斯•波勃羅夫斯基(Johannes Bobrowski).

我們一面散步，一面針對書籍、思想、政治進行深度對話。我在歐洲鐵幕后經常與知識分子及教會人士進行這樣的對話，然而，在西方卻鮮少有機會如此。而那一天，除了對話以外，我還可以享受到在魏瑪與一名德國古典文學者談話的特殊魅力。當我們走過提福公園時，我感覺到在我旁邊的，不僅是一位對古典魏瑪有精湛研究的專家，而且他本身便代表了古典魏瑪的一部分。他是古典魏瑪的延續，而我們的談話似乎伸展回到二百年前。我們當時的談話主題，從赫爾德到托馬斯•曼，一直盤踞于德國作家、思想家的腦中，成為他們重要但模糊的中心概念：Humanitat(可直譯為“人性”，但是指饒富德國特色的人性）。

盡管各種介紹東德一般狀況的書，對魏瑪都贊美有加，但是豪夫博士可不心存幻想，他不認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有任何的一絲“人性”——雖然它將歌德的畫像放在二十馬克的紙鈔上。在豪夫博士眼中，這個政權代表的是一切“人性”的反面。他告訴我國安部拆開他的信件，竊聽他的電話，而他則如何抗爭那些檢查。有一次連他所編輯的一本書《意大利來的日耳曼信件》（German Letters from Italy），都被查禁。東德政府正在努力實踐庫爾特•哈格爾的思想。庫爾特•哈格爾主張已經沒有所謂的“日耳曼民族”，而只有兩個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他們努力地將文字中所有“日耳曼”、“德意志”之類的形容詞都消除掉。甚至連豪夫博士毫不相干的書名也無法寬容。

在離開前，豪夫博士送了我一小冊他所編輯的書，現在，在我寫作時，就放在我面前。《不合時宜的事實》（The Untimely Truth）是一本集結了格言、散文和題目為“有關宣傳”的作品集。作者為一位幾乎被人遺忘的19世紀初期德國作家，卡爾•古斯塔夫•約赫曼（Carl Gustav Jochmann)。生于理加的約赫曼，曾于1812年至1814年住在倫敦，受到當時自由思潮的啟發，成為一名主張政治言論自由的積極分子。1975年，豪夫博士在為這本書寫跋時，為了規避東德的檢查尺度，他以一種雙刃的筆法評論著這種顛覆性思想：“只因為（約赫曼）在寫這些文章時，處于一個黑暗、原始、受壓迫的資產階級社會，他仍能保存著他的學術自尊，并從知識分子的渴望中發出純真的聲音。當時，還沒有人發現輿論純粹為資產階級利益所掩護的‘虛假意識’。這一點，一直到一二十年后，才被年輕的馬克思看破。”豪夫博士的讀者，早已知道如何在字里行間尋找文字的真意，并可立刻得到他想傳播的信息，這使得該書第一版在出版后不久便全部售罄。

在我的這一本《不合時宜的事實》的蝴蝶頁上，有一行手寫的小字：“真理必須以戰斗得致，以行動贏取，C.G.約赫曼。相信這句話，以及類似這句話的所有真理。此致蒂莫西•加頓艾什，艾伯哈德•豪夫贈。魏瑪，1980年4月27日。”

對我而言，那是一次令我非常感動而歡喜的旅行。但是，通過'“米夏拉”的報告，國安部看到的則全不是那回事了。在報告中，我成為一名粗魯、不受歡迎的客人。“晚上，G.故意忽視H.家人表示談話到此為止的禮貌暗示，利用該家庭對他的善意，讓他們同意收容他留下一晚上。”接下來，報告評估了豪夫夫婦：“兩人都明顯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根據我的判斷，兩人是那種會從西德的大眾媒體中搜集資料的人。”不過，她強調，夫婦倆對“我們社會主義”并無仇視之意。最后，米夏拉強調要保護信息來源（也就是說，她自己）的重要性，因為“只有我們兩家人知道此英國人的來訪”。在寄出一份報告影本至柏林的同時，艾福特辦公室的反情報組主任馬雷施中校，加上一筆，說豪夫博士早已在該單位偵察的名單上。

一個月之后，“米夏拉”再度報告我去拜訪他們，而我顯然沒有認出格奧爾格博士第一次婚姻時所生的女兒。其實，我在拜訪他的前妻，也就是前菲爾比太太時，曾見過她。“米夏拉”說我發現錯誤后，感覺非常尷尬，而且說不出來我到底是對猶太人反抗納粹主義感興趣，還是對金姆•菲爾比感興趣（答案為兩者皆是）。她還聽豪夫太太說，我又去拜訪他們夫婦倆一次，而且與他們的兒子，在耶拿讀書的克里斯托弗，一起到歌德墓園去散了一次步。在頁尾，馬雷施中校指示繼續采取行動：“米夏拉”應該與我建立起聯絡管道，并繼續偵察在耶拿讀書的克里斯托弗。對中校而言，一個已在監視名單下的家庭中的學生分子，很可能為系統帶來嚴重的后果。在東德系統中，只要國安部在學生的記錄上蓋上幾個污點，學生就可能遭到退學處分。在這里，“米夏拉”一個無傷大雅的報告，很可能會斷送了一名年輕人的前途。因為他們和我不一樣，無處可去。然而，那危險，最終是來自我。

又經過了一個月的時間，“米夏拉”報告了我寫給她的明信片內容，并將我在東西柏林的電話都列在上面。在報告后面的官方行動指示包括：要求柏林的總部查核電話號碼。隨后，Ⅱ/9部門回答，IM抄錄的號碼必定有錯誤。艾福特辦公室送回來一份明信片的原件影印本，并令人毛骨悚然地觀察道：“確認IM所給的信息無誤。”簽名者為“pp.馬雷施中校”。荒唐的查核程序，前后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從6月到8月，而在這一段時間中，我搜集寫書資料的工作幾乎已全部完成了，而且已出發至意大利，準備著手寫作了。

十五年以后，我將一些相關文件寄給了豪夫一家人，向他們解釋有關檔案的事，并要求至魏瑪拜訪他們，并詢問“米夏拉”——如果她還在的話一-為什么她當時要如此做，現在有什么可以辯解的話。我能夠理解他們會對于我所從事的計劃不以為然，而且我在看了豪夫博士為我在《不合時宜的事實》前面所題的約赫曼金句后，相信我在1980年訪問他們時，并不如國安部檔案中所描述的那么不受歡迎。

當過了一陣子，我從萊茵河畔柯尼希斯溫特（Kdnigswinter)打電話給豪夫一家，豪夫博士表示他們很愿意見我。我立刻驅車來到魏瑪。豪夫一家人就像十五年前一樣，熱情款待我，向我保證他們從來沒有不歡迎過我。“我們一直在回想，”精力充沛的豪夫太太說,“你來的那天，25日，那正好是克里斯托弗的生日。我們特別裝飾了餐桌，放上蠟燭。然后，你出現在門口，我們邀請你進來。我記得,我把你安排在餐桌那個位置上，然后為你端了一盤菜出來。”又是普魯斯特效應。“你表現得有點生疏，絕非‘她’形容的那么積極主動。”

我們針對檔案本身和共產黨神話之類的事情，談了一會兒。從談話中，我想起國家安全部在當地的總部，其實和他們家就在同一條街的兩頭而已。魏瑪再度成為兩個極端的象征：同一條克拉納赫街上，離開歌德和席勒的公墓不遠一端，為豪夫博士的家；另外一端則為國安部。國安部的辦公室坐落于一棟由亨利•凡•德•費爾德所設計的現代別墅中，與附近尼采圖書館造型很相像。豪夫的檔案，1989年12月5日，當地人在激情中沖到國安部辦公室之前便被摧毀了。豪夫一家也在沖鋒的人潮之中。不過，高克辦公室仍然保留了一份檔案，解釋豪夫為什么在1957至1958學年中被萊比錫大學開除，導致他的學術生涯驟然結束。

在檔案中，他被許多人譴責，其中之一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講座的講師瓦姆比爾博士。豪夫博士從萊比錫的電話簿中，查詢到瓦姆比爾博士——電話簿中同姓者并不多，并將檔案中相關的幾頁寄了給他。瓦姆比爾博士來信道歉，但抽印了他的檔案中的幾頁，回寄給豪夫博士，顯示他也因為態度越來越批判，不但于1974年被逐出學校，而且因為傳播反國家的煽動言論被判了兩年徒刑。寫信時,瓦姆比爾正在申請平反，豪夫博士說：“這種案子很難判，還好我不是法官。”

然而，“米夏拉”又如何？根據豪夫太太說，他們和她不很親近，反而和格奧爾格一直維持著親密的友誼。有一天，格奧爾格帶著他的女兒來到他們家，說：“有人推薦你[豪夫太太]是一名很好的小兒科醫生。”回想起來，豪夫太太覺得推薦者可能是國安部。但是，她記得格奧爾格是一個詼諧、聰明、有趣的人。他們最后一次看見他是1981年，他前來給豪夫博士五十歲生日道賀。當時肉品相當稀少，而格奧爾格設法從一家肉店買到了一些火腿、肉卷之類的東西，分了一點給他們。

相較于格奧爾格，“米夏拉”粗俗、自私，而且，豪夫太太說，在辛勤、純樸的圖林根生活中，“她竟然有膽說我們過著‘資產階級生活’！我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先要將公寓整理清潔，然后才去上班，而她呢，每天高來高去，搬弄是非不說，還雇用著一名清潔女工，在當時是非常少見的。她竟然說我們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

身為資深國家公務員，“米夏拉”非和國家合作不可。但是那并不表示她非做線民不可。為什么她要那么做？可能是為她個人的職業前途著想。即使在丈夫去世以后，“米夏拉”仍然繼續在柏林的國家藝術經紀單位工作，而那個單位在惡名昭彰的國安部官員，亞歷山大.舍克一戈洛考斯基上校羽翼下，在經費拮據的共產黨政府中總是能搞到大筆現金。豪夫夫婦從那以后沒有再與她有任何聯絡，不過他們建議，或許可以從柏林的電話號碼簿中查得到她……

我一如過去，疾駛在前往柏林的高速公路上，汽車滑過千瘡百孔道路的同時，腦中盤旋著一如往常同樣的問題：區區一個檔案，將如何開啟過去的大門，讓相關人士再度落人那如迷官般錯綜復雜的關系中？而被開啟的過去，又將如何改變那原本已經掩埋的事實，就像考古學家將塵封的埃及古墓打開后，并不知道新鮮空氣進去以后對古物會產生什么影響。

因為，我發現，經過檔案開啟的過去并非原樣重現的過去。就算沒有經過檔案的開啟，沒有新的文件或另外一個人的記憶幫助回想，每個人的回憶都隨著時光的流轉以及環境的變化，有的變得模糊，有的反更清晰，有的逐漸圓潤，有的則越發尖銳。因此，豪夫太太對米夏拉的記憶，在1985年夏日東德政府仍然存在之時，與十年后我正準備去訪問她時不同，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在我展示新文件給她看以后，等于為她開啟了一扇新的記憶之窗，但也因此關上了其他的窗門。她再也無法回到過去對米夏拉或兩人之間發生的事件的回憶中了。這就好像一個人在經過多年以后，對自己所鐘愛的人做不忠的表白，或一對夫妻經過一件丑惡的離婚官司，會將過去兩人之間所有共享過的歡樂時光完整、全部、永遠、慘痛地摧毀一樣。只不過，連這一份痛苦的回憶也會隨著時間的流轉而有所改變。

因此，我們所擁有的是對某一個人、某一件事、某一個時點的無限回憶：不但隨著每一秒時間的流動而逐漸改變，而且偶然會因為某一個戲劇化的沖擊、一項出其不意的表態等而有扭轉的回憶。就好像電腦上的數碼影像，每一個顏色、線條、細節都可以在電腦屏幕上任意改變一樣，在人腦中的回憶也經常在變換中。不過，和數碼影像唯一不同之處在于，我們無法控制自己的記憶，也無法任意倒帶，讓自己回到最原始的記憶中。有人說“過去就好像陌生的外國一樣”，事實上，過去是另外一個宇宙。

那么，托馬斯•霍布斯所寫并由詹姆斯•芬頓引用于他的《安魂曲》中，有一句話：“想象與記憶不過是一件事。”這句話有可能是終極的事實嗎？有位波蘭裔美國猶太作家耶爾塞•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將他的可身世公之于世，說他和他的小說《彩鳥》（The Paimed Bird)里的小男孩很相似，作為一個猶太裔少年，自小被迫與家人分開，棄養于一個農村，以躲避納粹勢力。而且，他小時候很可能遭到暴力侵犯，在九歲時便被打得腦部受傷。科辛斯基的小說出版后，立刻被標榜為“大屠殺”活生生的證言，受到各方贊揚，成為暢銷書籍。但是當研究者抵達科辛斯基所描述的農村后，卻發現當地農民的記憶與科辛斯基的非常不同，他們稱小科辛斯基不但從來沒有被棄養、虐待，而且一直和他的家人一起躲藏在農村中。如果不是農民的記憶有誤，便是科辛斯基將記憶與想象混為一談，使他相信小說中的事情真的發生在他身上。另外一個可能性便是他故意扭曲自己的記憶。他的朋友大力為他辯護。例如，愛麗卡•楊便說：“[這些事]他親身經歷與否，有什么關系？”

然而，不論如何加料，記憶畢竟應該是曾經真正發生過的事，是史實，與未曾發生過的想象之間應該有一條明顯的界線才對。小科辛斯基要不就是曾被虐待，要不然就沒有，這中間不應該有灰色地帶。就如同米夏拉要不就是一名宣誓的秘密線民，要不然就不是一樣。

歷史，就好像一件用許多不同質材拼貼而成的美術作品一般，這里一塊硬邦邦的金屬片，那里一張舊報紙，又覆加上一塊布料。報告、調查者、歷史學家從同一個盒子中撿出許多不同的質材，拼湊出來的是一張張與他們原始想象中的油畫或水彩畫感覺完全不同的拼貼。但是，每張歷史的拼圖不似詩或小說，必須要經得起歷史對事實的測試。我所寫的每一句話都必須要經得起這個測試。這使得我的工作非常困難。

在柜臺完成登記后，我進入了旅館房間，找到電話號碼簿。的確有一個號碼，登記在“米夏拉”的真名之下。我考慮是否應該學狗仔隊的記者那樣，就這么出現在她家門口，還是像紳士一般先打個電話給她。顯然，后者的失敗風險比較大。然而，我拿起電話筒，撥了號碼。“啊，‘阿許’先生，你在魏瑪時曾經來訪問過我們，對不對。我后來讀過你的大作……”我向她解釋我這次來柏林時間不長，不過有一件特別的事，想要見見她。我們約定了下午一個時間，由我去拜訪她。“你一定有很多問題，”她說，“而我正非常期待你的問題。”

一棟高挑、灰色、典型社會主義現代式設計，而且以東德標準而言，非常瀟灑、引人注目的建筑，坐落在一個絕佳的地點，顯然屬于特權階級。一名身材高大、聲調開朗的女人走出來迎接我：“哈羅，你好？”高鼻大嘴，鮮紅的口紅，金屬眼鏡背后是一雙灰色的大眼睛，配上長褲與高跟鞋，令人聯想到瑪琳•黛德麗（Marlene Detrich)。很有品味的室內布置，新彼德麥式家具。

“好吧，”她布置好了咖啡、蛋糕等以后，興致盎然地對我說,“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OO[真名]太太，”我說：“你是否有任何直覺，知道我今天要來和你談的主題？”

遲疑片刻，或許比片刻還稍微長了一點。“沒有，真的沒有。”那句“真的”讓我有畫蛇添足的感覺。

于是，我告訴了她。

“是的，”她聽完立刻說，“像在我這種立場上，有義務如此做。”每個月，他們都會來看她，她的秘書會說：“老板，你又有客人了。”他們自我介紹時，總是說自己是地方議會的人，但只說名而不透露姓，如“迪特爾”、“海因茨”等。談話時，她公事公辦，僅交代公事。難道我的事有任何公事成分在內嗎？是的，因為格奧爾格和麗絲完全相信我在替英國情報單位工作，因此我的到訪被劃分為至少屬于“半公事”。她總算是抓住了“公事”的一個邊兒。

她以非常實事求是、至少在外表上看來非常自信的態度談整個事件。但是，當說完以后，她非常緊張地問：“他們報告了什么？”我注意到她用的是“他們”，而非“我”。

我將報告的影印本給她，她開始閱讀。她顯然對她丈夫的細節描述感到相當震撼。

我問她平時他們是如何與她進行訪談的。“迪特爾”或“海因茨”手上有筆記本嗎？是的，是的，他們都有一本打開著的筆記本，而且他們會非常小心地將每件事都寫下來。一般人會合作。有義務這么做。盡量說出最多無害的事給對方聽。這樣，或許會對自己的工作有幫助。有的時候，的確會有幫助，例如在設法取得計劃許可而遭到困難時，國安部會跳進來干涉，把事情擺平。而且曾有一次，發生過一件案子，是有關魏瑪的搜集品中，兩幅丟勒（Diker)的畫被美國大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偷到美國，為此而打起官司。當時她想，如果我們贏了官司，我一定會被派去美國，將兩幅畫收回來！結果他們的確贏了，但是文化部卻派了別人去取畫。她向國安部抱怨了一通。

無論如何，格奧爾格博士在他與麗絲•菲爾比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兒移民出國以后，死于1984年。在臨死前，他仍表示相信社會主義。麗絲隨后也移民維也納，以便接近他們的女兒，“米夏拉”的繼女。是的，麗絲曾為KGB(克格勃）做過事，但是到最后，她對一切均感到失望，并變得非常反政治。不久以后，她和格奧爾格博士所生的女兒也移民他國。她搬回柏林，提早退休，并以“反法西斯戰亡遺孀”的身份，獲取了極好的退休金。1987年，她還脫離了黨。在一位朋友的檔案中，居然還提到了與“猶太裔[格奧爾格博士真名]”的接觸，非常令人震驚，雖然大家都知道潛在的反猶太意識仍然存在。“但是我并沒行申請去閱讀自己的檔案，我不想這么做。”她似乎半信半疑地認定自己是國安部監視的對象，幾乎是一名異議分子。

說著，她繼續閱讀我的檔案，讀那些她所提供有關我、有關豪夫一家“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有關尚未成年的克里斯托弗•豪夫等等，各種庸俗而怪誕的細節。金策爾少尉在下面批的行動指示是：調查學生克里斯托弗和他的一家，并指揮IM進一步接觸。突然間，她將檔案放下，說：“我讀不下去了。我不舒服，想要嘔吐。”轉過身，她走到門口。當她再回來時，滿臉是淚。她以嗚咽的聲音說：“那是無可原諒的行為。”即使如此，她仍嘗試解釋。

她的祖父是一名普魯士軍官，但是她的祖母是猶太人，因此，按照納粹在紐倫堡法中的分類，她的父親屬于所謂的混血。不過，由于他是一名杰出的婦產科醫生，SS(黨衛軍）依然不顧身份，在他們自己于圖林根開設的一家醫院錄用了他。戰后，他父親回到勃蘭登堡做資深醫生，先成為社會民主黨員，在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強迫合并、成立了社會統一黨以后又成為當然的黨員。當時，1945年，她還只有十五歲，感到萬分興奮，相信一切都將有一個新而美好的開始。她有信心他們將建立起一個更好的德國。當然，她說，以她的身份背景來看，新政權俗氣得很，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意識。但是，一開始時她的確是信心滿滿的。逐漸、逐漸地，失望一點點出現，在內心擴大。蘇聯摧毀布拉格之春，的確為她帶來了極大的失望。但是一直到1970年代，她仍相信社會主義是比較優異的制度。無論如何，社會主義一直存在著，而且是她成人生活中唯一知道的制度。

1975年，她在魏瑪得到了畫廊的好工作。隨工作而來的，便是“迪特爾”、“海因茨”的攪擾。在激動、斷續的言詞中，她非常生動地描繪出了她與政權當局合作的矛盾動機。在她心底，仍然殘留著對社會主義體制的信仰。她感到那是一個正式的責任，她說：“在像我這種立場上，我有義務這么做。”此外，她還希望利用國安部，讓她能在這官僚主義游戲中取得優勢：透過丟勒，到美國轉一趟！另外，格奧爾格和麗絲真心認為我是間諜。說起來，東西之間，的確有一場戰爭在進行，不是嗎？一場她的體制與我的體制之間的冷戰。

她感到恐懼嗎？

“是的，當然，在內心每個人都嚇得半死。”因此，大家都會想要設法解除體制對自己的懷疑，表現出合作的態度，喋喋不休，將所有無害的信息細節都說了出來。“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當她眼光轉至IM“米夏拉”報告影本時，她幾乎再度無法自已地要哭了出來。我可以看到她金屬眼鏡框背后的雙眼盈滿了淚水。

“是的，該寫封信給豪夫一家人。”她外表掙扎著回到原來的表情，內心則與過去的行為掙扎。

“但是，那與你被禁止人境無關，對不對？”

對，那是在我的書在西德出版以后。

啊，這就是他們的作風，總是只在意“西方”的意見。“那件事以后，我真應該多為自己著想一點的。”“現在你想寫一點東西，想要看我的反應，對不對？好了，我有了這些反應，你高興了吧？”她苦澀地笑了起來。接下來，她又問：“你會把名字都寫出來嗎？”我向她解釋說，我不想要傷害任何人，也不會用到她的真名。不過，因為魏瑪和菲爾比的關系，她的身份很難不被辨認出來。至少家人和朋友會認出她來。

她被淹沒在相互沖突的思考和情緒之中。經過一會兒，她開口道：“你能給我看這個檔案，真的很好。”接著，她又說：“嗯，或許我可以告你，贏一大筆錢……不，不，對不起，剛才只是個笑話……不過，或許應該有什么保護……”

“我們壓抑得那么慘……為什么我不去申請我的檔案？因為我不想知道里面有什么……有關我丈夫……天知道還會有什么在里面……我想那是我唯一大量報告我私人生活的時候了。我以為那是公事，但是……好吧，我希望你寫的時候，把主觀、客觀的情形都交代清楚。當時的情況是怎么樣的。不過，或許那是不可能的。連我現在都不怎么記得了……”

我們兩人的談話在夕陽中結束。分手前，我能說什么？“真榮幸能夠再見到你？”很不合宜。“我很抱歉加之這些事于你身上？”大概也不行。結果我說的是：“這些影印本就給你了。如果你想要加上些什么的話，請寫信給我。這是我的地址。”

她回答道：“啊，牛津！”她最近還去牛津，度過了美好的一天，拜訪朋友。麗絲童年時期的玩伴。“你寫下你的電話號碼了嗎？或許下次我可以打電話給你！”

當我們在門口握手道別時，她并沒有說“抱歉”。她只問：“你是怎么來的？坐車？”

不，坐地鐵來的。

“非常方便，對不對？”顯然她掙扎著想要表現出自尊和正常的態度，好像任何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的確沒有。

當我回到旅館房間坐下，經過半小時，終于提起筆時，發現自己的手仍在發抖。

你一定以為這類的對話，每天晚上都會在德國各個地方的廚房、客廳中一再重演：痛苦的交手、真實的告白、友情的毀滅、生命的懸疑。日復一日，當強大的知識力量逐漸M•國安部轉移至高克機構的職員手上、再從高克機構的職員手上轉移至像我這般的普通人時，想必同時會發生成千上萬的交手、沖突。

讓那些人自行發揮想象力，在記憶與遺忘之間，在自我欺騙之上，建立起自尊，難道不是比較聰明的做法？難道與他們交手、正面對質，會是比較好的做法？不但對自己好，因為自己會想要知道真相，而且會對他們也好？即使在她第一次的混亂反應中，“米夏拉”也說出了“你能給我看這個檔案，真的很好”的話。

當我們談話時，她強烈否認知道國安部將她列為線民。一開始時，我傾向于相信她的說法，但是專家與朋友都告訴我不要太天真：“他們都是這么說的。”舒爾茨女士退休以后，接替她工作的鄧克爾女士對我提到，檔案室可能會主動追蹤“米夏拉”的檔案。作為一般讀者，只能拿到線民報告中直接與你有關的影印檔案。如果你能夠從檔案中清楚、明白地建立起那名線民的身份的話，也可以通過正式的書面申請函，要求證實那些線民是否曾經打過你的報告。不過，作為一名研究者，我獲得特別允許得以閱覽線民的實際檔案。

一名普通線民的檔案分為三部分，每部分的內容登記有嚴格的規定。第一部分是線民本身的相關資料，從國安部如何說服他們與國安部合作，到做線民的書面承諾，以及他自己所選擇的代號、他們隨后所發的報告、私人信件的影印本、其他線民所提供他們的資料、國安部針對他們的可靠性的任何疑慮等等。第二部分與線民的i作有關，包括他們在國安部的個案主管在每次會見（經常是秘密接頭）中與他們晤談的筆記，他們自己的書面報告，有關他們工作的年度考評，進一步行動計劃等等。第三部分則是所有花費和付給他們的各種“禮品”賬單收據。

不幸的是，我在檔案室中只找到了“米夏拉”檔案的第二部分，而且還只有部分，而非全部。不過，對我而言已經足夠了。將近六百頁的檔案，涵蓋了1976年至1984年，也就是魏瑪年代的工作。一開始時，檔案中記載著金策爾少尉對“米夏拉”的保證，用他的術語來說，“我們的組織”不會讓她發生任何不幸的后果，雖然她在一次赴匈牙利的正式訪問中非法攜帶現金出國。“米夏拉”得到這消息以后，大大地放心。她原本擔心這事件會影響到她以后到外國出公差的可能。幾星期以后，他再度拜訪她，并記錄下她已做好準備為“組織”——在專業領域內——工作的意愿。她覺得自己并不適合這份工作。她丈夫對她說過一點替“組織”工作的滋味。她丈夫對金姆•菲爾比認識甚深，并且“在他放逐到英國時，曾替一些朋友工作過”（“朋友”是東德人經常使用的一個字眼，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指的是俄國人）。“她本人覺得自己并不適合這種工作。”

兩個月以后，她已能夠報告自己成功訪問了瑞士。瑞士對大部分東德人而言，是個只能在夢中成行的地點。金策爾少尉則對她證實他的掩護身份，說他來自地方議會。而在這時，我發現，“米夏拉”已呈交了第一份手寫報告，最后署名為“米夏拉”。

不過，閱讀檔案時，必須要小心謹慎。稍后，在同一份檔案中，出現了其他的手寫報告，署名也是“米夏拉”，但是字跡卻屬于另外一個線民，他接替了金策爾少尉，專門周旋在各個線民之間（然而，這家伙——也不知道是“迪特爾”，還是“海因茨”——竟連正式官員也不是，只是一名專門管理其他線民的線民）。比較之下，早期的報告中的大型女性字體，可能真是“米夏拉”自己的。事實上，檔案中還保留了幾封給駐東德幾個大使館文化參事的手寫信件草稿，下面的署名還是“米夏拉”的真名，不過被劃掉，改寫為“米夏拉”。

她的第二份報告是一件攸關國家安全的重大事情。在整整三頁報告中，“米夏拉”抱怨大象旅館內餐廳的服務不佳。領班格貝爾先生在許多英國客人面前對她極度無禮，還有英國人在事后一直拿這個來開玩笑。“更重要的是她寫道，“格貝爾先生的獨裁口氣，很不適合國際旅館。這種服務顧客的態度，我認為，無法加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國際上的聲譽。”

1976年9月15日，金策爾少尉特別提到，在下一次的約定會面中，他將正式延攬她為線民。會面將如往常一樣，在她的公寓中進行。這個重要會面的記錄并沒有留在檔案之中。我猜想，在建檔的嚴格規定下，那份報告，加上她個人的宣誓文件等，一定被歸類為個人資料，從而被歸于第一部分中了。不過，在隨后的檔案中，她的地位被認定為IMV——與敵人有直接接觸的線民。更往下看時，她更被指定為IMS——負責某特定安全事項的線民。而在整個過程中，她從未停止過說話。

例如，在那年秋天，畫廊來了一個非常顯赫的西德客人，赫爾穆特•科爾（HelmutKohl允“米夏拉”非常遺憾地寫道，畫廊的接待員在[真名]同志的鼓勵下，表現得過度熱心，“一直開門、鞠躬”。

接下來寫的就沒那么逗趣了。除了她休假或因公出國以外，每兩三個星期固定與管她的上級晤面一次，報告她所監視者的政治態度：某某人對異議歌手沃爾夫•比爾曼的驅逐出境表示不滿，某某人對“我們社會的各種問題，表現出近乎資產階級的態度”，她到西柏林去拜訪一名她自稱為“最要好的朋友”以后，手寫了一份長達五頁的報告。

從閱讀檔案中，我可以理解到，一名線民如何逐漸地被拉進“組織”之中，就好像魚被引誘上鉤的過程一樣，一開始的時候線民決心“只談專業的事”，最后連最親密的關系也可以出賣了。就“米夏拉”而言，到后期，她連自己的繼女有一名西德男友都招了。在“對IM進一步指示”下，金策爾少尉寫下了冷酷的幾個詞：Abschdpfung der Tochter。Absch6pfung是國安部另外一個專業名詞。1985年的國安部辭典中，對它下了一個非常冗長的定義：“有系統地進行對話，以吸收目標的知識、信息，并評估通過其他人獲取信息的可能性。”如果非翻譯不可的話，最接近的一個詞，我想就是“打探”（pumping)了。換句話說，“米夏拉”接到指示，必須“打探”她女兒的行徑，并將信息提供給秘密警察。

或許她真的以為自己在和“迪特爾”、“海因茨”聊天，以表現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誠的公民、“事無不可告人者”。所以，她說的都是一些閑話。或許她從來沒有想到，所有她說的一切，都被如此詳細地記錄成文字——雖然，如果我對那份手寫報告的分析不錯的話，她其實對自己報告各種細節的做法，也并沒有任何抗拒感。不過，從閱覽過自己的檔案中，我已了解所謂的“指示”和實際發生的事情之間關系并不大。或許在報告上會冷酷地寫成abschdpfungderTochter(打探），但是實際在訪談上只不過是一句輕松的問話：“你繼女最近怎么樣了？”不過，當她說話時，并不自知自己在說什么話，那只能說她不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公平地說，我想要知道的是，“米夏拉”的報告對她周邊的人有沒有造成傷害，那傷害有多大。但這些事實很難建立。政府規定檔案中無辜第三者的姓名必須涂黑。就算我能夠指認出那些被涂黑的人物姓名，我也無法取得、閱讀那些人的檔案，而只能夠從看他們的記錄中評估她的信息所帶來的效果，并將這效果與其他管道的信息相互比較。因此，只有那些直接受到波及，以及那些選擇閱讀自己檔案的人，才有權評判。不過，據我們所知，國安部對于IM所提供的信息特別重視。那些瑣瑣碎碎、看似沒有任何重要性的信息被放在一起以后，殺傷力便相對抑大，而那正是整個體系能作業的原因。

與此同時，雖然我無法確切地說出她為別人制造了什么困難，但是我可以指出她因此而獲得的益處。一個月以后，例如，內部的一份文件便顯露，她不斷出國并沒有任何確切目的，而僅為履行一項特權而已。在討論她未來赴日本之行將對黨帶來什么好處時，金策爾少尉注意到，“凡是指定給IM所做的人物，他們總是很快地接受并予以完成。IMV‘米夏拉’已取得操作知識與能力，他足以擔當復雜的任務”。在這里，報告中特別用男性的“他”而不用女性的“她”，因為在國安部的語匯中，線民IM為陽性的字眼，事實上，國安部的確是非常男性的世界：只有百分之十的線民為女性。

1979年9月，我現身了。在下一次的會面中，金策爾少尉“指示”她應如何接近我。一星期以后，我仍然沒有和她聯絡上。一個月以后，她仍然沒有得到我的消息。“IM非常關切，他（應該為她）是否做錯了什么事。他的疑慮可以減輕的。”在年底工作評估時，金策爾少尉很滿意地表示，他（她）可以做（在最初進人組織時不能的）事情了。“最主要的一點，是與加頓艾什的接觸。IM在與這一方面的工作，值得贊許。”

1980年至1981年間的報告，除了她個人至意大利及丹麥的旅行之外，斷續提到我們間的接觸，有的進人了我的個人檔案之中。1981年底，一名化名“辛格”，專門管理其他線民的線民，接下了金策爾少尉的工作，而“米夏拉”也繼續為自己的出國機會不斷發聲。1982年3月，記錄顯示“米夏拉”與“辛格”共同“評估”《明鏡周刊》所摘錄我的一本有關東德的書。6月，“辛格”恭喜她獲得“功在祖國銀質勛章”，并提到部里送了她五十馬克為禮物。在接下來的一次會晤中，她大大地批判了丟勒。如果我沒有和她見過面、談過話，絕不會理解，其實她只是在發泄無法去美國的挫折罷了。

檔案就此源源不絕，一下子報告她與瑞士大使館接觸的經過，一下子又是她對某一名手下的評估。“麥可”，也就是格奧爾格博士，生日時，還得到了一份部里送的禮物。“友善的聚會，有尊嚴的聚餐。”“辛格”記錄道。另外，還有一次報告記錄了她繼女的新婚丈夫。

至奧地利旅行。格奧爾格博士病倒。線民告訴“米夏拉”在未來的痛苦時光中，“她（報告第一次以女性稱呼）可以指望組織給予支持”。麗絲，也就是前菲爾比太太寫信給她，說這次旅行到奧地利以后，將不會回到東德。

接下來便是格奧爾格博士去世，她從魏瑪的工作退休下來，申請搬家至柏林。但是就在她離開以前，那最后的一份報告，對象竟然是一名已提出移民申請的藝術家……

當我在追查“米夏拉”向當局報告的瑣細、有時私密而不為人知的細節時，偶然會停下來自問：我真的應該讀這些資料嗎？而且就算我應該的話，我的讀者也應該嗎？

許多作家或報紙編輯因公布某個人的私生活而受到公眾批評時，他們通常會以“維護公眾利益”為自己辯護。但是仔細想想，這些人所謂的“公眾利益”其實是“公眾興趣”，也就是可以讓書籍及報紙更暢銷的賣點。然而，在我所經手的這些檔案資料中，是否真的存在著所謂的“公眾利益”，值得在使“米夏拉”蒙羞、破壞她與其繼女關系的前提下公之于世呢？

有關這個問題的正式答案，可以在有關國安部檔案的法律中獲得解答。根據該法第三十二條，我可以在探索國安部歷史及“政治教育”的前提下，超越保護性利益,閱讀及出版檔案中“現代歷史人物，保有政治或正式職位者，曾經在國安部擔任全職、半職或義務提供情報者，因國安部的工作而獲得利益者”的相關資料。

然而，什么才算是“現代歷史人物”？要如何才算超越保護性利益？一位高克機構的法律專家給了我一個解釋。所謂現代歷史人物，用俗話說，也就是“公眾人物”。不過，根據德國法律，“絕對性”和“相對性”歷史人物之間有所分別。所謂“絕對性”人物為希特勒、丘吉爾之類的大人物。而“相對性”則指僅在某一個歷史的時與地，可以凸顯出重要性的人物。至于保護性利益，則是指個人私生活中的一些敏感性細節，知道了也絕對不會進一步理解國安部的運作。

在實際操作上，高克機構的員工在為查詢者準備資料時，隨時隨地必須運用個人的智慧，即時做出判斷。例如，他們必須先閱讀檔案，劃掉“受影響的第三者”名字而保存“現代歷史人物”名字，另外他們必須將有“保護性利益”的段落遮掩起來。“米夏拉”的檔案中，便有好幾段這類文字在這個前提下被遮掩了起來。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高克機構的員工既然有判斷之實，自然也就應負法律之責。但是，我錯了。根據法律專家的指點，如果出版的話，我是唯一需要在法庭上解釋為什么如此做的人。因此，正如“米夏拉”所幻想的，她可以在法庭上與我相見。不過，我倒不擔心她或其他人會對我提出訴訟，因為我關切的不是我在法律而是在道德方面的責任。例如，我時常想，為什么不能將有關她繼女的部分割舍就算了？還好，經過仔細搜尋，我找到了她的繼女，向她解釋了情況。她在申請查閱自己的檔案后，已經發現了事情的真相，并斷絕了所有的關系。“米夏拉”的親生女兒也在同時發現了事實。

但是，“米夏拉”和她周邊人的關系仍未能解決。在我寫這本書時，曾將這問題就教于友人。有的人認為我應該放“米夏拉”一馬。“否則你就變成和她一樣，”他們說，“你也變成一名線民了。”

但是也有人認為我當然應該公之于世，因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有趣，的確，但是，光有趣是不夠的。我最后仍然決定公之于世——但將名字劃掉——主要還是因為我認為這樣做，可以達到一個更大的目的。在將這個故事出版的同時，我得以從鮮活的細節中烘托出一個完整的形象，表現出一個人是如何地被吸入秘密警察的綿密網絡，并確切地指出通敵的下場將是如何的。

# 第六章  IM“舒爾特”

我和線民“舒爾特”接觸過幾次。就我記憶所及，我們的談話僅限于第三帝國，然而，他對我的行動所打的報告卻至為詳細。他唯一無法詳細敘述的，就是我在普倫茨勞貝格區的住所，因為那實在太乏善可陳了。不過，正如“舒爾特”自己很遺憾地在一次會面中所說的：“總體而言，我們的‘工作午餐’對我而言，并不十分成功。”

我從日記中很容易便追查出“舒爾特”這一號人物。他是一名中年人，在大學里教英國文學。我們很不巧，在一次女皇生日慶祝會上相遇于英國大使官邸的花園中。我還記得他壯碩的身材、微禿的頭頂，雖然英文流利，偶然也能丟出一兩句智慧的語言，但是一般而言是個相當無趣的人。

他似乎屬于那種線民：會花上無數小時，用打字機或手寫的方式記錄下所有無聊而煩瑣的細節，而一位高克機構的專家告訴我，這種線民還不少。他們就把國安部看成筆友一般，不斷地寫、盡量地寫、詳細地寫。而這種報告所能夠制造的效果，可以用只有水塘深度來形容。就以“舒爾特”教授在英國大使館中與三等秘書共進午餐后所打的一份報告為例。那份報告里面恰巧談到了我，所以被放進了我的檔案之中。“與英國懷爾達什先生見面的整個氣氛，”IM“舒爾特”記錄道，“非常公式化，但是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傳統。（這會是一般年輕人看到教授后，故意與他保持距離的結果嗎？）我經過非常痛苦地掙扎，決定點一盤捷克家鄉菜（餃子），而我的同伴則選擇了雞肝為主菜。他雖然是開車來的，但仍喝了兩至三瓶的皮爾斯啤酒。”我不知道現在排起來長達110英里長的高克檔案中，這類毫無內容的東西到底占了多少，20英里還是40英里？

不過，從閱讀“舒爾特”本人的資料中，我逐漸了解到他為什么那么做。當我申請調閱舒爾特的檔案時，竟然將三個相關部分都完整地調了出來。第一部分是兩大厚夾，第二部分多達四本，連有關花費記錄的第三部分都意外地相當扣人心弦。三部加起來，成為一部極令人感傷的故事。檔案開始于I960年。當時的“舒爾特”剛到一所地方大學教英國文學，是一名年輕、很自我中心的學者，年紀剛過三十，還沒有結婚，過去學歷完整，戰爭期間還短暫地加入過希特勒的青年團。他的系主任認為他有的時候太不拘小節，但一般而言，工作很有新意，值得贊許。當時，他還剛以總理英語通譯的身份，從亞洲旅行了一趟回來，可見英語口譯造詣非泛泛之輩。

然而，在那之后他被人舉發，說他在酒吧中行為不檢，喝酒過量后對同性學生有不當的性挑逗行為。有一名學生非常詳細地報告了一次事件的經過。在酒過多巡以后，他開口邀請這名學生至他的公寓中，并開始挑逗這名學生。“‘舒爾特’然后說，如果（學生）把他的皮短褲脫掉，他就去酒窖再拿一瓶酒出來。”“舒爾特”則以長達十頁的報告回應這項指控，里面引用了各種參考資料，以孝明同性戀在歐洲文化史中的地位。他懦弱地為自己抗辯。關于他的行為，他寫道：“嚴重違反了我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職責。”以后，他將“努力不負同志的榮譽”。

接下來便為一連串與“候選人”的前置談話作業。檔案沒有明確記錄任何勒索行為，不過倒寫下了年12月29日早上9點至11點半，在地方政府大樓內舉行的正式延攬訪談過程。在其中，“舒爾特”非常詳細地評估了許多大學同僚。檔案后面附了一個特別的棕色信封，上面以印刷體寫著“宣誓”的字樣，然而那張應該是發誓效忠國安部的宣誓書卻不在信封內。檔案的第二部分開始，巨細無遺地保存下他從1962年的工作內容，包括所有對同僚、學生、認識的人的觀察。與此同時，第一部分繼續收進其他線民對他的觀察（到1970年時，他仍然喝酒喝得相當兇），以及他與人往來信件的影印本。第三部分記錄下他報銷的費用：5馬克的食物及飲料，28馬克的葡萄酒及雪茄，100馬克的電話費，兩百馬克的旅費，以及偶爾對于他優良表現的獎賞。

1975年的記錄中，有一張他因“忠誠服務國家人民軍”而獲得銅牌獎的證書。證書上特別表揚他是“對國家安全部誠實、良心、忠誠服務的表率”，下面還有國家安全部部長埃利希•梅爾克的簽名。

“舒爾特”顯然對國安部越來越感興趣，因為他居然在英國大使館和一等秘書見了面。他在他個案負責人的密切協助下，非常熱心地繼續保持這份友善關系。檔案中留下了那名和藹的一等秘書送給他的《企鶴現代詩人詩集》（penguin Modern Poets )每一冊的封面，以及他們之間信件往來的影印本。在第二部分的第三冊中，我們發現他開始享受特權，遠至劍橋的彼得學院參加有關英國文學的會議，接下來免不了又對其他數名同時參與會議者詳細地品頭論足一番，尤其特別點名雷蒙•威廉斯教授，評論他為“進步派公民”。

在第四冊中，我出現了——他很不甘心地提到，我喝了他不少白蘭地。這么寫，或許是希望國安部還給他一些吧。（根據第三部分的賬單記錄，在下一次的會面中，他的個案主管給了他200馬克，顯然是針對他去了一趟柏林的報銷，應該夠他買上好幾瓶白蘭地的了。）這段期間，他提出了另外一份到英國去開會的提議書，在1980年春，到英國大使公館晚餐，主客為喬治•斯坦納（“斯坦納教授立場不變……”），到了秋天又至大使公館進了一次晚餐，并報告我搭了路透社的馬克•伍德的便車一次。同年12月，他得到300馬克的獎金，并以積極與英國大使館接觸而受到贊揚。在記錄中，有人聽到他對朋友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一直在崩潰中。”像這樣的人，當然不容易獲得銀色勛章。但是，與特工的會晤、報告、小禮物則持續在進行中。1984年3月，他建議當局讓他去波蘭一趟，嘗試與當地的英國外交官建立聯系渠道。那時候，英國已在華沙設立大使館。總而言之，他總是在想一些小游戲，騙到國安部的經費，能到外地旅游一下。

我翻回到第一部分，發現里面摺著另外一個信封，上面寫著“結論報告”，日記為1984年10月4日。“最后一次與IM‘舒爾特’見面。”報告上寫著，日期為1984年5月16日。同年10月7曰，“舒爾特”意外死亡。享年57歲。驟死后“沒有發生任何政治或作戰上的后果”。

# 第七章  IMB“史密斯

重要線民IMB“史密斯”對我批評加諷刺。他說我給人的印象“相當隨便（明明需要打領帶的襯衫，不但不打領帶，還把領子打開……）”。

他非常正確地將我定位在“受自由人文教育長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態度傾向開放、民主”，并覺得我“常帶著一份天真的好奇”，隨時尋找機會，學習新事物，有時候喜歡在“酒店的角落”，與年華老去的工人也就是那些還記得[納粹]時期的老公民談話。

我一點也不記得這個“史密斯”。我的日記中只有一次記錄“在柏林洪堡大學與一名老英國共產黨共進長長的午餐”。在連續調錯檔案好幾次后——一個檔案庫中“史密斯”數目繁多可想而知，我終于找到了所要的檔案。他的確是一名英國人，原來在一家工專教書，1970年代轉至柏林洪堡大學任教，并與一名東德女人結了婚，安定了下來。檔案中的第一部顯示，文特少尉申請與此人建立聯系渠道，以便利用他的“特殊背景”。文特建議由他假裝是市政府職員，打電話給他。結果兩人晤面后，文特自我介紹為國家安全部的海因茨•倫茨，他們從西柏林的一本有關西方情報組織的書中發現了他的名字，看起來情況不妙，因此他們需要他的合作，把這件事擺平。換句話說：他需要證明自己無罪！

這一招果然管用。不到一星期，文特少尉就與——當時暫時被定名為“醫生”的一-未來線民見了面。又經過兩個星期，線民候選人正式簽下了一張承諾書，答應以后在秘密基礎上與他們會面。在檔案第一部后半部中，我找到那個上面寫著“宣誓”的棕色信封袋，里面有一張“醫生”親筆宣誓書，保證自己將“自動自發，支持[國安]部的工作”。同時，為履行這部分工作，我“為自己選擇代號‘史密斯’”。到1981年，他已成為IMB。從1980年開始，IMB取代了IMV(如“米夏拉”的身份），成為重要線民的代號，不過在內容上，大致換湯不換藥，表示最高階層的線民，可與敵人直接接觸。

作為一名英國人，你會一直自問：如果英國也成為這樣的一個共產黨警察國家的話，我們是否也會同樣出現大量線民？擺在眼前的就是一名英國線民，而且他還忙碌得很呢。在第二部中，從開始直至1986年，他前后提出了600頁的報告，填滿了三冊檔案夾。最后的一冊檔案已經不見，或許仍然被置于文特的辦公室檔案柜內，也許已經被撕碎或燒毀了。

剛開始時，“史密斯”交代了許多他與英國大使館的關系。當他們要求他對西柏林的英國辦事處的圖書館提出報告時，他寫了一份地形描述，還繪制了一張非常詳細的地圖。接下來，他們給了他一張打字的正式命令，要他去英國一趟，并告訴他如果英國“特情組織”找到他的話，應該怎么做：不要緊張，表面上千萬保持冷靜！他的任務，便是到倫敦市中心仔細觀察位于春園（Spring Gardens)的英國辦事處總部，詳細記錄下來并繪制成草圖。這種事顯然“史密斯”并不很擅長，在同一個檔案中，附了一張他畫的地圖，首相府、特拉法加廣場、購物中心，然后是春園，只是位置全放錯了。

不久以后，他又接到另外一項正式指示。1982年12月4日11時至13時，他必須至西柏林歐洲中心的“玉石餐廳”（Jade Restaurant),觀察一名女性和她的同伴。任務完成后，他收到150鎊的差旅費用。他在那內容平淡無奇的報告中，居然懷疑餐廳內的中國侍者在觀察他。

就在這些愚蠢可笑的任務之間，他以手寫報告詳細交代了與我的相遇，以及其他在東德的英國人的生活細節。然后，為了執行我的檔案最前面所指定的執行計劃——“在考慮了線民所有主觀和客觀可能性以后”——他們給予他非常詳細的指示，告訴他應該如何再度建立與我之間的接觸。指示中說明他應該通過英國大使館的懷爾達什先生，先找到我在什么地方，但是態度千萬要隨意，“千萬不要說教！”文特特別提醒道。“史密斯”顯然有教書匠的習性，喜歡說教，而不喜歡與人對話。他與文特約定，他將寫一封信給我，請懷爾達什先生轉交給我。檔案中還收有當時的那一封信。或許我還記得我們過去見過面？他讀到了我所寫有關波蘭的文章，因此想要與我進一步討論：

如果任何時候，你在柏林（不論東西），我都極樂意與你見面，并聊一聊相關的事。如果你還寫了其他文章，請不吝給我一份，將不勝感謝。（我想不用贅言，當你送文件時，請勿寄至我的個人地址，而寄至英國大使館，并附上字條，指定收件人即可！）

“我想不用贅言”可真得我心。他的意思就是，你知道的，我怕國安部。

我現在已完全記不得曾收到這樣的一封信。無論如何，它經過了十五年的時間，以檔案的方式來到我的手中。

到1986年，國家安全部似乎已受夠了“史密斯”只知道長篇大論地對他們說教歐洲政治，而不給他們所想要的各種有關人的骯臟私事。我開始看到文特少尉在前面提到的“史密斯”教授的主觀條件限制。到1986年中時，記錄突然停止。

他的名字就在電話簿上。“哈羅，”我說，“或許你還記得我們曾經見過面？”

“很模糊。”

“吃個中飯？”

“可以。”

一名英國人可以完全混人東德人群之中，在街上毫不顯眼？如果是“史密斯”，答案就是肯定的。帶風帽的夾克，咖啡色長褲，白襪子，咖啡色鞋子。（連文特少尉都忍不住記錄道，“史密斯”穿著“干凈”，但是沒有流行感。）他臉色紅潤，略帶雀斑，笑起來有點緊張。

“來個雞，如何？”

好的，他用德文說：“嗒。”

現在該我告訴他。我正在閱讀我的檔案，其中出現了一名線民“史密斯”，不時地便打我的報告。而那個“史密斯”看起來就是他。

“這很有可能。”他說。

我不需要再說什么，他便打開了話匣子，開始敘述他們如何接觸他，從第一次假借“市政府”之名打電話起，娓娓述來。他當時非常擔心，還以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要來與他接觸。等到按照電話約定，雙方在柏林洪堡大學門口見面，找到一間空教室進去后，“海因茨•倫茨”掏出了他的國家安全部證章。當時，他至為震驚，但是仍比不上“海因茨•倫茨”告訴他被西方情報組織盯上的時候。他說，“倫茨”當時是用一套“相當沉重、很像在‘007’電影中出現的詞句”，交代故事的前因后果。等“倫茨”講完時，他已進入完全慌亂的狀態。他很害怕他們會將他驅逐出境——果真如此，他的妻子豈不將永遠陷人鐵幕之后？他回家與妻子商量。他們決定合作，以證明他是值得信任的。

這決定顯然非常錯誤，但是背后的動機是非常能夠讓人理解的。不過，他接下來解釋道，他原本以為通過國安部可以和這個國家建立起溝通的渠道，以他微不足道的力量做到著名的宗教領袖曼弗雷德•施托爾佩[3](#__3)[1]所希望能夠通過與國安部的接觸而做到的事：將政治信息傳達至最上方。根據檔案，施托爾佩的代號為IM“秘書”，后來成了勃蘭登堡的社會民主黨總理。像東德這樣的共產國家，最糟糕的地方便在于它沒有“公民社會的架構”。他想要彌補社會的不足。

他當時認為國安部只是“后面一個小房間的作業，和英國的MI5差不多”，一直到1989年，他才發現原來那本身就是一個大帝國。從那以后，他便很注意媒體上的相關報告，發現很多人的行為簡直“不可思議”，竟然監視朋友行為，幫助組織將他們“定罪”。

他是有“原則”的人，在和國安部談話時的原則，便是盡量談政治與社會議題而不談人。他也很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堅持這項原則。我抓住了這個大好時機，拿出一份他寫的有關我的報告。他顯得有一些慌亂，開始躲避我的視線。他說他覺得非常“不舒服”。“很不夸張地說，覺得非常后悔。”

他最近開始反省，他們告訴他有關西方情報組織的書上有他的名字的故事，是不是真的。為什么他們沒有提到是哪個西方組織？他當時完全相信了他們的話，但是時至今日，他覺得故事是那些人捏造的可能性為“四六開”。

我告訴他，故事的確是捏造的。

接著，我問了他有關“玉石餐廳”的過程是否非常刺激？就像詹姆斯•邦德的電影一樣？

不，他簡直嚇壞了。他以為要被槍斃了。在事后，他要求他們再也不要讓他去擔任那種任務。不過，他很高興有機會能夠用馬克買一些西方的書籍、報紙。

英國辦公室的地圖，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再度流露出窘迫的表情。他以為那只是一個“小小的測驗”。他和會面的官員說話的方式，就像我們兩人現在這樣。而在那段日子中，他前后和不少的官員打過交道。但是，這仍然無法解釋為什么他的檔案中有那些文圖并茂的筆記，就好像那些草圖畫得那么詳細，該如何解釋？“因為我的記憶力很差。”他說，他和官員見面時，都一面看筆記一面談話，話說完了，就將筆記交給對方。那些官員是正式與非正式的奇妙組合。經過一段時間以后，海因茨•倫茨告訴他，部里面已經決定他不是西方間諜，為表達相互之間的信任，“我們建議你以后不要說比較正式的‘您’，而以比較不正式的‘你’稱呼。叫我海因茨，繼續說出你知道的”。

至于他所打別人的那些小報告，他真心認為那些只是無關痛癢的。他認為最重要的還是那些他長篇大論敘述的一般性政治分析。我指出，那些分析對他重要，但是對他們可不重要。他們唯一有興趣的，就是他認為微不足道、無關痛癢的細節末枝。他們將各方搜集來的這些信息放在一起，以考古學家拼起埃及古陶瓶的精神重建過去發生的事情。是的，他說他現在對這點已充分了解。

在午餐結束前，他非常緊張地問：“你會提到我的名字嗎？”他希望我不會。

我說我不會。就讓他繼續以“史密斯”存在吧。

幾個月后，我在柏林就應該如何處理共產黨的過去發表了一次公開演講。我相當詳細地談到了國安部檔案，并舉我個人經驗為例子。演講過后，不少人上前來找我，其中之一便為“史密斯”。看到他，令我感到相當意外。他給了我一個信封。當我回到旅館，將它打開，發現那是一封信。他說他已申請閱讀了自己的檔案，希望能夠再度與我晤面，并“考慮其中的個別觀點”。

附在信件后面的，是一篇長達三頁的文章，題目為《一些有關國家安全部的想法》。里面一點也沒有提到他自己與情報機構的關聯，而以非常一般的方式檢討問題，就好像一位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學者對另外一位學者提出他的觀點一樣。例如，在文中他寫道：“國家安全部檔案反映出該部的自我形象（從報道、闡釋的方式以及從文字中的專有名詞等方面）。任何人，凡是熟悉文本分析或了解問題感知及文字創作目標理論者，就知道在闡釋這類資料時應該要特別小心。”

在整篇文章中，“我”這個字眼，未曾出現過一次。

# 第八章 IM“R太太”

我第一次遇見R太太，是在柏林一個小型反法西斯運動的展覽會上。六十來歲，一頭白發的她，不但風度好，言語有趣，而且風姿非常出眾。她出生于一個非常富裕而且有文化的德國猶太家庭，在1930年代初期希特勒當權不久當她還只有十幾歲時，便投身共產黨，并因此被學校開除。隨后，她與人生的伴侶相逢，追隨他至莫斯科。兩人結婚，生了一個兒子。不久以后，他和許多其他人一樣，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時期被捕，在蘇維埃集中營一待便是十幾年。而她也被迫到所謂的“勞動軍”中工作。有一段時間，她的兒子還被送進了孤兒院。

經過很多年以后，在1950年代中期，他們想辦法回到了共產黨統治下的德國，又生了一個兒子。雖然她丈夫一直沒有完全從集中營的苦痛中恢復過來，但是至少她自己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有一些思想相近的朋友，并能和寶貝子女生活在一起。然而，就在柏林墻筑起前不久，她的長子與媳婦帶著出生不久的嬰兒逃到了西柏林。她足足有十年沒能再見到他。

在這么多個人悲劇都因共產黨而起以后，一般人一定以為她會變得積極反共。但是，她以一種安靜而哀愁的熱誠宣稱，她依然相信共產主義將帶來終極正義與偉大。我暗自猜測：她是否用這種思考方式來合理化自己所受的苦難？如果終極目標是正義與偉大的，那么她所受的苦難就不算白費。她今天雖然受了一點苦，但是卻可以幫助其他人在明天更理解共產主義一點。

在對話中，她毫不自憐自艾或做出無病呻吟的樣子。相反，她充滿了好奇，說話風趣而有內容，判斷更是精確敏銳，毫不猶疑地以實事求是的語氣，從她略帶鼻音的聲調中吐露心聲。我們兩人一拍即合。我的日記中記錄著，我是多么喜歡到她安靜的公寓，在鑲花地板與木制書架的環繞中，與她共進晚餐。另外，我還在觀賞羅爾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的舞臺劇《律師》在東德首演時，意外地在戲院中碰到她。《律師》一劇內容為一名前納粹軍事法官，當年為了許多小事將很多人判處死刑，后來成為西德的高宮，卻被卷入了一宗丑聞之中。

1980年4月15日，我發現，我們去看了一出東德有名的后布萊希特劇作家海納.穆勒（Heiner Miiller)的戲劇《農民》，然后回到她的公寓，“交心”對話許久。根據日記的記錄，她對我說：“噢，如果你是我兒子就好了。你的父母必定費了一番心血把你養育得這么好。”我當時還在想，這句話出自一位德國猶太共產黨員，不知道我的父母會作何感想。我同情她，景仰她，將她視為我的朋友。

所以，當舒爾茨女士交給我一份檔案中的抽頁，將她列為主部門XX處之下一個操作團體的線民時，我感到萬分的悲傷。主部門XX處主管的事務直言之，便為滲透、監視文化生活、大學、宗教和他們所謂的“政治地下活動”。抽頁中的第一個報告便令我感到非常驚訝：劇作家羅爾夫•霍赫胡特告訴她，他認為我是英國間諜。我的確在那以前與霍赫胡特見過面，并談過話。“進一步布置線民，”報告下結論道，“在某種程度上，是可能的。”

接下來的一個報告，日期為1980年4月28日，開頭便寫道：“根據指示”，“已開始建立HVAXX/OG的一名線民，與英國公民加登艾什，蒂莫西（Gard〇n-Ash，Timothi)(就是我，拼寫顯然有誤）兩者之間的接觸。”然后，報告記錄下我們一起去看海納•穆勒的舞臺劇，以及隨后兩個人以我對納粹時期的反抗運動的研究為主題的談話。“當線民提出看法，認為這項研究英國早就該做，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則已克服了這項歷史包衹，加登艾什顯得很不以為然。他否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中存在著任何法西斯傾向，并強調他在那里有很多好朋友。  
   
 “加登艾什似乎對魏瑪印象非常深刻。他希望在短期內再度訪問該地，參加當地的莎士比亞會議。

“IM再次提到羅爾夫•霍赫胡特（以下模糊不清），說他認為加登艾什為英國間諜。艾什的回答是羅爾夫•霍赫胡特和很多其他人一樣，看了太多不正經的報紙，覺得在海外的英國人中兩個就有一個是間諜。他一點也沒有顯露出任何窘迫的表情。”

第三份報告，抽自同一冊檔案，記錄了我與柏林反納粹運動下的共產黨生存者會面談話的情形。我不清楚那份報告出自R太太，還是同一個操作團體下的其他線民之手。當我被問到為什么要選這個題目時，我顯然說了牛津、劍橋傳統上會指定這類題目之類的話。“根據國安部資料來源（亦即國安部線民）暗示，當提到在20及30年代共產黨的朋友都來自這些大學（金姆•菲爾比），加登艾什的反應是無言的諷刺表情。”

十五年后，我再次坐在同一棟公寓、同一張沙發，只是感覺完全不同了。R太太已經非常老，不過仍然與往日一般敏銳。當我告訴她我為什么再度來看她時，她說：“喚，那我該怎么辦？從窗戶跳出去？”她完全否認自己知道國安部將她列為線民，并從頭便拒絕看我帶去的檔案資料影印本。

然后，她提醒我，她在她所深信的共產主義下所受的痛苦有多深。“不，蒂姆，”她說，“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她——自憐自艾地——提到了勞動軍中的痛苦、她死去的丈夫、遠方的兒子。我們兩個人心里都有數，她是故意要利用這些事情來改變我對她的評價。她講的故事確實十分沉重。不經多久，我便忍不住告訴她，我并無權坐在那里評價她這個人。我會為她保守她的秘密，請她安心歡度晚年。

但是當我要離開時，我可以從她眼睛中看得出來，做線民的那一段往事將永遠困擾她，或許并不因為她曾經通敵——畢竟，當時她是一名居住在共產國家的共產黨員，而是因為是有檔案可查的線民。線民的形象是低賤、下等的，與她在人生剛開始的時候，將自己設定成的為美好新世界而奮斗的驕傲、勇敢猶太女孩是多么不同。另外，她還無法完全揮去秘密可能被我或其他人曝光的陰影。

回顧那一次的拜訪，我幾乎希望自己從來就不必面對她。我有什么權力否決一位歷經苦海煎熬、最后選擇遺忘的老太太的愿望,而我從暴露她的事情中又達到了什么崇高的目標？

# 第九章 波瀾壯闊在波蘭

從1980年秋起，我的檔案盡是與波蘭相關的事情。一紙國安部內部文件寫明我將至波蘭旅行。他們怎么會知道？報告中非常仔細地記錄下我與一名駐波恩“反蘇聯俄裔移民雜志”編輯的談話，內容是有關一個所謂的“反革命組織KSS‘KOS’”的事情。他們是竊聽了我的電話，還是哪個編輯的電話？同一紙文件中，還提到另外一個情報來源說：“因波蘭的情勢發展，美國某不明單位已經派遣兩隊人馬入駐西柏林‘魔鬼山’監聽站’[4](#__4)[1]。文件后面附上了我替《明鏡周刊》寫的有關波蘭情勢的文章。似乎就憑借著這些文章以及我與波蘭“反社會主義力量”的關系，他們決定對我展開全面的調查。

當時，我已搬回西柏林。1980年10月7日，當恩格斯衛隊結束閱兵，槍桿上插著康乃馨，行軍離開現場的那一天，我正好開車經過查理檢查哨，回到普倫茨勞貝格區的公寓取回剩下的一些衣物、筆記，搬至西柏林的寬敞公寓之中。我繼續在維蘭德街居住了一年，為西德的一家出版社與讀者寫了一本有關東德的書。《明鏡周刊》在1981年該書出版時，同步刊登了部分的書摘。在那一整年中，我其實真心關注的是在團結工會的革命浪潮下危機不斷的波蘭。

國安部對團結工會的“興趣”甚至在我之上。當我在格但斯克造船廠與罷工工人在一起時，馬可-沃爾夫上校同志正在華沙，非常急切地對他的同僚談到波蘭情報工作的狀況。他們對他保證，波蘭共產黨絕對不會讓工會獨立的。沃爾夫飛回東柏林，打電話給外交部長，并報告他所獲得的最新內部情報。外交部長對他說：“你難道沒有看到最近的新聞嗎？”10月初，梅爾克部長告訴國家安全部的資深官員，波蘭所發生的事情將攸關東德的生死。在基層方面，我從周邊的線民的檔案——從舒爾特到R太太——發現，每個人都要求詢問一般人對團結工會的反應。整個國家安全部都動員起來，試圖診斷出東德是否會罹患“波蘭癥”。

波蘭本身已成了東德秘密警察的“作戰區”。原來只有共產黨陣營以外的區域才會被劃為“作戰區”，但是現在波蘭所有的城市和柏林的一個特定“工作團”內，都有他們的“作戰團體”。就是通過這個作戰團體，他們在我訪問波蘭時，安排線民與我搭上線、取得聯絡的。雖然我沒有確切的證據顯示實際行動過程，但是在我的線民檔案中發現不少在我的檔案中不存在的材料。如果波蘭有一天如德國一般，決定公開他們手上的秘密檔案的話，我可能會挖掘到更多有關我的事情。

其他的檔案中的材料，包括我從東柏林搭機至波蘭之際，在機場內翻開我的行李所翻拍的各種私人資料，例如我的個人筆記、對波蘭政治人物、地理情況的各種剪報，收到的名片，甚至連我隨身攜帶的書本封面，以及我個人筆記本內的手寫筆記，也沒有放過。

在我個人筆記中，我憑著記憶，寫下不同異議分子對言論自由的觀點，并為它們取名為“就好像”（As If)原則。我想起一名當代波蘭詩人理查德•克利尼斯基（Ryszard Krynicki),為波蘭最勇敢、最具性格的異議分子亞當•米奇尼克（AdamMichnik)所寫的一首詩：

是的，的確，我們不知道當下活在這里時

你必須假裝

你其實是活在另外一個時代的另外一個地方。

在抄錄了這節短詩以后，我還加上了蘇聯異議分子安德烈•薩哈羅夫以及一名德國朋友加百列•貝格爾對那句詩的意見：“薩哈羅夫：日常行為，就假裝你住在一個自由國家一般！貝格爾：就好像國安部不存在一般……”貝格爾曾因政治理由被東德監禁過一段時間。在這個國安部檔案中，又給他們抓到一個小辮子。

我現在在牛津，翻開當時的那本筆記，發現在一個大雪紛飛的1月早上，我坐上一部巴士，匆忙通過柏林墻，來到東德的機場。“邊境的黑雪。”然后：“海關的官員。詳細閱讀過我護照的每一頁。一個信封內裝了兩千馬克。他帶著詢問的眼光問我道：‘是你的嗎？’”在此同時，正如我現在所知的，他們正趕忙拍下我行李內文件的內容。在筆記的下一篇記錄中，我寫道：“一名中年男子，在東德國營航空公司噴射機內。著羊毛短外套，臉上表情就像是那種典型日常生活一成不變的人。”

到華沙機場后，又是一番詳細搜索。避開機場門口那些行徑與海盜無異、堅持用西德馬克或美元計價的計程車司機，我找到一部破舊的捷克制的國民計程車，蜿蜒穿過冰雪覆蓋的灰色街道，來到我的老巢：歐羅佩斯基旅館（Hotel Europejski)。歐羅佩斯基曾經是華沙最時髦的旅館，但是當時已顯得相當破敗（我非常高興獲知，專門描寫破敗風物的大師格雷厄姆•格林也曾住過這里）。在旅館內打了幾通電話，發現電話線上有奇怪的雜音。接下來，事情便接二連三地發生了。

斯比塔納街上團結工會的辦公室內嘈雜沸騰，角落上一臺古老的復印機不斷地在工作，辦公和非辦公的人三五成群，以比任何飲酒派對都大的音量對談，工人與教授正七手八腳努力將最新但已相當模糊的公報張貼至臨時的角架公告欄上。在街角的咖啡廳，雅內克、朱安娜、安德烈，煙不離手，茶不離口，一面開玩笑，一面認真談話。一陣呼嘯，幾個人就起身往電車司機站而去。電車司機已威脅罷工多時，隨時可能成真。公共運輸工人的領袖是二十八歲的沃伊切赫•卡明斯基（Wojdech KamiAski),是一個眼光銳利、蓄小胡子、穿皮夾克的小伙子。他的父親曾在西方的希特勒反抗軍中打過仗，回到波蘭以后，便被共產黨監禁起來。現在輪到了兒子的時代。

我很快來到波蘭偏遠的東南角，發現當地的農人也在串聯、團結之中。掩蓋在白雪下的木造農村房屋，臉龐寬大的農人，編織著籃子的村婦，令人不禁錯覺恍如回到好幾個世紀以前。我再度以沖鋒的速度回到華沙，參加團結工會全國領袖間的另一次危機會議。歷經風霜的礦工、鋼鐵工人，坐在尊嚴高貴的木飾會議室內，與宗教領袖談笑風生，共議國家大事。興奮、歡笑、美女、宏偉的目標。我夫復何求？而且，不論我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團結工會”這個和平革命的標志，以紅色的大型粗體字，與紅白相間的國旗，耀眼地展示著它的光芒。

波蘭所發生的，便是記者口中所謂的“突發新聞”。追這種新聞，就好像騎在一匹賽馬上猛力向前跑一樣，非常興奮，但是卻看不到整體的比賽情況。然而，我不但想從馬鞍上，更想從觀眾席、甚至空中，看到更完整的賽馬情況，以了解這個事件在歷史上的定位。現在正在發生的歷史。

對我而言，波蘭更是一個目標、一個主張。“波蘭就是我的西班牙，1980年圣誕夜，我在日記中寫道。在報告和評論中，我力求正確、平衡報道情況，并對各方提出批評。然而，我的心絕非公正不偏的。我希望團結工會勝利。我希望波蘭解放、自由。

在那段時期，我與很多屬于1968世代的波蘭人在一起，有幾個成為終生的好朋友。個子雖小但精力充沛的《工聯報》編輯海倫娜•武奇沃（Helena Luczywo),她隨時不在抽煙便在講話，但是給予我非常多的指點與幫助。文藝評論家、美學家、納博科夫及貢布羅維奇鑒賞專家沃伊切赫•卡爾平斯基（WojciechKarphiski),成為我了解波蘭文化史的非正式線民。永遠有用不完精力的亞當•米奇尼克，每次說話，吐出智慧語言的同時，也露出一口壞牙；另外還有優雅的自由保守派人士馬爾欽•克魯爾（Macdn Kro1),說每一句話前都仔細斟酌遣詞用字的詩人理查德•克利尼斯基等，都成了我的朋友。

這些六八世代的波蘭人和六八世代的德國人之間至少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共同點：穿著隨意，在語言、性及個人關系上都選擇以比較不正式的方式處理（例如在說話時，直接用ty,面不以比較正式的pan結尾）。但是，兩者之間也有許多非常重要的相異點。六八世代的波蘭人雖然和德國人一樣反抗的是上一個時代的人，但是他們上一代人背負的罪惡并非納粹、與納粹合作或拒絕反抗納粹，而是共產黨、與共產黨合作或拒絕反抗共產黨。而且，六八世代的波蘭人在當時、在以后都繼續居住在共產黨統治之下。

一九六八年，波蘭共產黨曾針對內部及學生，尤其本身便為猶太共產黨的子女，發動了一次非常恐怖的反猶太運動。現在，這些波蘭版的“紅麗絲”及R太太的子女冒出頭來，在反共產黨陣營中扮演一個角色，再度為猶太人在中歐歷史的重要性寫下新的一章。

每個舍棄共產黨而加入敵對陣營的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都可以講出許多秘密警察如何騷擾、歧視甚至監禁他們的故事，相較之下，六八世代的德國人抱怨“禁止擔任公職”和“結構性暴力”便顯得有點小題大做和歇斯底里。我由衷地敬佩團結工會中的老一輩學術領袖，如布羅尼斯瓦夫•蓋雷梅克[5](#__5)[2]、約瑟夫•蒂施納[6](#__6)[3]神父等人。原為歷史學家的蓋雷梅克，搖身一變成了創造歷史的人，而蒂施納神父則有說不完的笑話，都和他所出生的山村有關。不過，真正令我印象深刻的還不是這些知識分子，而是那些鋼鐵工廠的工人、鄉村的農人、辦公室的小辦事員、家庭主婦等等。他們不但找到了自己的聲音，而且直截了當地將內心的話說了出來，深深地打動了人心。那經驗幾乎是一種宗教性的，就好像圣經中所說的到了圣靈降臨時人人都說出真話一般。

到了1989年的革命期間，中歐每個國家都出現了類似的現象。然而，在1980年至1981年，我首度在波蘭觀察到了這個現象。“這是一次心靈的革命。”一名波蘭人告訴我，而他并非詩人，而是波茲南的一名個子矮小、面色蒼白、穿著一件骯臟黑夾克的工人。當時波蘭的情況并不樂觀，民生疾苦，物價飛漲，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混亂，蘇聯人侵的陰影揮之不去。不過，在波蘭內部所感受到的對蘇聯的恐懼感，似乎還不及在外部的來得尖銳。波蘭異議詩人茲比格涅夫-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81年初曾開玩笑道，他受不了國外的緊張與壓力。從波蘭以后，我在很多其他的危機發生地，如尼加拉瓜、薩爾瓦多甚至波斯尼亞，都有過類似的奇異經歷，當你在這些地點以外的地方，總以為當地人一定每一秒鐘都生活在緊張之中，但是當你進入那些危機發生地以后，卻發現每個人穿得和平常一樣，做著和平常一樣的事情，他們照樣地在狀似寧靜的大街上，購物、調情、閑聊。

那個冬天之旅，在三名身材粗壯的秘密警察敲開我的旅館房門時，驟然結束。他們開著破爛的波羅乃茲（PoloneZ)汽車，把我載至警察局，限我二十四小時內離開波蘭。我立刻飛至漢堡，與《明鏡周刊》的發行人及總編輯晤面。我們之間的對話令我終生難忘。根據我的筆記，對話的過程大約為：總編輯對我說：“俄國人下星期會入侵嗎？”我向他解釋說，最無法做這種判斷的地方就是波蘭了。發行人對總編輯說：“我們有坦克嗎？”我稍事遲疑后，發現他指的是有沒有坦克車的照片，替封面故事配圖。總編輯說：“事實上，俄國坦克賣的情況并不很好。”（他指的是不久前他們曾經刊登過一個封面，顯示一部俄國坦克壓過一個白色波蘭鷹的圖樣，雜志銷售情形不怎么樣。）發行人靠回椅背，半自言自語地說：“流血必須要流得有價值，我們才能夠有好的封面故事。”在我的概念中，玩笑不是這么開的。

德國和波蘭之間有一個截然不同之處。一般而言，在波蘭，自由的體驗與對它的期待超越了對戰爭的恐懼；但是在德國，情形則完全相反。這背后當然有許多原因：不同的歷史，不同的處理俄羅斯的手段等等，但是有一點特別不同的地方在于，德國人害怕，如果華沙公約組織真的侵略波蘭的話，東德就必須像1968年蘇聯人侵捷克一樣，被迫卷入其中。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國防軍西行以后四十一年，德國士兵必須再度跨過波蘭邊界。在離開東柏林的那一天，我在日記上寫道：“我覺得俄國士兵開進波蘭的機會很大（德國人昵？D博士今天說：不）。”D博士當然就是丹普博士。不久前，他才給我餞行，并送我一本漂亮的齊勒畫冊。要讓自己回到當時的恐懼中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因為，所懼怕的事情終究沒有發生，而且我們似乎有一種感覺，那是不可能發生的，然而，今天，就在我寫這一段時，我手邊同時放著一張當時東德領袖昂納克的講話記錄。他在1980年11月20日告訴波蘭政治局成員斯蒂芬•奧爾紹夫斯基（Stefan Olszowksi):“我們不希望發生流血事件。那是最后的手段。但是在我們必須要防御工人和農人的力量時，也不能不拿出這最后的手段。1953年時，我們便有過一次經驗，1968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情況也相同。”另外，我從東德國防部的資料檔案中還調出了一張圖表，顯示當時軍隊已經做好了跨越波蘭國界的部署。蘇聯到底有多么認真地考慮人侵波蘭，而東德又多么嚴肅地準備參與，將永遠成為歷史不解之謎，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各方的恐懼并非毫無根據。

西方的恐懼感之大之深，在今天回想起來，幾乎更不可思議。當時我們正處于所謂的“第二次冷戰”之中，里根與勃列日涅夫對峙，美國的巡弋導彈與蘇聯的長程導彈相對排開。波蘭革命很可能成為導火線，引爆核戰爭，摧毀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不論在波恩、倫敦、阿姆斯特丹，到處都有和平游行。民眾在汽車背后，張貼出“離午夜只有五分鐘”的標語。一切的一切，都表露出全球對戰爭的恐懼。

我對東歐自由運動的同情，自然甚于對西方和平運動的贊同。事實上，我與歷史學家湯普森（E.P.Thompson)針對兩者之間的關系曾展開一場辯論。湯普森是英國和平運動的大思想家。我還記得，我當時覺得外界過分夸張核戰爭的可能性，幾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不過，再一次地，記憶這玩意兒很會惡作劇。我翻開我在1980年所寫的最后一則日記，愕然發現我自己這樣寫道：“未來十年中，必定會發生一場核戰爭。”然后，我用大字特別夸張地再寫了一次："我們將在這個十年中，看到一場核戰爭。”

在這樣的一個革命背景以及沉重的天譴浩劫氣氛中，我的私人生活也起了很大的變化。我談戀愛了。達努塔（Danuta)在來到西柏林前，曾居住于美麗的克拉科夫并與當地的異議分子往來密切。她詩意盎然、精靈可愛、美麗活潑、熱力四射，令周邊人無法不分享她的快樂與憂傷。在痛苦的波蘭之行后，我們在西柏林，森林散步，騎車尋樂，或在路邊的希臘餐廳共進晚餐。但是當晚上回到維蘭德街公寓時，電話或收音機卻隨時會傳出更多有關東柏林的消息。

為快速將最新消息發出，我必須趕至溫特費爾德的中央郵局，用傳真將文章發至倫敦。在路上，我會聽菲舍爾•迪斯考的錄音帶，讓他的歌聲隨著舒伯特的旋律傳出：

我哭，我笑，

但卻在不同理由下，被愛安撫。

前一分鐘在笑，后一分鐘卻在哭。這便是戀愛的感覺。同時陷入戀愛與革命之中。我的日記同時記載了兩個人之間的摩擦、危機，以及“對波蘭高度焦慮”之類的文字。我們的命運，似乎和波蘭的命運錯綜復雜地交錯在一起了。

今天，我們的兒子很喜歡聽我們講共產黨統治下的生活情形，和秘密警察的運作故事，尤其喜歡聽其中的滑稽趣事。“再說呀，媽媽。再說一個笨警察的故事！”對于他們，那些故事簡直就像天方夜譚，而如今墊在櫥柜下的幾塊柏林墻磚石，則與龐貝古跡的遺物無異。

就連我，也必須大幅動用記憶力——或許該說是想象力——才能回到過去的經驗之中。我個人首次發現，非常想做一件事但是卻被政府阻止去做，是什么滋味。我在過去曾有過想做一件事卻被父母、師長等與我個人有關的權威人士阻止的滋味。但是被政府阻止卻是從來未有的事情。當然，我曾經讀過類似的經驗，在東歐也曾親眼看到這類事情發生。但是這類事情從未在我個人以及我所愛的人身上發生過。

邊境、簽證、許可證等等，首度成為日常生活中必須要處理的事情。連我們的夢想都被邊境警衛打亂。根據我的日記，1981年3月的一天夜晚，我夢到自己搭乘一輛火車跨越波蘭邊境，并商討應該如何逃出。是否該假造一個簽證章？正在此時，一名警衛乘著一輛在波蘭鄉間經常可見的馬車，來到火車旁，對著我怒吼。同一天晚上，達努塔夢到我們正和一群朋友走過森林，到達邊境。我們被東德的邊境警衛叫住，命令我們分散開：凡是贊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站到左邊，反對的站在右邊，然后警衛開始對兩邊同時開槍。她一面逃跑，在跨過東德邊境線時，一面從一個穿著東德制服的黑人手上的托盤上，順手拿了一塊深紫色的薄餅干。

最后的超現實景象，或許是受了彼得•查德克（Peter Zadek)制作的《法拉達》（Fallada-Revue )影響。在那幾天前，我們才一起到劇院看了那一出內容極為豐富的舞臺劇。其實，就我個人而言，在幾小時后，我便飛回倫敦，參加《旁觀者》的年度酒宴，那感覺也同樣超現實。還有一次，在短暫的回國之旅中，我到位于倫敦中心的康諾特體育館參加了一次社會民主黨的宴會，感覺也非常不真實。“很沒勁的派對。”我在日記中寫道。然后，我記錄下大衛•歐文哀愁地宣示：“我們國家遭遇到真正的困難了。”

1981年12月13日，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宣布波蘭進入軍事戒嚴，令我們兩人深感震驚。當時，我們正在英國，待在詹姆斯在牛津巴特馬斯路的新房子中。接到消息的第一天晚上，達努塔無法自抑地發抖個不停。她的國家遭遇到真正的困難了。我不但出于職業的關懷，感到萬分挫折，更因為我們在英國而我們的朋友卻被扔進軍事管制區內，而感到憤怒。我設法混人一個救援隊伍，進人波蘭，但是不出我所料，波蘭大使館拒絕發給我簽證。“他被列入波蘭黑名單。”我的檔案中，有這么一則記錄。

那個圣誕節過得一點也不快樂。波蘭倒行逆施，實行獨裁，關閉鐵幕，切斷與西方的聯絡，更使得達努塔與我共度余生的決定變得毫無轉園余地；對她而言，在另外一個國家重新開始婚姻生活，必須負擔的個人風險與成本顯得更為龐大而沉重。有一天晚上，她夢見回到克拉科夫的老家。家門口有一棵老樹。她將它砍斷。

相反，我回到了自己的國家，原來的城市。雖然城市并沒有改變，但是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了。在那以前，我基本上生活在一套特定的英國理想之上，我有我的情緒弱點，也有一套自我控制、自我滿足的方式，或許正如麗絲形容金姆的，“有點保守、自持”。我就好像一名秘密士兵，因為獨行，因此向前的速度極快。當時的另外一本筆記中，我發現：“閱讀康拉德（Conrad )的《勝利》(Victory)……海斯特（Heyst)說：‘我只知道那些建立關系的人失落了。腐敗的細菌進人了他的靈魂。’”描述的正是我。一直到那一陣子為止的我。但是從那以后，我的想法轉變了。“那些建立關系的人并不完全失落我寫道，“救贖的細菌進入了他的靈魂。”

# 第十章  禁止入境黑名單

盡管在1981年春，他們在“行動計劃”下布置了無數的線索，如重新啟用線民，檢查我的信件，與HVA合作，詢問KGB有關英國人對金姆•菲爾比案重新調查的始末等等，一直到秋天，Ⅱ/9組仍然摸不清楚我到底想干什么。但是，就在那一年的圣誕節前,他們終于有了突破。

在1981年12月24日，考爾富斯中校報告反情報組織頭子，克雷奇中將提出報告：“從附件中明顯可見，加頓艾什利用他在東德停留的正式身份，從事非法搜集信息的活動。”

隱藏在“附件”里面的會是什么？一份秘密線民的報告？一次電話竊聽的結果？一封午夜從我的維蘭德街公寓信箱中偷竊出來的信件？一個KGB提供的線索？我迫不及待地往下翻……

……發現：11月份，《明鏡周刊》摘錄我所寫的有關東德情況的書的影印本。原來，東德秘密警察只不過和數以百萬計的普通西德讀者一樣，從我公開出版的文章中，發現了我逗留在東德真正的目的罷了。

翻閱著那些以“紅色普魯士”為題的文章的影印本，我可以理解為什么國安部感覺非常惱怒。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形容東德社會.的軍事化及線民密布等情形。我引用國家安全部部長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單位成就時所說的話：“[我]無法想象，沒有我們國家的公民精力充沛的協助和支持的話，將如何達成工作。”我在引言的后面，還評論道：“總算有一次，國家安全部說的話沒有錯。”另外，我還引用了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在什未林扮演浮士德博士的演員在替我們倒了一大杯馬丁尼，并為他自己叫了一小瓶啤酒以后，開始套安德莉的前夫說出他是否曾有逃至西方的念頭，以及他是否認為我是一名西方記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我寫道，“德國民間傳說中的惡魔依然存在，仍然為魔鬼頭子做事，但是浮士德卻已轉而投效國安部了。”

除此以外，我將德國人的順從和波蘭人的反抗詳細地對比后，對東德下了一些不佳的評語。或許有一天，東德人因受到波蘭團結工會的行為啟發，而將他們各自私下的不滿團結起來，跨出革命性的一步，形成聯盟，“但是今天，在1980年代之初，他們最多能做的，就是推倒柏林墻了”。

當一切都已太晚以后，東德政府卻積極行動了起來。外交部管記者的部門判定，雖然我“在比較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及波蘭人民共和國的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時，想要給讀者留下一個客觀的印象”，但是結果卻“散播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反革命發展思想”，因此應該將我列人禁止入境名單之中。他們另外還召喚了英國外交官至外交部，做了一次正式抗議。

東德外交部召見英國外交官會談的正式記錄，日期為1982年1月4日，被召見的英國官員為大使館的一等秘書。副本抄送外交部次長。根據英國事務組格倫德曼先生的記錄，阿斯特利先生被告知，我的作品“不僅包含了惡意捏造的謊言和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刻意毀謗，而且還有意破壞和平、東西雙方努力達成的大和解，和兩國人民的合作關系，以及國際的理解。違反了赫爾辛基最終協定，并且直接干涉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內政……”，他因此熱切表達“我方意愿：這種直接違反兩國關系的活動，不應再發生”。

在回答時，“阿斯特利先生提到所謂的英國記者的個人自由，大使館無法干涉他所寫的文字內容”。但是阿爾布雷希特同志反擊道，我并非記者，而是在文化協定下前來學習的學生。阿斯特利回答說，我們也并不喜歡所有東德發表的有關我們的報道。阿爾布雷希特同志說這個比較“缺乏誠意”。根據檔案記錄，阿斯特利最后表現出外交官應有的風范，非常遺憾這事件的發生，并且希望我的行為“不至于被認定是英國政府的行為，因此妨礙了兩國之間的關系”。

檔案很快地進入了正式的“總結報告”。日期為1982年4月27日。在這里，他們修正了對我思想的判斷。我不再被視為他們當初以為的“布爾喬亞自由派”，而被認定為“保守、反動”。

報告總結了檔案中的主要內容：我個人的詳細資料及歷史研究，我與英國大使館、維爾納、“米夏拉”、麗絲•菲爾比（亦即一般所知的“紅麗絲”）之間的接觸等等。“我們必須假設，實際與此人有接觸者，比已知的接觸者要多得多。”還有在波蘭我與“反革命分子接觸”的情形，飛機場的搜查和結果，我在《明鏡周刊》、英國報紙或《泰晤士報》、《星期日電訊報》、《旁觀者》周刊等雜志上發表的文章。最后，它還提到了我那本“令人憎恨地惡意中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社會及經濟發展，并攻擊黨中央及國家領導、毀謗我國外交及國家安全政策”的書，并說我展現出“好戰的反共觀點”。這本書的摘錄，已經通過西柏林的RIAS電臺廣播出去（廣被東德人所收聽),電臺還播放了對我的電話采訪。采訪表明我“很有可能再回牛津居住”。

在結論中，文特少尉特別強調我利用學者的身份，假借研究納粹時期的柏林，大量搜集資料，毀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并且在寫到波蘭時，公開宣稱自己“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由于我已回到英國，因此可以對我做的“作戰性行動”相當有限。在加頓艾什不斷嘗試干涉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及波蘭人民共和國內政的情形下，“羅密歐”行動正式告一段落，下面由第六處接手，展開“禁止入境”措施。

不知道為什么，雖然內部決議已成，但是實際行動的展開卻為七個月以后的事了。維爾納的檔案顯示，有一位貢特爾少尉在東德打了一個報告，表示，在1982年8月25日，早上9點，我出現于查理檢查哨，要求申請一個當日往返的簽證。由于我“在西方媒體上發表了負面文章”以后，他便知道我的存在，因此我一出現于檢查哨，他便注意到了我。“在護照驗證和海關檢查時，他（加頓艾什）表現得鎮靜、保守自持，除非必要，并不多言。每次開口時都先說英語，然后才說德語。他穿著干凈、端正，他的外表甚為整齊。”然后，他觀察到我坐進一部汽車，并記下車牌號碼，并特別提到那部車屬于維爾納•克雷奇爾。

在我個人檔案中，有一份文特少尉于1982年12月6日寫的簡短備忘錄，內容為第六組已對“羅密歐”實施“人境管制，期限為1989年12月31日”。然而，誰會知道，到1989年底時，天地已經大變。

根據備忘錄，我的入境管制范圍包括與西方國家簽訂協定以外的過境，以及“根據部長同志指示”，不準從西德，經過東德，進人西柏林。

果然，1983年，我想要從腓特烈大道車站進人東柏林時，邊境警衛不準我人境。當我問那名軍官原因時，他說：“陳述理由并非國際通用的習慣。”過了一段時間，我再次嘗試乘坐火車前往波蘭，仍在腓特烈大道車站，從火車上被抓了下來。邊境警衛仍拒絕告訴我理由，不過，他倒是將我所交的五馬克過境簽證費還給了我。

# 第十一章  浮士德群像

現在，我想要知道更多有關國安部官員的事情。因為，如果我和我的朋友屬于三角形的第一個邊，而線民屬于第二個邊的話，那么那些官員就為第三邊了。在國家安全部內工作是什么滋味？他們如何成為國家安全部官員的？他們在調查我的時候，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他們現在又在做些什么？

這個任務不簡單。有部分官員對歷史學家或記者開口說話，如顯然已經非常衰老的梅爾克，在獄中接受了《明鏡周刊》的專訪，馬可•沃爾夫成為電視脫口秀的寵兒，有一些名氣較小的人物聯合組成了一個“內線委員會”，探索他們所工作的部門歷史，并展現出至今為止部外人士所沒有的洞察力。另外，他們也加人國安部受害者的研討會，參與這一個混合了團體治療與口述歷史的奇怪組合。其中有一個團體定期聚會達數年之久，主持人為東柏林的一名神父，烏里希•施勒特爾（Ulrich Schrdter)。大部分前國家安全部的官員在東德瓦解后便失業了，但是也有一些找到了有興趣的新工作。施勒特爾神父告訴我，有一個人成為喪禮的主持人，經常有舊同僚去世而需要他的服務。

我很快發現，那些愿意開口的人都是外國情報組也就是HVA的工作人員。他們在外國所做的間諜工作，其實就像其他國家的“正常”情報員會從事的工作，因此他們不太覺得或根本不覺得羞恥。例如，內線委員會的領導人沃爾夫岡•哈特曼有一天提議，在卡爾一馬克思大道旁邊的施特肯酒吧見面。那里離我與麗絲•菲爾比共同飲茶的地方不遠。當我抵達時，他告訴我那是所有間諜喜歡碰頭的地方之一。哈特曼酒不離手，講話相當輕率，他的工作是管理其他的情報員，經常用假身份出差至西德，與他小心翼翼稱之為“伙伴”的人見面。他的最佳“伙伴”，是波恩的一名資深政府官員。就是那種六八世代的人，你知道……

出這些秘密任務時，難道他不害怕隨時會被抓而長期被關在監獄中嗎？

第一次當然會害怕，但是久而久之就習慣了，他說。其實非常、非常容易。德國人在德國，很不容易被人察覺。而且他因為父母出生于曼海姆，因此原本口音就接近西德。

我發現他在態度上有一種淡淡哀愁，與西德社會民主黨人士的獨特風格幾乎完全一樣。是身份掩護還是他的真實面貌，或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身體健壯的克勞斯•艾克納為國家安全部的資深官員，專門主動從事反情報工作，如偵察另外一邊的間諜的工作，等等。而克雷奇將軍管理的主部門第二處，雖然同樣從事反情報工作，但是他的工作重心放在防御外國間諜進入東德刺探國內情報上。德國情報系統與英國有一點很不相同的地方，德文對上述兩項工作都有特定的詞匯：“反間諜”（Gegenspionage)指對外偵測，“間諜特工”(Spionageabwehr)指對內偵測。不過根據專家評估，兩者之間的工作重疊情形嚴重。

艾克納對西方情報工作有深人的研究。他說國安部已經完全滲透進入西德的外國情報組織之中：“我們知道所有他們知道我們的事情。”而他對英國秘密情報局（SIS,也就是俗稱的MI6)評價極高，認為他們的工作“品質極高”，功勞應該歸于少數“非常紳士”的情報員。他有一次有機會比對一名英國的SIS官員和同樣做他工作的東德情報員在從事同一項工作時的成績，發現雖然兩人同在外交官的身份掩護下工作，但是英國人所寫的報告竟然比東德的要好上一大截。英國人觀察敏銳，下筆微妙，有洞察力，對觀察對象有興趣，而東德的間諜則失落于共產主義思考的陳腔濫調中。不行，他無法告訴我如何取得那份英國報告的。

坐在他狹窄的高樓公寓中，前HVA頭目維爾納•格羅斯曼告訴我，他和他的同事如何在1989年底至1990年初，銷毀他們的檔案。當抗議者沖進國家安全部后，他們關閉大型碎紙機，改用小型的個人碎紙機，“就像那臺一般大小”，他隨手指著薄簾后的一臺機器說。碎紙機，小小的秘密吞噬者，靜靜地蹲坐在房間一角，就好像老兵在墻上掛著一把老來復槍一樣，隨時提醒著他過去那一段較歡樂的時光。

格羅斯曼是從馬可•沃爾夫手上接下工作的，而沃爾夫則是HVA,也就是所謂的啟蒙部的開山祖師，非常受敬重。他身材高挑，衣著整齊，外表非常體面。走在馬路上，沃爾夫宛如國王一般，抬頭挺胸，偶然尊貴而疏遠地與路人點頭為禮。當我們快要抵達東柏林的中心點，也就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銅像時——當時雖然還豎立于東德時代的原地，但是誰知道還能夠存在多久？我問他東西德在秘密情報搜集手法上有何不同。“我想，應該完全沒有。”他毫不猶疑地對我說。如果有的話，分別應該在于歐洲與其他地方之間的不同。不論東西歐，他說，到1980年代時，搜集情報的手法已經相當“文明”，相較之下，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拉丁美洲、以色列的摩薩德（Mossad）和其他國家的情報組織在中東地區，手段便顯得相當拙劣。

間諜工作有何貢獻？

幫助維持歐洲的和平。兩邊都知道自己無法在對方事前不知曉的情況下發動攻擊。尤其，間諜的存在，大大地降低了核戰爭的可能性。冷戰，他說，并不如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m)前幾天才對他說的，是一場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戰爭。他還記得在柏林危機與古巴危機時，整晚熬夜，嘗試“透過我們的資料來源”搜集情報。他當時衷心地覺得，戰爭隨時可能爆發。

沃爾夫的確如其他人所說的，英俊聰明、風趣智慧、文質彬彬、非常迷人。看到他以后，我不禁自問：為什么像這樣的一個人，會心甘情愿地待在國家安全部那個窟窿中，忍受那些不人流的人？這就好像希特勒的軍備部長施佩爾一樣。但是馬可•沃爾夫，就等于東德的施佩爾，仍然在等待著他的姬達-謝利尼[7](#__7)[1]出現。謝利尼逐漸地、痛苦地讓施佩爾體認到他必須為第三帝國的所有恐怖罪行，包括猶太人大屠殺，負起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沃爾夫至今還沒有承認，他必須為東德的國內鎮壓行為所造成的恐怖負起該負的責任。當然，比起大屠殺，東德鎮壓的恐怖罪行規模要小得多，但是他仍然告訴自己，那“不是好事”。

他號稱，他在管理屬下部門時，所用的手法和其他國安部部門大不相同。其他人大致也同意這種說法。但是，他說正如有人說德國是一個“利基社會”（niche society)[8](#__8" \o "3)[2]—般，HVA便是他在這個社會中的利基——好一個利基！事實上，他的工作與國內鎮壓體系完全密合為一體，兩者在無數的個案中合作無間——從我的檔案中便可充分證明這一點。他掛著“國家安全部次長”的官銜，從年頭到年尾，與梅爾克合作無間。

那些以偵察自己人為業的間諜開口談論自己工作的意愿，相較之下，比從事海外諜報工作的人要低得多。不過有少數幾個參與了施勒特爾神父的討論團體，例如前國安部最惡名昭彰的XX處柏林組組長庫爾特•蔡澤維斯，便是該團體的基本會員，定期參加聚會。他原來的工作為監視、控制柏林的異議分子、文化圈、教會和大學，而我當時就讀的柏林洪堡大學便在他的管轄范圍之內。他是最典型的政治秘密警察。所以，維爾納邀請蔡澤維斯到潘科教區與我們見面。

見面以后，我發現蔡澤維斯其實是個個子矮小、滿頭銀發的人，小小的藍灰色眼睛，配在紅通通的臉龐上。當天他穿著棕色的跑鞋、灰色的長褲，運動上衣上面大字寫著：“下一代”。他生于1937年，早年時，父親曾經參軍。母親雖然窮困，但是含辛茹苦——而且篤信共產主義。新政權成立后，他被送進了黨辦的寄宿學校。然后，在已當上黨書記的母親的建議下，他進人了國家安全部。接下來的三十年，在柏林參與國家安全工作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在矮小的身材下，蔡澤維斯散發出一種令人不可忽視的存在感。他說，在所謂的“紅色星期”中，他到柏林洪堡大學去做政治演講時，學生都說他比次長講得要好。如今，他最想要強調的，便是他自有一套高尚行為與道德標準。他熱愛家庭。他一直對妻子十分忠實，而她也對他很忠誠。他們一家人居住在國安部職員社區內，孩子的教養很好，除了美國人登陸月球的那一次以外，他們家從來都不看西方電視節目。

是的，他承認，國家安全部內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例如，梅爾克所喜愛的國安部“活力柏林”足球隊內便充滿了貪污腐敗之事。但是他與那些一點關系都沒有。“我很反對足球。”他認真地表態。而且，他部門里面的人一直在談論著，如何安排一次交通意外事故之類的事，“除掉”異議教士賴納•埃佩爾曼（Rainer Eppdmann)。但是，那類事他從不參與。還有一次，大伙兒在討論如何去找一個女孩子，設法將性病傳染給羅伯特•哈弗曼時，他也沒動任何聲色。

不，不，他絕對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但是，有一次——只有一次——他做了一件壞事。有一次他們潛入一個人的公寓，發現里面有很多，用他的話來說，“漂亮的模型小車”。（維爾納告訴我，所有東德人都隨西方語言，稱呼那種車為“火柴盒小汽車”，只有蔡澤維斯仍在自我檢查機制下，不愿意使用西方式語匯。）搜索小組的其他人也都在順手牽羊，他忍不住，便塞了兩個進口袋。事后，那件事被人發現，他必須自白。“我真是感到羞恥。”他說。

他離開以后，維爾納和我互望一眼，相對搖搖頭，然后便輕輕地笑了起來。因為，如果不如此，我們或許會哭出來。這個人，就坐在我們眼前的那一張椅子上，明明就是小官僚執行者的罪惡代表。然而，他卻是一個顧家好男人，自豪于自己的剛正不阿，忠誠不貳，中規中矩切被認為與“納粹主義”合作的“第二層次美德”（也是普魯士協會想要恢復的）。他甚至到今天還無法承認，他忠誠服務的機構結構性、系統性地做錯了事情，只會坐在那里懊惱曾經偷竊過一兩部火柴盒小汽車。

至于專門管理我個案的主部門第二處，我從專家口中得知，在1970至1980年代，從一個大約只有200人的小型反情報組織，一直成長，到1989年時，光在總部便有1400名專職工作人員。在我的檔案最后面出現的克雷奇將軍，從1976年便主持主部門第二處。他不但成了梅爾克的左右手，而且非常專業，無論在自己的職位或在辦公室政治上都相當無情。1987年，他成為國家安全部內所有“反情報”活動的總負責人后，更大力擴張自己部門的工作范圍，以將所有與西方維持均勢下所產生的新挑戰都包括進去，他們不但監視西方間諜，而且也監視一般西方外交官、西方記者、西方學者、西方藝術家，西方所有可能會顛覆共產主義制度的人。

不幸的是，第二組的前工作者特別不愿意開口。“反情報組織出來的人嘴巴尤其緊。”哈特曼先生抱歉地解釋道。內線委員會可以給我的幫助有限，我必須獨自在這方面奮斗。起初，我只找到一些參與了我的個案的工作者的姓、他們的位階、所屬的單位，如文特少尉為主管官員，黎瑟少校為科長，考爾富斯和弗里茨為處長，克雷奇將軍則為老板。然后，非常幫忙的高克機構替我找到了他們的人事資料卡，使得我所搜集到的名單不只有姓也有了名，而且我還知道了他們的出生日期，并看到一張舊式護照大小的照片。隨后，我更發現了他們的人事檔案，知道了他們詳細的家庭背景，進入機構工作的原委，職業記錄上的獎懲記錄，等等。逐漸地，像偵探一般，我在心中建立起他們的圖像，并開始在真實世界上追查他們。

我發現我自己從最高層著手。施勒特爾神父只打了一通電話，便找到了克雷奇將軍的地址。但是克雷奇據說很不愿意談話。他的地址在柏林外圍的一個破舊小鎮，正好是我原來的女朋友安德莉1980年時所居住的地方。他既沒有電話，也沒有其他聯絡方法，我決定跑一趟，一箭雙雕地同時去拜訪克雷奇和安德莉的舊居，看看她是否還居住在原地。

從柏林市區乘坐老式的地上有軌電車，一路搖搖晃晃，終于來到了一個塵灰飛揚、路面坑洞凹陷的小鎮，沿著小路，來到一戶木屋前，規模還不算小的花園，被鐵欄桿包圍住。我按電鈴，克雷奇太太出現于鐵門前。我說要找克雷奇先生，她很不情愿地讓我進去。

克雷奇（退休）將軍穿著園丁短褲，在花園中站了起來，手上還拿著一把耙子。我可以看得出來，他身材厚實，小腹非常突出，胡子修剪得很短，不夠掩飾那相當嚴重的雙層下巴。他的眼神中射出不安的光芒。

我自我介紹為牛津來的歷史學家，他的部門曾經針對我做過一份OPK檔案，我希望能與他討論一下那檔案的背景，包括檔案本身、他的工作、冷戰等等。

他遲疑了許久，然后同意兩天后與我晤談。

我轉身離去前，順便問他如何到達安德莉過去居住的地方。噢，那地方走路的話，還有相當一段路。我開車送你過去。

現在換我遲疑了，可是他說：“你知道，冷戰已經結束了，所以我還可以送你一程！”并開出了他的大眾小轎車，送了我一程。

安德莉搬了家，但是我還是設法在湖邊一棟破舊大別墅的頂樓上，找到了她。她就像我還記得的模樣，滿頭金發，滿臉笑容，但是她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在柏林墻后養育成長，現在都已快要脫離青少年階段了。事實上，她認為對一位單親母親而言，東柏林比西柏林更適合養育孩子。而且，她覺得1989年的政治改變來得正是時候，對她的兒女而言，時機相當好，使得他們在一個安全、有保障的環境中度過童年后，再嘗到自由的滋味。

我們小心翼翼但精神愉快地回憶遙遠的過去。“你還記得？”我告訴她有關我的檔案，以及第一次坐在高克機構舒爾茨女士的仿造木桌前時曾在剎那間懷疑她的事情。那天晚上在普倫茨勞貝格區，她拉開窗簾，打開電燈。

她有一點震驚。不至于懷疑她也是國安部的人吧？是的，她記得那天晚上。實際上，她并不覺得曾經拉開窗簾，不過的確開了燈。

為什么？

“因為我想要看你的臉。”

兩天后的一大早，我再度搭上有軌電車，去訪問克雷奇將軍。他穿著一套閃閃發光的人造纖維運動服，在門口迎接我。我們掀開彩色的珠簾，走進那到處都是小裝飾品的木屋中。有一面書架擺滿了各種各樣的烹飪書。

他想要從頭敘述他的故事，我沒有意見。在他十五歲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顯示他的年齡與“米夏拉”一樣），他的父親成為戰俘，無法回家。他經過基本的學校訓練，便到一家打鐵鋪當學徒。但是他一直渴望能夠冒險。他還記得看過西德一本叫《打鐵鋪》(The Ironmonger)的雜志，是別人偷偷走私進東德、暗中流傳在他們工廠內的。很偶然地，他獲知一個赴南非工作的機會，他想了很久，幾乎提出申請。從他的口氣中，我覺得他是想對我說：“要是當時申請就好了！”然后，他又想到加入海軍，不過他們——他們就是指共產黨——把他送進了國家安全部。

他是在波茨坦接受的諜報人員訓練。訓練課程中，他們告訴他，英國的情報系統多么歷史悠久，技巧多么高超，是帝國主義發展中的重要特質，而且被列寧形容為“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訓練結束后，他被分派到反情報組織中的“英國線”上工作。一名二十二歲、圖林根出生的前打鐵鋪的小助手，就此踏上了追求諜報神話之路！不久，他被轉至“美國線”上，然后，又被安置于負責西德的部門。在整個過程中，他一直覺得有幾分不敢置信的心情：小小的他，居然可以與曾擔任希特勒東部軍區情報頭子、而后又為美國效力、此時又在阿登納政府中負責同樣工作的格倫（Gehlen)將軍分庭抗禮。

不過，他在對抗格倫，尤其在抓雙重間諜上，相當成功。每次抓住情報員，他都喜歡在審訊室隔壁親自聽取偵訊的情形。他想要知道他們為什么要做情報員。

為什么？

有一部分人是為了錢，有一部分人是渴望冒險，然后還有他所謂的“意識形態”。“他們都說，為了自由而做。”

那些人下場如何？

噢，那當然是要在監獄中蹲很久了。

有被判死刑的嗎？

是的，那也有，尤其在早年。不過，那些人都知道自己所冒的

風險。

1976年，他成為整個主部門的領導人，得以緊密地與國家安全部合作，非常刺激的一段時間，盡管當時他遇上了一個大挫敗，一名叫施蒂勒的國安部間諜先替西方刺探情報，然后又叛逃至西方。但1980年代開始，他越來越覺得事情不對勁。原來，他總喜歡離開國家安全部，到外面的莫斯科餐廳好好吃一頓午餐。由于東柏林的餐廳很少，永遠擁擠，與人并桌是經常的事，然而，他發現旁邊坐著的是美國游客。他喜歡鼓勵他們說話，而他們卻沒有察覺到……

有時候，當他離開辦公室一會兒，國家安全部就會打電話來問他到哪里去了。有一次，大約在1980年代中期左右，他告訴梅爾克他去聽一個資深黨工的演講，了解目前政治發展情況及黨的路線等等。

“他有沒有告訴你，”梅爾克對他大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腐敗的國家？”

“沒有，”克雷奇回答，“他沒有說到這一點。”

“那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這個！”

在1980年代中，許多西方分析家、政治家、企業家都以為東德是蘇聯陣營中最穩定、繁榮的國家之際，秘密警察頭子卻告訴他的反情報工作領導人說，國家非常腐敗。顯然他們的情報比較正確。

當梅爾克說“腐敗”時，他指的是東德的現金債務已經到達異常嚴重的地步嗎？

是的，但這并非全部。政治上也出了問題。他們看到了東德總書記昂納克其實是在幻想，而且他們看到對西方開放和保存共產主義之間的矛盾。而克雷奇便在這段時間，每當《明鏡周刊》刊登出一些新的和東德相關的消息，或當有人跑進西方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的時候，便會接到梅爾克憤怒的電話。而他會告訴部長：你要我怎么預防這種事？我們已經簽了所有的國際協定，承諾要改進與西方的關系，改進西方記者的工作環境、行動的自由、并尊重他們的人權。不失為從顛覆的一面，對冷戰和緩的一個最有力禮贊。

在最后幾年中，他為工作極度憂心。1990年10月，他便可達到六十歲的退休年齡。但是，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一，而他們便不再需要他的服務了。

在克雷奇說完他的故事后，我問他們為什么會把我視為間諜？

嗯，其實很簡單，克雷奇說。就像他前面所說的，從第一天進人間諜學校開始，他們就知道英國秘密情報組織的恐怖與厲害。然后，從I960年代中期開始，他們便再也找不到英國間諜了。n/9組的官員大為恐慌。當然，他們知道英國大使館里面的SIS官員是誰，隨時監視他們，攝影記錄所有他們與異議分子之間的會晤情形。但是他們手下的情報員在哪里呢？

因此，每當他們看到一個有半點像的英國人出現時，就立刻開始偵察，他有無做間諜的可能？他們總是抱著希望，但是最后終究失望了。

是因為英國秘密情報組織太聰明了，還是根本就沒有任何情報員，以至于國安部連一個都沒有抓到？

應該是后者，克雷奇認為。

我告訴克雷奇，從他說話中，我幾乎忘記國安部是一個平常人聞之色變的組織。他難道從來沒有害怕過嗎？

“害怕！”他驚嘆道。兩手向空中一擲，便便大腹在滑稽氣氛中不由自主地抖動了起來。當然不會！一點也不怕。一般人從來不害怕，他們感到安全，感激還來不及呢！“從上到下的人都感謝我們。”而且他還刻意告訴我另外一件事：每年在他們部的周年慶祝會上第一個趕來道賀的，都是東德的傀儡基督教民主黨（兩德統一后并入赫爾穆特•科爾的全德意志基督教民主黨）。然而，基督教民主黨正是統一后第一個譴責國安部的黨派！事實上，國安部一直屬于執政黨之下。梅爾克對于這一點非常小心翼翼。他每一件事都向黨主席昂納克請示，而且所有的重要決定都要昂納克點頭以后才辦。

我問他，有沒有什么事讓他個人覺得很罪惡的。“不，”他說，“我做的是我分內的事。”那熟悉的自我辯護說辭：我不過是在做我分內的工作，完成我的責任，遵守我該遵守的命令。不，他不覺得有任何罪惡感，不過他對1980年代發生的事，對昂納克的傲慢、拙于改革，也并不持批判的態度。

“但是，如果報紙有任何可信度的話，這種情形在你的國家也是一樣的。你們對皇室多所批評，但是卻沒有勇氣去改變它！”

我從個人檔案中得知，格哈德•考爾富斯，1933年生于蘇臺德地區。在他六歲時，他的父親便去從軍，一直到1947年他十四歲時，才從戰俘營中被放出來。在戰爭期間，他居住在被德國人占領的蘇臺德，念的是納粹學校。戰爭結束后，他逃至蘇聯占領的區域，原先想找一份店員的工作，但通過自由德意志青年團，進人了國家安全部。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晉升為少校，成為Ⅱ/9(第二處第九組）的負責人。

在家庭生活中，檔案中記載：1971年，他的八歲女兒收到一份從西德寄來的包裹，里面有兩條巧克力，糖果、奶酪、白糖、茶葉、兒童牙刷、肥皂，都是緊急配給的東西，好像是要救濟一般！內部警鈴大響，國家安全部展開了一項正式調查。怎么會發生這種事？原來他們一家人至保加利亞度假時，他的女兒與一名西德的小女孩交上了朋友。“雖然考爾富斯少校同志盡力阻止他們交往，但是孩子故意到其他地方去洗澡，并且相會。其間，考爾富斯少校同志的女兒將家中地址給了對方。”結論：這線索很可能會被西方情報組織利用。如果包裹繼續寄達的話，應該先送至國家安全部接受檢查再送回。

根據檔案記錄，考爾富斯的舊地址在卡爾斯霍斯特，也就是紅軍總部的所在地。我找到了那條陳舊、晦暗的小街，和地址上的那棟顏色為暗棕紅的兩層樓連棟小屋——又見鐵欄桿、緊閉的花園大門和門鈴。門鈴下寫著一個名字：考爾富斯。我按下電鈴。房屋內的一片紗窗簾被掀開，顯露出一張臉孔，短暫地。是否就是檔案照片中的那張臉？他打開房屋門，但是站在臺階的頂端，離花園大門口還有20英尺之遙。是的，他就是考爾富斯。

“考爾富斯先生？”我提高聲調。

“是的。”

“我的名字為蒂莫西•加頓艾什。我在牛津教現代史，想要和你談談MfS的歷史。”我故意使用國家安全部的正式簡稱，而不是略帶貶義的“斯塔西”（Stasi)。

緩緩地，他走到大門前，但是仍然沒有開門。就像克雷奇一樣，他穿的是一套人造纖維的運動服。他的嘴角向下，顯得表情非常愁苦，而他的眼睛和照片如出一轍，充血得厲害。是因為喝酒過度嗎？

他有時間和我談談嗎？

“不，”內線委員會的人曾經接觸過他，但被他拒絕了。很多人都來找過他，包括西德的秘密組織，西德的外交情報組織，連他口中一個不知所云的FBIA,都來過了。他拒絕了所有的來人。一切都已寫在文件上了。

是的，我說，但是文件從來就無法記錄下所有的事情。與歷史的見證人談話，是理解當代歷史背景與動機中最寶貴的方法。（我的話一點也沒錯。不過，我說這話的另外一個目的，為繼續讓他開口，不讓這條線斷掉，難搞的人處理起來要格外小心。）我（帶一點冒險地）說，貴組有一份我的個人檔案，一份OPK。

我們展開了一點點辯論。

“啊他說，“進來吧，我們可以談十五分鐘。”大門“呀”的一聲開了。

他領著我到花園一張搖椅前。我聞到酒精、香煙、厭煩、空虛的味道。他毫無悔悟之意。在西方情報員、恐怖分子、挑撥分子、顛覆分子等作亂下，國家的生存受到威脅。國家安全部正如其名，賦予普通人安全感。在現今時代中，人人都缺乏安全感。他們渴望地懷念著過去的好日子，那段不必擔心犯罪、失業、毒品的日子。是的，有少數人因為政治理念不同而吃到苦頭。但是那是正常的。同樣的事也發生在西德。他們不是有一個詞來著？我提示：他是否指Berufsverbot(禁止擔任公職）？對，一點沒錯！就是這意思！

那么，你們的系統應該比較好才是了？

“啊，哈……唉！”他笑得極為苦澀。無論如何。大部分人感謝那份安全感，而且并不介意犧牲一點點的自由，以交換那份安全感。

在最后的那段日子，他是否覺得失望？不，他有一種沉靜而滿足的感覺。畢竟，這個國家已有所成就：在東德歷史中，每年的經濟都有所成長。西德就沒有這么幸運了。幾乎每年國內經濟都在萎縮。我溫和地表達了我的驚異。他解釋說，工人能分享到的成長在日益縮水。可是西德就整個國家而言卻日漸富裕，難道不是嗎？是的，他說，但是大部分人看到東西，卻買不起。

他是否到過任何西方國家？

嗯，在統一前自然沒有。統一以后，他曾經到過北海岸和西柏林。但是他一點也不覺得有什么了不起。有一次，他的孫女要求他替她買一個咕咕鐘。于是他便到西柏林的卡迪威大百貨公司。沒有一樣東西是普通人買得起的。而且，他們根本就沒有賣咕咕鐘。

不，他不喜歡到西柏林，尤其在終生因反對它而工作之后。不過，統一后不久，他有一次無法抗拒誘惑，偷偷地去參觀了一次過去只有在照片上看過的西方秘密情報組織總部，如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柏林-達勒姆區的“物件"（objects),等等。

他逐漸放松了下來。我覺得是開始談我檔案的好時機了。但是當我提到那題目，他立刻又把自己關閉起來。

不，他警告我，他不想談他的工作。

不，他不記得有一個什么文特少尉。

不，他不記得我的個案。

已經有許多“作戰個人管制”嗎？

嗯，不多，至少在他的組內不多，大概……

十五分鐘展延為五十分鐘。他的妻子從里面叫他。她想要用花園中的搖椅。她近來不怎么舒服，你知道的。

我們往生銹的大門走去。我問他，他的部門是否抓到過許多間諜？

當然，他說，每個都被送進監獄，一關就是很多年。不過，他不想談那些事。他要我了解的是，今天到處是犯罪、失業、不公的亂象是不應該的。民眾為此深感憤怒。

我準備離開。但是當他要轉身離開大門前，他提高聲調，對我說：“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告訴你，而且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要我們上街頭時，我們必定會去的。”英雄式的自我防御，但是多么地令人感傷！

花園搖椅不斷傳出“吱、嘎”的聲音。

弗里茨上校，從考爾富斯手上接下Ⅱ/9組的工作，并于1982年在我的檔案最后面簽名結案的人。和考爾富斯不同的是，弗里茨至今仍過著忙碌的生活。我找到他同在卡爾斯霍斯特但灑掃得整潔宜人的灰色連棟房屋。他的妻子告訴我，他每天清晨出門，不到深夜不會回家：“你知道，拉保險的人就是這樣的。”

我留下一張名片。她建議我晚上10點左右再打電話來。我按時打電話，并解釋說自己是歷史學家，正在研究國安部檔案。他說：“我好像有做過你的案子，是不是？”我告訴他有關我的檔案。經過一陣興奮的對話，他終于答應在早上7點半與我見面——“如果你覺得有任何用處的話。”他說。

根據服務記錄，弗里茨上校應該有六十五歲了。我期待像克雷奇或考爾富斯一樣，看到另外一個全身浮腫、動作緩慢的老人。但是當他以親切的笑容與我打招呼時，我在眼前看到的是一個五十來歲的人。沒有上油的頭發，黑色的牛仔褲、粉紅與灰色暗花的襯衫、相配的領帶，襯衫袖子整齊地挽至手肘附近，他看起來和西德任何一名保險員沒有兩樣。這算什么，偽裝？制服？還是他的最新身份？

我感謝他在繁忙中抽空與我見面。的確，他是在抽空，因為他在時間安排上從來沒有這么緊湊過。

比在國家安全部時還糟糕？

“不。你知道那種工作的性質，需要晚上和情報員見面，等等……”他很期待地看著我。

“你知道那種工作的性質”……是什么意思？

從桌上拿起我的名片，他微笑地看著，說：“掩護是形形色色的，對不對？就好像‘現代史’也是一種。歷史學家或SIS，對我而言都是一樣的。已經有好幾個來過了。我是百無禁忌的。”

我向他保證，我是一名如假包換的歷史學家。他似乎有一點失望。或許，他原本期待要與一名前工作勁敵比對筆記。或許他不相信我。但是無論如何，他已做好了開口的準備。

一開始的時候，是打仗。戰爭，和考爾富斯、克雷奇一樣，對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的長兄在戰爭中陣亡。

“你的父親呢？”

“我從沒見過我父親。我是人家說的那種私生子。”他繼續保持微笑，但是我從他刻意的聲調感覺到張力，以及那份歷久彌新的痛苦。

在1950年代初時，他在什未林地方政府的財政部門做事，正準備申請進入共產黨。這時候國家安全部派來一名男子，他覺得維護東德的安全是一項“光榮”的職務，因為有大量的外國間諜正設法滲透進入東德，危害到他們的國家安全。

“你必須要知道當時的情況。那正是‘垃圾桶小子’（wastebinkid)的時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只要付一點小錢，就可以雇用一些年輕人，到這里卡爾斯霍斯特的紅軍總部前，搜索我們的垃圾桶了。”他們大部分都被抓了起來。

但那也是充滿了活力的年代。他覺得他做的工作很重要。在1950年代，大眾都支持他們的工作。他們甚至到工廠之類的地方解釋自己的工作內容，而民眾聽了以后都會為他們拍手。（難道到現在他都還不明白，或許民眾是出于恐懼才拍手的嗎？）

但是從1970年代以來，事情就越來越糟。國家安全部里越來越沒有理想，大家只是為了保有一份工作而工作。

年輕的文特少尉就屬于這種人嗎？

他不知道。文特少尉相當沉默寡言。

那么黎瑟少校呢？

“我想他和我一樣，心存誠信。”

當時海外也感覺到東德內部出了問題。私下，他和他的同僚認為主要的問題出在兩個地方：汽車和旅行。汽車問題在于，東德就是無法生產像樣的車子，一般民眾只能買像老鼠洞一般的“拖拉笨”或瓦特堡小汽車，而且還要等上十年的時間才能排隊買到。旅行問題在于大部分的民眾除了到蘇聯陣營的一小部分國家以外，哪里都不準去旅行。

他們曾經討論過有關自由的問題？

“不！”他略微停頓，以便思考。“不過旅行的問題和它稍有關系。”

而且，他們覺得被要求做的事中不可能做到的越來越多。我告訴他HVA的艾克納上校曾經告訴我：“我們先有一個國家。然后又有了一個黨，想要讓國家順利運作。然后我們又有了一個國家安全部，想要讓黨和國家都順利運作。結果，兩個都無法運作！”

“大致不錯。”弗里茨說。

他的人有時候甚至必須到體育場站足球賽的崗。簡直荒唐。他們真正的工作是監視西方間諜，雖然后來他們更集中偵察可以“從正式職務上顛覆”的人：外交官、記者、訪問學者等等。他的部門負責范圍包括所有西歐人士，每年大約有三十個人在他們的控管之下。

他們最后是否真的抓到間諜過？

是的，抓到過幾個。西方人通常關上一兩個月，然后便遞解出境；情形比較嚴重的，或許會審判、定罪，但是最后還是被驅逐出境。如果抓到的是東德人，那么被判重刑是在所難免的。

在他工作期間，雖然工作重點在英國、法國，但是這方面運氣可不好。有一次，他們幾乎成功，盯上一名女性外交官，用“B手段”（所謂“B手段”是指用竊聽器監聽，相對于“A手段”切人電話線的錄音竊聽）發現她有婚外情。

他們自然利用這份情報，設法使她提供情報。她是已婚女子，你知道。

“你的意思是說，你們勒索她？”

“是的，所有情報組織都一樣。”但是那一次沒能成功，因為她的婚外情對象是名英國人，不久后便回國了。然后，帶著幾分輕蔑的語氣，他問道：“你該不會就是那家伙吧？”

“不。”（是不是都不干你的事。）我從他臉上那不正經的笑容，感覺到他很懷念工作的附屬部分：竊聽、理解私人生活中的末枝細節，以及他們在那外交官女性身上玩的那一套功夫。我想時至今日，他大概只能夠從電視和報紙狗仔隊的新聞中滿足他的窺伺欲了。西方定義下的窺伺狂，被定位在一個高高在上的“國家安全”、“公眾利益”目的上而正當化了。

他回到他最喜歡的主題上：他是如何的努力工作。想當年，每天7點15分左右，最遲不超過7點半，他就在辦公桌前坐好，開始辦公了。7點45分，他就必須向克雷奇將軍報告。然后，他要讀很多檔案，同時討論當下正在發生的個案，做出行動計劃，和其他部門協調，做觀察報告，替部分報告做出結論，尋找新的線民，檢查現有線民的行為。部門主管有一個特別的餐廳，在國家安全部中央稍高的一個樓層中，可供午餐。其他同事稱之為“帝王山（Monarch’s hill)。午餐后，他繼續工作，以及與線民開會等等，一直到天黑為止。一天下來，大約要工作十二小時，周末時還必須加班。

他與同事間是否有社交活動？

每年的圣誕節或新年時，辦公室都會舉辦一個宴會之類的，“到個什么地方，你知道的，”他說，例如，有一次，他們到萬德利茨開了一個舞會，“桌子擺得很漂亮，有吃喝不完的食物和酒水飲料，大家都在跳舞，氣氛很好。”除此之外，他們沒有時間互相交際。

現在他還是一樣，必須辛苦工作，因為你不能指望像以前當官時一樣得到退休金，他說。他們拿到的不是全額，而只是以東德平均薪資為基準的七折薪。太不公平了，他說，違反了法律背后的公平原則。就在談話時，一直在打掃房間的妻子突然大吼起來：“現在說這些沒用！”然后她摔門而出，震得門把手都掉了下來（我從個人檔案中得知，弗里茨的妻子和三個女兒都曾為國安部工作）。

現在，弗里茨和過去一樣從事“社會安全”（保險）工作。過去的東德，社會安全是一大優勢。如今，整個東德充斥著不安全感，到處是犯罪和失業的人群。如果一個人有自由卻沒錢享受，那自由又有何用呢？弗里茨對客戶的困難感同身受——他們無法得到國家的庇護，迫切需要一份私人保險，但常常繳不起保費。

從國安部到私人保險業，阿爾弗雷德•弗里茨仿佛東德社會轉型的縮影——昨天是披著灰色制服的安全部軍官，今天是身著黑色牛仔褲的保險推銷員。但是，弗里茨還是過去的弗里茨。

黎瑟少校搬到德累斯頓。我從當地居民登記處拿到他的住址——在德國，你只要問一下，幾乎任何人的住址你都能拿到。

我到了那兒，他不在家。我邊等待邊張望，看見不遠處有個神殿般的建筑，上面寫著幾個大字：“德國衛生展覽館”。館內，“藥品和救護”處設置了幾個特別展區，還有一個名為“消化”的常駐展區。常駐展區內的上方掛著發光的塑料內臟模型：胃、膽管、上結腸、下結腸、直腸——每個模型發出不同顏色的光。我詢問站在柜臺后的一位白發女士，到“玻璃牛”該往哪里走——玻璃牛是一個跟真牛同樣大小的透明模型，從外面看，骨頭、內臟、牛腦、神經，一清二楚——她說：“穿過‘藥品和救護’處，走到‘消化’區，右手邊就是玻璃牛。”

展覽館里最有名的展區不是“玻璃牛”，而是“玻璃人”。這是個站立著的女人模型，手臂搭在一張桌臺上。臺上安置著不同內臟名稱的按鈕：肝、心、腎，等等。每按下一個鈕，相應的內臟模型就會發光。館員告訴我，原來那個模型已經相當舊了，這是個新模型。這個新模型是在德國統一后換的。

“‘她’的外貌看起來不錯吧？‘她’的內部與舊模型完全一樣。”館員說。

那天晚上，我通過電話聯系上了黎瑟。他說可以和我談談，并且很愿意“客觀”地描述安全部的工作。他帶有濃厚的薩克森口音，語氣平和友好，與一般的薩克森人沒什么兩樣。

當時天時已晚，我問他：“我們能不能現在就見個面？我希望今晚就返回柏林。”他答道，不能，現在見面辦不到，他要等妻子回家，我和他可以明天早餐時會面，時間定在八點。他還問我，能否把見面地點定在我下榻酒店的休息廳里。我同意了。當晚我就在酒店訂了房間，不過我很懷疑他究竟會不會遵守諾言？他的妻子會不會勸說他不來見我？

同時，我開始研究起他的人事卡和檔案影印本：克勞斯•黎瑟，1938年出生于德累斯頓附近，父親1944年在前線陣亡（又是一個童年失去父親的人）。一份安全部內部問卷曾詢問黎瑟是否去過東德以外的地方，他回答：1954年他和一位朋友在西柏林逛了一個半小時商鋪。1975年，他從德累斯頓搬到柏林，供職于II/9組。1978年至1983年，出任A部門頭頭（該部門負責監視英國人）。愛好釣魚。

從個人檔案照片上看，黎瑟面貌丑陋，令人生厭。不過第二天，當我看見他等候在休息廳時，他卻顯現出坦率輕松的面容，眼眸清澈透亮。他身著白襯衫和褐色夾克，系著白領帶，腳蹬便鞋，衣著整潔，開場白與過去的同事如出一轍：“我想讓這個世界更美好。”但沒過多久他的話便偏離了那一套。制度有問題，他說，因為它違反了人性，一個人的天性無法轉換或轉變，所以這個制度注定會出問題。共產主義無法容忍“內心的丑惡”，只有人人都是天使，共產主義的美好愿景才會實現。這番判斷簡單卻不淺陋，對共產主義的基本缺陷一語中的。

當然，1945年時黎瑟還不清楚這一點。那時候他已經家破人亡——父親在一次軍事行動中喪命，哥哥被坦克活活軋死（此事引發了全村人的反坦克自衛行動），他的母親是個農民，親眼看到兒子腦袋被坦克履帶壓碎，全家人的房子被炸毀，所有財產付之一炬。那一年的4月到10月，黎瑟連雙鞋子都沒有。用他的話說，全家一貧如洗。但是，在母親的養育下，他活了下來。可以說，黎瑟能長大成人，首先得益于母親的照料，其次是東德政府的培養。念小學時，他因成績優異獲得政府頒發的全額獎學金，后來進入一所寄宿學校繼續學業。政府幫助了黎瑟，但是，節衣縮食給他買書，為他添置衣物，養育他成人的，卻是母親。一想到此，黎瑟心情激動，聲音哽咽。

十八歲那年，黎瑟不得不忍痛割愛——他熱愛自然，愛好漁業，渴望到大學里攻讀漁業學，但國安部的人卻對他另有安排。他們對黎瑟說：“國家幫了你那么多，你也該做點事報效國家。”后來，黎瑟加入了國安部，在當地小鎮皮爾納工作，后來輾轉至德累斯頓、柏林，但工作核心仍舊是反間諜。

回首過往，黎瑟坦承自己經歷過政治上的幻滅。在集體農場，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告訴他真實的世界究竟怎樣。黎瑟驚訝于媒體在報道五年生產計劃上的嚴重失實，目睹了理論、實踐、當權者偽善之間的矛盾。他援引海涅的話說，這些當權者表面上勸大家喝水，背地里卻肆飲著葡萄酒。突然，黎瑟想起了什么事，他停頓了一下，搖搖頭，“有件事情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別人……”

那時黎瑟在德累斯頓工作。在一堂訓練課上，教官朗讀了一位女士寫給丈夫（好像是男朋友，他也記不清了）的信。這封信寫得很好，情真意切，感人肺腑。這時黎瑟哽咽起來：“我永遠也忘不了。”

為什么教官要給黎瑟他們念這封信呢？我心想。

“那個男的是線民。”黎瑟解釋道。

很明顯，那位女士好像知道了什么，但她依然愛著這個男人。這個男人上面的秘密警察很好地控制了這個線民，而后者成功地讓這位女士保持了對他的信任。

教官對黎瑟和其他國安部軍官說，你們應該向那個秘密警察看齊。可是黎瑟并不這樣想。

黎瑟盡忠職守，疑惑卻與日俱增。或者說，他現在已經對這一工作進行了徹底的反思。

對黎瑟來說，國安部的工作猶如漫漫長夜，各種稀奇古怪的限制層出不窮。比如，未經國安部批準不能結婚；如果妻子的父親(甚至叔叔）加入過黨衛軍，要么放棄妻子要么放棄工作。未經允許不能買房，不能出游，甚至連胡子都不能蓄！

這時我想起了克雷奇將軍，在人事卡照片上，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凈凈，而現在，他蓄起了胡子。

黎瑟想過脫離國安部。“但我沒有勇氣。”他說。他沒有換過工作，害怕遭到報復。1989年，他申請以所謂的“特派員”身份返回德累斯頓。當時，國安部會遣散部分秘密警察，讓他們以不同的身份從事普通的民事工作，那時候各種身份層出不窮，“特派員”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沒有東德人所謂的大轉變[9](#__9)[3]沒有東德政權的垮臺，說不定黎瑟今天就是這家酒店的“特派員”。

返回德累斯頓后，黎瑟在當地一家國有銀行謀得一份保安工作。過了一年，西德的德意志銀行（該銀行如今已轉行向餐館推銷通風設備）接管了這家國企，辭退了黎瑟。“那時候很多西德公司都來找我們，”他說，“他們知道我們能干、肯吃苦。”但是，這是一個殘酷的新時代——金錢決定一切，“人們都踩著別人的尸體往上爬。”在東德，處處是失意的人群。“我住的這棟公寓就有不少人跳樓自殺。”在他看來，現行的西方制度并不是罪魁禍首，但他也不清楚這一切究竟緣何而起。

后來，他的名字出現在媒體刊登的秘密警察名單中，他的妻子差點丟了工作。接著，有關國安部的聳人聽聞的真相在媒體上曝光，關于刑訊室的報道也見諸報端（比如，受刑人會被迫站在已經淹沒了脖子的水中）。連他的好朋友也開始懷疑他。黎瑟稱，國安部確實干了很多壞事，但責任在XX組，與他所在的組無關。

和我談話的人都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為政府工作的人說：“責任不在我們，在政黨。”為政黨賣命的人說：“問題不在我們，在國安部。”談到國安部，刺探國外情報的人說：“責任不在我們，在他人。”跟他們談，他們又說：“責任不在我們組，責任在XX組。”而跟XX組的蔡澤維斯談，他卻說：“與我無關。”

想當初，共產分子攫取中歐各國政權時，提出“薩拉米香腸策略”（salami tactics),提出要像切香腸一樣將民主派一片片切掉。現在，共產主義垮臺了，他們又玩起了逃避的香腸策略。

黎瑟的經歷從側面詮釋了我自身案例的一些細節。他說，《刑法》條款只是形式，可一旦起訴，國安部律師非常謹慎，他們堅持，在法庭上呈送的證據必須站得住腳。開篇報告中的意識形態評估非常重要，即你是不是資產階級自由派。這也意味著我介于兩個極端之間：既非“先進”也不“反動”。這兩個類別至關重要。

東德秘密警察如何按照行動計劃向克格勃咨詢呢？據黎瑟說，他們會將備忘錄送到卡爾肖斯特（Karlshorst)，在那里，他們的“朋友”會與他們對坐長談。同樣，那些“朋友”也會稱他們為“朋友”。沒錯，在文件里寫下“向朋友咨詢”，哪怕只寫這幾個字，也是很平常的。不過所謂的“朋友”并非真正友好。黎瑟說：“在克格勃眼里，我們無足輕重”，往好了說，克格勃當國安部是伙伴，往壞了說，國安部不過是被占領國的代表。

負責監視波蘭團結工會的工作組呢？沒錯，黎瑟沒有忘記，他甚至打算單獨去波蘭，盡管他根本不樂意。但是，他并不認為這個工作組很有效率。

此外，黎瑟還證實了早期觀察報告（也就是我還沒有搬到東柏林之前的那段時期）所描述的事情：國安部在腓特烈大街的邊界橫道上安排了大批秘密警察，隨時逮捕、跟蹤任何可疑或他們感興趣的人。

整個II/9組有二十到三十個秘密警察。黎瑟所在的A部門負責英國情治，有五人。每年他們只進行五到十個“個人控制作業”(OPK)，最多有兩到三個“全面控制作業”（OV)，因此監視者與被監視者的人數比例為1:3,有時甚至可能為1:2。跟蹤這么少的人，這些秘密警察究竟該怎么打發一周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呢？他們一天到晚干嗎啊？

“問得好。”黎瑟說，因為他覺得這個問題很難答。當然，他們會把很多時間花在碰頭會上。我也看到，文件中有關“個人控制作業”和“全面控制作業”方面的記錄非常詳細。對他們來說，操控和招募線民占用了大量時間。

我問他（問題和其他人一樣）：你們是否抓到過間諜？黎瑟說沒有，至少他那會兒沒有。“阿爾弗雷德•弗里茨，”黎瑟就像念索引卡片一樣，“好像曾經告訴我他們組差點說服一個女外交官叛逃。”

通過竊聽器獲知一位女士的私生活細節，借此威逼利誘，黎瑟不反感嗎？我心想。

沒錯，他反感，但是“每個情報機構都會這樣做”——黎瑟的說辭與弗里茨如出一轍。

隨后我轉移話題，提到他們這一代都是戰后出生，普遍胸懷理想。我問他同儕中是否有與眾不同的人，比如文特少尉？

“哦，文特啊。”黎瑟笑起來。他稱贊文特勤奮、仔細、口才好，擅長文案工作，但又說文特對收納新成員并不在行，因為文特過于謹慎，“不善與人接觸”。

我說我多少也感受到了，因為文特是最不愿意見我的人。

“嗯，他就那樣！可能是他妻子不愿意吧。我妻子也不愿意。昨天晚上她回家后還訓了我一頓呢，說‘跟他談？瘋了！別去！’”

他妻子說的對嗎？我覺得不對。通過談話我了解了黎瑟。他聰明睿智、謙遜有禮，雖然效力于東德政府，從事邪惡工作，但想想他的童年遭遇，一切都合情合理。他沒有勇氣脫離國安部，但他認識到了錯誤。談話結束，我與他道別，希望他將來順利，隨后我返回酒店房間，整理晤談紀要，腦子里只有一句話：黎瑟是真正的好人！他沒有人格分裂，他的正派沒有只體現在個人生活上，他不是納粹集中營的看守——白天殺人如麻，晚上卻能心安理得地回家欣賞巴赫的音樂，與孩子共享天倫之樂。他的人格也不是比蔡澤維斯更好而已。我是說，他的確是個善良的人，他并沒有因為進入國安部而良心泯滅。

我只見過現在的黎瑟，從未見過那個穿著國安部制服、渾身散發恐怖氣息的黎瑟。或許他過去的臉真的如人事卡上的照片那樣丑陋。他完全有可能做過或參與過很多事情。他對恐怖的事情卻閉口不言——我猜他要么有意忽略，要么忘了。假如我是國安部的受害者，甚至是直接受害者，我現在的想法或許完全不同。但是除非有其他證據，否則我的想法不會改變。

海因茨•約阿希姆•文特，1952年8月16日出生在巴德克萊嫩（Bad Kleinen)—個村莊里。尚在襁褓時，全家就遷到波羅的海港口城市維斯瑪（Wismar),父母在當地一家國有漁業公司工作。早在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初級學校就讀時，文特就展示出他在體育方面的天賦異稟。十三歲他進人羅斯托克一所以培養體育特長生為目的的寄宿學校。當時，東德為支持奧運金牌戰略建立了一個高度嚴密的運動員培養體系，這個體系為東德在奧運會上贏得多枚金牌立下汗馬功勞，而這種寄宿學校便是這一體系的組成部分。不過，文特十五歲時就“因為一次訓練時嚴重受傷”，而被迫轉到當地一所普通的走讀學校，這些在他的書面簡歷上都有記載^1969年他成為班上的自由德國青年團主任。

那年春天，他以“社會安全合作者”的身份被招進國安部。隨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起草、簽署了一份簡短聲明，承諾“為國安部盡心竭力”，肯定自己已經接受教導，永遠不和任何人談及自己與國安部的關系。此時他年僅十六歲。

時隔兩年，文特跨過合法年齡，國安部提議改造他為線民。提議書分五頁，開篇即對文特的個人背景與國安部生涯進行評估：“他(文特）曾針對不同問題和人提出書面報告，準時出席各種預定碰頭會。”對國安部來說，文特的優勢在于年輕，可以和其他年輕人在空閑時打成一片。

至于招募面試，國安部軍官打算告訴他“敵對勢力運用各種政治意識形態手段影響青年人”，他們說國安部有心阻止但能力有限,而按照東德憲法，每個東德公民都有責任保衛國家，因此國安部需要他的幫助。他們認為，只要文特同意，他的代號就是：“迪特爾•費舍爾”。面試時間定在1971年2月23日19點，地點設在國安部安排的地方，“主樓"（Chef)。

文件上有一份文特手寫的保證書，上面寫著：“我不會和任何人談及我與國安部的合作，包括我最親的親人。”

文特的線民文件包含一些有關他老師和同學的報告，但是一年半后這份報告就沒了下文。那時他年滿十九，需要履行義務在國安部服役至少十年，否則就得在一般軍事機構服役。在這份四頁的保證書中文特字跡工整地寫道：“凡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社會主義陣營為敵的人，我都會堅定不移地與之斗爭到底。”他發誓“遵守社會主義道德規范”，時刻留意“帝國主義間諜特工的犯罪手法”。他承諾自己和親屬絕不會到西柏林、西德或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絕不和這些地方的人有任何聯系。

這些事發生在1971年。1973年n月的評估報告寫道：“他（文特）開放、誠實，過去很容易受到別人影響，經過幾次討論后他已經把性格中的這一缺點掩蓋起來了。”但只是掩蓋而已，就像德國衛生陳列館的玻璃人：關閉一個按鈕，相應的內臟就會停止發光，但里面的內臟結構并沒有變化。

此后，文特仕途一帆風順。1974年，他搬到柏林，加入擴大的II/9組，在負責英國情治的A部門從事文案工作。國安部批準他結婚，盡管存在某些條件限制（國安部將這些條件認定為值得保護的利益）。1984年他代替黎瑟接管A部，1986年被提拔為II/9組副組長，當年取得國安部“大學”，即波茨坦司法高等學校學位。從畢業成績上看，他的“馬列哲學”、“科學共產主義”、“刑偵策略”、“帝國主義媒體政策”都是“優秀”，而“國際法律關系”只是“良好”。

畢業后，他的薪水和職務穩步上升——從中士一路提升至少尉、中尉，直至高級中尉、上尉。1989年3月的評估報告對他贊譽有加，盡管報告也提到，對東德的各種限制、高層領導有限的施政空間，他需要多一些理解。那時他正領導政黨宣傳組，閑暇時讀讀政治、文學讀物，參與各種體育文化活動。1989年4月，國安部提議晉升他為少校，正式任期定在1989年10月7日，即東德建國四十周年日。對一個年僅三十七歲的少校來說，這件事值得慶賀。可沒過幾周，整個國家便土崩瓦解，這中間的落差實在太大了！

文特是最神秘的人。起初內線委員會告訴我他已經過世，隨后高克機構找到一個叫文特的人，但并不是他。后來，他們查找文件，得知文特的第一個名字是海因茨一約阿希姆，于是我著手查詢柏林的黃頁。姓文特的人整整兩頁，可沒有一個叫海因茨一約阿希姆•文特的，就連電話號碼咨詢臺也找不到。按照人事卡上的地址,我驅車前往東柏林的偏僻地區霍恩斯豪森，那里曾住著很多秘密警察。我發現了一座曾被國安部作為秘密警察居所的普通公寓，現在，這座公寓用來安置到德國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士。

內線委員會經過進一步調查認為，文特很可能遷回了他在維斯瑪的家。于是，我馬不停蹄地驅車前往那座港口城市（中途欣賞哥特式紅磚建筑時停留了一下）。后來，我發現他的父母住在一棟新建的公寓樓里。我找到公寓樓，通過樓宇對講機請求與文特見面，他的母親得知我的來意后，立即顯露出警惕的口氣。在我爬樓的時候，他的母親給他打了電話。走到門口，我見到一個滿口粗話、臉紅脖子粗的女人在門口攔住我，說文特不想與我談話——“文特沒興趣跟你談。”透過一扇半開半掩的門，我瞥見屋子里還有一個老人憤怒地盯著我。在我駕車返回柏林時，我體會到，兒子走向人生歧路是父母心中的傷疤，而我剛剛揭開了這層傷疤。

我寫信給文特的父母，為我的唐突道歉，信中夾帶了一封解釋信，說明我想與文特對話的原因。文特后來回信，信封上寫著他父母的住址。信中他彬彬有禮，措辭卻非常小心。

文特寫道：“我當然記得你和你發表的文章，我那時還想，你總有一天會轉到這個話題上。”但他隨即表示自己愛莫能助。按照信中的說法，他不愿幫我的原因純粹是因為他想保留隱私，而不是出于政治考慮或職業操守。他說哪怕他不和我談話，我也能“合理客觀”地評價事實。他還說：“不同的階段會帶來不同的認識。至少今天我從不同的視角看到了很多事，而十五年前，或者說在1989至1990年的大轉折時期，這是根本辦不到的。”文特請求我尊重他的想法，他還突然以秘密警察的慣用語氣，勸我打消聯系他的念頭。最后，他祝我能在國安部研究上大獲成功。

接著我從維斯瑪和柏林的居民登記處，得到一份電腦打印稿，上面寫著文特在柏林的地址。我再次寫信，請他至少解釋一下回信中的幾句話，比如“今天我從不同的視角看到了很多事”。信中我重復了我在上一封信里所說的話——如果他不愿和我見面，我就只能以手頭文件為基礎來描述他的工作，“歷史學家永遠不會滿意，因為文件只能揭露部分真相。要想還原歷史，當事人的觀點不可或缺，”我寫道，“同樣，出于慎重，我問你，用你的名字是否會影響你、你的家庭以及你們的工作？是不是我現在還無法預見這一切？”（這些話用德語表達出來似乎少了些不合適的味道。）

我知道他和妻子在工作上的難處，考慮到了他尚在讀書的孩子(如果他有孩子的話）跟朋友或朋友父母相處時的尷尬。我曾經與東德的朋友討論是否應該在書中隱去前國安部軍官的名字，但他們普遍不同意。隱去克雷奇將軍的名字無疑是荒謬的，因為他是國安部的高層之一，而考爾富斯、弗里茨、黎瑟都是高級軍官，他們官至上校，如今，他們不是退休就是即將退休，他們的孩子也都長大成人，他們三人跟我談話時都沒有要求隱去姓名。但文特才四十五歲，職業生涯只走了一半。如果同事或上司讀到本書，他或他妻子可能會在工作上遇到麻煩——就像黎瑟的名字見諸報端，他的妻子就差點丟了工作。最重要的是，文特的孩子可能還很小，一旦曝光，孩子可能會受到旁人的恥笑。當然，具體后果我不清楚。雖然較之于上世紀90年代初，如今的東德人對國安部不再那么偏激，了解也更多，但我必須對他有所體諒。

時隔三周，我給他去信，詢問他是否收到我的來信。他回信說：“為了不失禮數，我在此確認，我收到了你在9月10日和26日寫給我的信。”他重申：“無論怎樣，我都不會幫助你。你和我過去的同事談過，你也很難碰到我這種情況，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為這件事惱火。”他希望我能接受這一最終答復，徹底打消聯系他的念頭。他最后說：“就現在來看，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因為個人、家庭或工作的原因，擔心你在書中寫下我的姓名。你還是繼續按你的方向研究吧。”我回復說，我十分遺憾，但尊重他的決定，并且答應本書出版后寄給他一本。

我確實覺得遺憾，不僅因為他與我的研究密切相關，更因為1981年至1982年的很多時間里，他透過線民監視我（如果黎瑟對秘密警察和被監視者的人數比例沒有記錯的話）。我覺得遺憾，還因為他與他的那些前輩有所不同。后者的職業生涯帶有濃厚的戰爭色彩，戰爭在他們的生活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文特和我處于同一時代，只比我大三歲。和我一樣，他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因冷戰而分裂的歐洲，不同的是，他對除東德和社會主義制度以外的事物一無所知。關于他的檔案，枯燥無味，充滿官僚氣息，對他是如何踏上秘密警察道路的描述清晰明了，但如果他能當面和我對談，也許他能告訴我更多的事情。或許他在讀完本書后會改變想法，又或許依舊固執己見。

# 第十二章 冷戰終結

國安部不但在1989年底前一直禁止我入境，而且還將我的詳細個人資料放進了“敵人資料統一登記系統”中。這個系統一般取俄文的字頭簡寫，而稱之為SOUD，最早是前蘇聯總理安德羅波夫在擔任KGB頭目時所設計出來的。這個巨細靡遺的系統的總管理處設在莫斯科，負責交換所有蘇聯陣營內國家情報系統內的敵情資料。此一系統將敵人，從敵方情報人員開始，至少分成十五類，包括了“顛覆組織”、“政治思想偏離中心”、“挑撥分子”、“禁止人境及不受歡迎分子”、“敵對外交官”、“敵對記者”、恐怖分子、走私分子等等。

我被歸到第五類：“為敵對情報組織、異議政治思想組織、反猶太主義、態度敵對之移民分子、宗教及其他組織，執行反社會主義國家顛覆活動之個人”。我進行顛覆活動時服務的“異議政治思想組織”為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

根據高克機構所做的一項研究，國安部為這個登記系統中最大的資料輸人來源，而在國安部中，第二處又提供了最多的名單。在“恐怖分子”分類下，一共有132名紅軍派分子的名字，還有9個東德允予政治庇護的人：是敵人，但也是客人。另外還有97名維京青年分子被列人了“恐怖分子名單”中，他們便是曾在西柏林攻擊我的新納粹團體。高克機構的專家指出，SOUD的資料現在仍然在俄羅斯情報組織的掌握之中——這想法不禁令人略感沮喪。不過，專家也認為即使在當初，那個系統的效率也很有限，尤其因為蘇聯從來不將自己的資料與其他國家分享。

我的資料雖然被放進了SOUD系統中，但是我仍然能夠自由出人蘇聯陣營的國家之中，例如，我曾正式以記者的身份訪問過俄羅斯和匈牙利。波蘭政府從1983年春以后便不再限制我人境，允許我追隨教宗至波蘭，訪問他的出生地，并觀察教宗這位偉大的行動家熱誠鼓勵他的國人要“保持希望”。“雖然，波蘭在外表上仍保持著極權共產主義的體制，但是已經從內部瓦解了。”我曾經這么寫過。難怪每次要進人波蘭前，我都必須到波蘭大使館，使用各種非常手段，才能拿到簽證。但是，我仍然盡可能地經常前往。

至于捷克，我則以游客的身份前往。在飛往布拉格前，我會非常小心地將所有要去訪問的人名、地名，都用最小的字體，以鉛筆輕輕地寫在歐元旅行支票的背面。到了以后，我絕不打電話給異議分子朋友，而會在確定沒有人跟蹤后，直接到他家去按鈴。我曾經為了躲避警察，匍匐爬過詩人哈維爾的鄉村居所外的小樹林。我發稿時，若不是以“特約記者”之名，就是捏造一個“馬克•布蘭登貝格”的筆名。

另外，我會為在這幾個國家中陷人苦戰的異議分子，攜帶他們在西方國家中的友人以及一個小型福利組織所托帶的金錢、書本和訊息。這個我在其中相當活躍的組織，有一個相當無毒無色的名字,波蘭雅蓋隆信托基金會，專門支援中歐和東歐的地下出版者及地下新聞從業人員。我當然不會是唯一從事這類工作的人。雖然到1989年為止，它都屬于少數分子的活動，但是政治光譜中幾乎從左到右都有人參與，例如從新保守主義者羅杰•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是雅蓋隆信托基金會的精神號召者），到終生不悔其志的自由派人士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中東歐出版計劃負責人），到新托洛茨基派分子的奧利佛•麥克唐納（Oliver Macdonald，《東歐勞工焦點》雜志的主編），就像在戰爭時期一樣，我們在一個共同的目標號召下團結為一體。

回顧當時的日記，我發現有一些記事我故意寫成令人無法辨識的簡筆，如：“貴族邀請KB和EK?”“A.M.有ZL?”“伯林一別爾嘉耶夫（Berdyayev)”等等。翻譯成普通話，就成了：“不知能否找到一名英國貴族，邀請團結工會活躍分子康拉德•比林斯基(Konrad Michnik)及艾瓦.庫利克（Ewa Kulik）?" "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有一本以巴黎為基地的波蘭文學季刊《文學檔案》（Zeszyry LiteracMe)嗎？”“以賽亞•伯林會替波蘭版的《別爾嘉耶夫》寫序嗎？”等等。我還記得在弗洛茨瓦夫，坐在陰暗骯臟的公園長椅上，等候一名活躍的地下分子——今天已成為波蘭的

女性運動領袖之從一張香煙紙片上讀一個我傳給她的訊息。

她讀完后，將紙片往嘴巴里面一放，就這么地吞了下去。

或許我在暗中幫助反對勢力時，有些行為過分小心，幾乎到了夸張的地步，但是由于我訪問的那些人需要承受的風險遠比我要大，因此我寧愿夸張到偏執的地步，也不愿意危害到他們。我很高興能牽著秘密情報人員的鼻子走，不但最后的報酬不虛努力，而且在過程中，我還享受到一場非常緊張刺激的游戲呢。

東德其實并沒有堅持禁止我入境到1989年12月底，經過英國駐東德大使館的大力干涉，他們于1984年10月7日、第三十五個國慶日時，特準我進入兩天，參加慶祝活動。當時，我注意到在國際記者中心，大部分的人對我特別冷淡。（現在我才知道國安部的n/13組當時至少派遣了二十四個便衣人員，潛伏在記者中心。）“城市的中心，”當時我在傳回去的報道上寫著，“到處都是穿著制服或是便衣的警察。我每次回到旅館時，都會被[國安部]便衣警察叫住……當我去訪問老朋友（維爾納•克雷奇爾和他的妻子安格麗特）時，有四個人坐在汽車里等在外面，說明顯可說十分明顯，但是說不明顯也可說不明顯。”我現在才從檔案中發現，國安部下條子指示邊境警察，從1984年10月8日起，我再度被禁止入境，出境應在我簽證上蓋上“無效”印章。“如該員詢問，要求解釋，可告訴他至1984年10月8日截止的簽證，系錯誤簽發。”

1985年4月，我再度溜進東德一天半。當時，我伴隨英國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訪問東歐三國。東德可能有鑒于我那次是與其他記者一起搭乘外相的專機旅行，擔心若拒絕給我簽證，多少會引發一點外交風波，所以讓我隨著記者團進入了東德。但是他們的歡迎極為冷淡。在那以后，我雖然不時便申請一次簽證，而且有四年沒能進去，但是每次申請，都被記錄在國安部的索引卡上。在SOUD卡上，還記錄了HVA的第三組于1986年對我的一次評估。HVA第三組專門協調在外交掩護下工作的情報員，顯示那次評估報告是由倫敦大使館的人做的。

在那一段時間中，波蘭和匈牙利內部開始變化，而且速度越來越快，激蕩的程度越來越高。1989年6月，我到華沙去觀察大選。在那次半自由開放的選舉中，團結工會大獲全勝，而共產黨在實質上全盤失勢。有一天早上8點，我居住的歐羅佩斯基旅館房間突然電話鈴聲大作。當我接起來時，那頭傳來的是竟然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東德外交部官員。他以非常正式的口吻告訴我，今后我訪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將不再有任何障礙。隔了沒有幾個禮拜，我果然人就到達東柏林，住在可以遠眺到腓特烈大道火車站的大都會大飯店。

從東德，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設法在幾家大歐洲報紙上刊登出我與東歐人士合寫的一篇文章。其中一位合寫人是匈牙利著名異議分子雅諾什•基斯（Jinos Kis),他所領導的自由民主聯盟正出現雛形。另外一位合寫人是亞當•米奇尼克，他當時已成為反對黨團結工會的機關報的總編輯。該報也是團結工會與波蘭共產黨在第一回合談判中，共產黨第一個讓步、準許正式出版的報紙。在文章中，我們寫道：“歐洲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機會，一個將共產主義轉化為自由民主的機會。過去從來沒有人成功地做到這一點。沒有人知道這一次的嘗試是否會成功。”然后，我們呼吁西方領袖和歐洲的意見領袖幫助這個民主過程得以繼續下去。通過高效率的旅館接線生，我們得以將這篇正面攻擊東德所代表的一切的文章傳送到了外面的世界中。

我還做了幾次極為可笑的訪問，對象都是比較低階的官員。有一位在東德國際關系中心任職的克雷特克博士（Dr.Kleitke)，緊抓住庫爾特•哈格爾的國家主張高調不放的家伙，居然在訪問過程中堅持不肯說“德國人”這三個字，而只肯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人”。不過，他總算很大膽地承認兩者之間有很親近的關系：“我們似乎相處得不錯。”說到這里，他又匆忙加上一句話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人也很喜歡英國人和荷蘭人。

我和一小群異議分子，在他們的中間居領導地位的格爾德•皮普（Gerd People)的公寓中，談到深夜。他們都深感沮喪、悲觀，認為東德要追隨波蘭和匈牙利腳步前進的機會很小。受到那次談話影響，我也寫了一篇過分悲觀的文章。《旁觀者》將那篇文章設定的子題為：“為柏林墻裂縫而悲嘆的一群”。雖然我在波蘭和匈牙利看到了無限的可能性，但是，和格爾德•皮普及他的朋友一樣，我無法相信同樣的改變會如此快速地在東德發生，而且不到幾個月，大家就已可以穿墻而過了。

事實上，就我所知，唯一預測到這件事發生的，不是異議分子，也不是政治家、外交官、甚至不是記者，而是一名叫烏蘇拉•馮•克羅西克的老太太，也就是我最初到柏林時寄居家庭的主人。一天早餐時，她告訴我前一晚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在夢中，東西德的邊境打開了幾個鐘頭。但是在那幾個鐘頭間，許多人涌了過來，使得圍墻再也無法關閉——德國就此統一了。

在那次至東德的旅行中，最令我感動的是與維爾納•克雷奇爾的兒子約阿希姆的一次對話。1980年被國安部偷偷拍攝下照片的十二歲少年約阿希姆，現在已經是一名高高大大的二十一歲憤怒青年了。我們坐在牧師公館的陽臺上，在炎熱的7月天中，他告訴我，他和他的朋友如何獨立監視地方選舉，發現國家如何假造選舉結果，而當他們抗議政府造假時，警察又如何抓著他們的長發，將他們拖過破巷。這個國家中大部分人，他說，都太笨、太悲觀、太害怕，什么事也不敢、不愿意做。或許有一天東德真的會改變，但是那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的事，而到時候他一定老得滿頭白發。他想要生活，想要旅行。如果他能夠離開一次，四天，到西柏林就好了。萬一這一天真的到來的話……

幾星期后，我收到約阿希姆寫給我的一封信，上面蓋的是西柏林的郵戳。他到匈牙利去度假時，和許多同伴一樣，從已變得很松懈的奧地利邊境逃了出來。從那以后，他經過了一個難民接待營，回到西柏林，來到一個離他父親的潘科教區不到幾里的地方。但是，當然，他無法去探望他的家人，而他的家人也無法探望他——這情形很可能會持續許多年。在潘科，有一個地方，如果人站在舊水泥磚塊上，可以遠眺過柏林墻，看到西柏林的一個鐵路車站。有一天，通過事先電話安排，他站在車站月臺上，而他的弟弟、妹妹則站在那舊水泥磚塊上，遙遙相望。在圍墻的兩邊，他們相互招手、吼叫。事后，他的妹妹非常沮喪，他母親不得不對他說：不要再這么做了。

當年10月，昂納克終于在戈爾巴喬夫以及萊比錫示威的雙重壓力影響下，結束多年專政。萊比錫示威就好像產婦生產前的陣痛一樣，在當時已經成為每星期一晚必定會發生、而且愈演愈烈的固定戲碼，每每從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彌撒開始。我飛到柏林，租了一部汽車，飛車前往萊比錫，并且和以往一樣，在路上因超速被渴需西方貨幣的警察攔下罰款。在霜冷寒霧中，我來到大教堂，使出渾身解數，說服領位員打開緊閉的大門，讓我擠進座無虛席的教堂。當我側身從旁邊的甬道向前行時，幾乎撞上了詩人詹姆斯•芬頓。他的頭低垂，好似在祈禱一般。另外一個圓圈圍了起來。  
   
接下來是n月。我正從波茨坦廣場通過剛打破的柏林墻，抵達西柏林，又轉頭回來，感覺像童話故事一般不真實。我和維爾納一起坐在我在大都會旅館的房間。我們從高樓上，可以眺望到腓特烈大道車站之南。通常沒有人會經過那里，因為前面的路被圍墻堵住，無處可去。但是現在，烏蘇拉的夢想成真，人群如潮涌一般，穿梭于圍墻的兩邊。維爾納緊抓著他的煙斗，說：“你看！你看看

那邊！你想象不出，那對我的意義。”

我們如被魔咒定住一般，在窗旁看著人群的往來，心中默默地肯定：事情不會再像以前一樣。共產主義已經結束。冷戰已經結束。所有一切都成了過去式。在那個時點，我們并不知道，他除了維爾納，還是“山毛櫸”，而我則除了加頓艾什以外，還是“羅密歐”。

# 第十三章  檔案效應

時間為1995年10月。我進人我在牛津大學教堂路的研究室，發現傳真機的地板前散滿了紙張。撿起來，我發現是維爾納從潘科教區傳過來的有關一名線民的資料。一名個案經辦人員前后手寫了30頁的報告，詳細敘述了他與IM弗賴爾（Freier)在秘密公寓埃莉薩中定期晤面的談話。德文中Freier—詞，同時有老派的“求愛者”和時下比較流行的“嫖客”的兩種意思。我想這里比較適合后者的意思。在美式英語中，“約翰”有廁所的意思，但是線民“約翰”大概不會理解國安部對他開的一個小玩笑。看到“弗賴爾”，令我不禁聯想到，英式英語對“弗賴爾”另有一種稱呼:爬街者（Kerbcrawler)。就姑且讓我們這么稱呼這個人吧。

IM“爬街者”是教會體系內的一名工作者。他非常詳細地報告了同事維爾納的行徑。在針對1979年2月7日的一次報告中，爬街者報告外面有一個模糊的傳聞，提到維爾納可能在外面與“未經查證之女子”往來。爬街者是否能從維爾納口中騙出話來？艾克斯納（Exner)上尉在報告中寫道：

到目前為止，該線民無法從一次秘密談話（輕松、私下晤面，一面啜飲酒精飲料）中，發掘匿名信息來源的真實性。他將繼續設法抓住任何機會，主動厘清這項傳聞。他相信下一個比較好的機會，將在教會避靜期間……本人已囑咐該線民，如果行動中支付了任何費用，可以報銷。

前一個星期，維爾納在柏林教區的晚餐桌上一面啜飲葡萄酒，一面將這段話念給他的妻子安格麗特和我聽，我們笑得東倒西歪。有多少婚姻，我心中暗想，能夠像這般輕易通過國安部檔案的考驗？

檔案并不就此告一段落，而續有下文：“借此任務，該線民再度設法提出一私人請求：希望能夠有機會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訪問。本人已給予他肯定的答復。”原來，“爬街者”，和“米夏拉”一樣，替國安部工作的目的之一為獲取出境簽證，而國安部則再度利用了國家滴水不漏的國境線，以海外旅行為誘餌，迫使他人為之工作。

高克機構以書面肯定了“爬街者”的真實身份后，維爾納曾打電話給他。然而，他從頭否認到底，對所有的指控都不認賬。事后，他還寫了一封信給維爾納，洗刷自己的罪名。

我不禁納悶：不知道他是否有一臺傳真機？

這個情勢，在日常生活中，沒有適當的英文，但是卻有兩個長長的德文字，很恰當地可以表達：Geschichtsaufarbeitung(歷史加工）以及VergangenheitsbewSltigung(解決過去），有“對待”、“通過”、“妥協”甚至“克服”過去的意思。這是繼希特勒之后德國第二次鞭笞自a的過去。經過了第一次的洗禮以后，再度到處都是偵察、暴露、揭發、相互揭發、再揭發之聲。而且不限于德國，在這個影印、傳真、光纖、衛星的時代，各種揭發文件在頃刻間便傳到了全世界。昨天，你的秘密還被安靜地躺在一個灰塵滿布的檔案柜中，今天，就已經呈現于千百萬人的早餐桌上了。

其實世界各個國家都有“過去”的問題。所有亞洲和歐洲曾經歷過共產主義的國家，所有拉丁美洲和南非經歷過獨裁統治的國家，還有曾經歷過佛朗哥的西班牙或后團結工會的波蘭，都有過去，但都設法與過去之間劃上一條粗粗的線。讓過去的成為過去吧！亞當•米奇尼克便公然主張如此。“讓我們優先建立起相互的愛心。”他呼吁。而且，他說，秘密警察的記錄反正不值得信賴：“例如，誰愿意相信國安部線民所說的話？到目前為止，還沒人能夠說服我，那些文件值得信賴。”

但是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有的地方舉行公開審判：有的名不副實，根本算不上審判，例如對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的審判就是如此；有些地方的審判則作秀的成分居多，例如保加利亞對前共產黨領導人托多爾•日夫科夫（TodorZhivkov)的審判便是如此。還有的國家以肅清政府內部人事的方式，來“洗滌”過去的罪行，如捷克便是這么做的。另外，部分國家將律師、歷史學家、民選官員等組織為特別委員會，調查在共產黨執政的一些特定時期，如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和波蘭的宣布戒嚴時期等等。智利及南非還設立了所謂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只有新德國一樣也不遺漏。德國人不但舉行公開審判、進行體制內肅清，組織委員會，而且還有系統地公開了秘密警察檔案，讓所有想知道自己如何被害或自己如何害過別人的人，都可以一觀檔案內容。這種做法極為特殊。暫且不談其他政治、經濟后果，光就經費而言，有哪個后共產主義的國家有財力如此做？高克機構僅1996年的年度預算便高達2億3400萬德國馬克——相當于1億英鎊。這比立陶宛一國的國防預算還要高。

德國政府在東、西兩地，共雇用了3000名全職工作人員。舒爾茨女士過去替全德中心（All German Institute)規劃導覽西柏林，例如帶人參觀柏林墻等等。舒爾茨女士離職后，她的后繼者鄧克爾女士曾替東德的一家新聞通訊社工作。換句話說，高克機構本身就是一個統一后東德的縮體。利用等待約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接見我的時間，我與兩名秘書聊天，談起最近國安部的一名資深官員約阿希姆•維甘德（Joachim Wiegand)在國會大審團前作證的事。這個維甘德就是那個對維爾納說，他知道維爾納在西柏林時曾打電話至牛津給我的那名上校。原東德的秘書非常生氣地說，她聽到那只豬把國安部說成救世軍的支部一般，簡直恐怖。而原西德的秘書則輕松地說，“沒錯，不過我聽說很有娛樂價值喲。”兩個世界，分別在兩臺電腦屏幕的兩邊，就這么地展開了沖突。高克牧師本人，就像維爾納一樣，使出全力，讓一個曾經生活在獨裁統治的社會，與一個對娛樂價值的興趣高于其他一切的社會，相互分享價值與經驗。在這間辦公室中，我看到了路德版的電視脫口秀，但是我并不確定路德就一定是贏家。

歷史學家一面在做研究，一面也創造了歷史，自己成了這個歷史的一小部分。有一兩名歷史學家出身東德，背負著痛苦的個人經驗，其他的則大都為西方學者，過去僅能從西方的角度來研究東德。其中有幾位慕尼黑當代史研究院出身的學者，以研究納粹主義而聞名。他們彬彬有禮、思想開放，年齡大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間，他們是最仔細的病理學家，而他們最經常解剖的便為蓋世太保和黨衛軍。他們代表的是另外一個怪異的德國故事：將前半生的時光花在研究一名獨裁者上，然后再將后半生的時光花在研究另一名獨裁者上，但是他們一輩子都生活在和平安樂的德國式民主之中。

每個與檔案直接有關系的人，手上都掌握了一些不尋常的知識。不論這些人頭腦多么清楚，多么有責任感，程序多么完整，氣氛多么嚴肅，仍然無法抑制這些人內在的窺伺心態，使他們想要知道一些其他人生活中不為人知的細節。例如，管我檔案的女士，我發現，在談論檔案中的“米夏拉”或“舒爾特”時，聲調都不免會拉高一點。是的，他們說，檔案資料有的時候“非常有趣”。這就是做人的樂趣，我們都知道的。

正如我在自己的個案中發現的，這些情報即使在今天仍然相當有力量。過去國安部軍官手上掌握的力量，轉移到了高克機構辦事員的手上，通過他們再傳給個別的讀者、記者、學者，或想要知道員工或未來員工的檔案資料的老板。一旦拿到了高克檔案資料后，這些人就必須做出決策：要雇用？要解雇？要揭發？要原諒？更嚴重的是，當線民兩字出現，就像其后面被涂黑的名字，代表的是污點。就算它背后存在著可以理解的善意，就算在法律的嚴格保護及公眾的審慎監視下，那一抹涂黑代表的就是力量。

在維爾納的引領下，我到諾曼街原國家安全部大樓內的閱覽室，訪問了專門替訪客準備個別檔案的特林佩爾曼（Triimpelmarm)女士。聰慧而瀟灑的她，與我討論了她的同事間怪異而矛盾的心理。他們都能夠感覺到手中掌握的是秘密情報，因此也是一種秘密力量，幾乎有一種在為國安部工作的感覺。不過，有很多同事不太愿意告

訴朋友或陌生人他們的工作單位。鄧克爾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囑咐我不要用她的真名，因為她住家的周圍有許多鄰居過去都為國安部工作，她覺得工作曝光，可能會發生不愉快或更糟糕的事。她說,那些人之間至今仍然組織嚴密。

這些檔案可以改變人生。一位最近前來向特林佩爾曼女士調閱檔案的讀者，曾因想逃往西方而被關了五年。從檔案中，她發現當初告密的竟然是與她同居的男子。兩德統一后，他們仍然住在一起。在她要去調閱資料的當天，他還在她出門前祝她一天愉快。那名婦女哭倒在特林佩爾曼女士的雙臂中。

篤信宗教的特林佩爾曼女士，花很大的心思，幫助他人度過閱讀檔案的震驚期。她在事前會先打電話給當事人，為他們做心理準備。在引領當事人進人閱讀室前，她更會仔細地解釋檔案的性質。在閱讀期間，她隨時在附近，只要有需要，她便會出現，給予當事人安慰。她的眼睛和心臟都有毛病。天天和毒藥在一起工作，怎么能不受毒素感染？

但不是所有的高克機構工作人員都如此體貼。如果德國還需要重復類似作業的話，對于那些會直接接觸到受害者及家屬的人，我會建議加強訓練。如果德國還會發生第三次鞭笞自己過去所作所為的話，或許會做得非常正確、分毫不差。然而，整個鞭笞過去的目的，就是希望再也不會有第三次獨裁發生。

到1996年6月時，高克機構已經回答了170萬人次的公務及民間詢問。換句話說，每十名東德人中，便有一人有過“高克經驗”。在此同時，超過100萬的男男女女——正確的說為1145005人——正式提出申請，索閱他們的檔案。其中將近42萬人已經讀過了自己的檔案，而有36萬以上的人——不知是令他們松了一口氣還是失望地——發現，他們并沒有檔案。至于剩下的人，還在等待當局處理申請案中。我看不出有任何科學方法可以整體評估這項出乎尋常的作業。

就像維爾納教區中的薇拉•沃倫貝格發現她丈夫就是專門監視她的線民一樣，許多人發現了令他們驚愕及震怒的事。只有他們自己有資格說，知道是否比不知道更好。有一些因為被國安部列為線民的人，消息曝光后受到媒體的審判，然而曝光者在將名單公之于世前，并沒有思考動機、內容或名單的可信度，僅不負責任地公布人名，嘩眾取寵。事實上，做這種事必須要非常謹慎才行。有一位友人提到在1980年代時，有一個人跟他聯絡，并對他說：“有人要我打你報告，我無路可走，告訴我，我應該說什么？”結果，他們兩人想出一些可以填塞報告的故事。如果我的朋友不幸身亡，而那名線民的報告被發現的話，這世界上豈不連一名替他說話的人都沒有了？此外，大家都將注意力放在精密的秘密警察個人檔案，以及偏執的線民的行為，而分散了對黨領袖和他們爪牙的注意力，其實那些人才是真正掌管整個系統的人物。

雖然檔案是在前東德異議分子堅持下才得以開放的，但是令人感到諷刺的是，開放檔案的動作反而強化了西德對東德的新殖民主義態度。西德人過去從來不需要像生活在獨裁主義下的東德人一般，做出任何痛苦的選擇，現在卻坐在這個簡單的抉擇之上，輕松地一句“警察國家”就把東德打發掉了。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東德人反而在宗教領袖曼弗雷德•斯托爾佩之類人士的帶領下，團結了起來。斯托爾佩在檔案記錄中，曾以“秘書”之名做線民，這對他號召前東德人士，不但無害，反而有益。除我以外的另外一名“羅密歐”——盲眼DJ，盧特•貝爾特拉姆現在受雇于民主社會主義黨，也就是前執政的共產黨的直接繼承者。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現在擔任的職位為“媒體代表”。

顯然，公開檔案的作業并沒有如部分人士所擔憂的，摧毀了東德社會。有一位叫海因茨•勃蘭特（Heinz Brandt)的教授，據說被人揭發曾為線民，而在失望與憤怒中，將他搜集的許多園藝裝飾可愛小精靈塑像一次全部摧毀，其中有一座女性陶像，是世界上唯有的一座。不知怎么地，這似乎象征了東德命運的結束。有許多人因為檔案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失去工作，被原工作單位解職，還有人在匆忙中不及申訴，就自動提前退休。但是在公務部門中，有許多人雖然被證明有高克檔案在案，但仍然保住了原來的職位，還有一些被解職的，后來在法庭命令下也得到平反，或至少獲得一筆補償金。另外，檔案帶來了無數的沖突，造成朋友絕交、婚姻破裂、家中的玻璃被突如其來的磚塊打碎、莫名其妙地遭人動粗。最糟糕的是，有好幾件自殺事件，部分原因必須歸咎于高克文件的曝光與媒體的報道。

當然在這些負面成果之外，還有更多、更多的人在閱讀過檔案以后，不但松了一口氣，而且能更踏實地繼續現在的生活。隨后，當德國出現一股新的聲浪，主張再度關閉國安部檔案時，突然又有大批的索閱申請涌進了高克機構，大約每天達1000封。已經處理過500件個案的特林佩爾曼非常同情地表示，從她經驗上來看，大部分人事后都認為能夠一覽自己的文件是值得的。一名老先生告訴她：“至少我知道怎么寫遺囑了。我原本以為我的女婿在背后打我的小報告，所以一直告訴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給他，就罪該萬死。但是現在我知道我還是該留給他了。”“現在我知道了”是一個大家共同有的感覺。那也是我的感覺：在徹底洗滌以后，大家建立了一個更好的基礎，可以共同努力向前。而那只是一種感覺，非常個人的感覺。

其實，德國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傳統智慧，可以用來思考檔案這一回事。一種為猶太傳統下的古老智慧：救贖的秘密在于記取教訓；或者，在談到納粹主義時經常被引用的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說：凡是忘記過去的人必將重蹈覆轍。另一方面，歷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曾評論道：每個民族都是一個有共同回憶與共同遺忘的共同體。“遺忘，”勒南說，“或者我應該說歷史錯誤，正是一個民族歷史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每個人都會有某一種可以和“原諒并遺忘”扯得上關系的經驗。歷史上主張遺忘的名人有一大籮筐。早在公元前44年，羅馬的大哲學家西塞羅在愷撒大帝被謀殺的兩天以后，便要求大家任過去的傾軋“永遠湮滅”。兩千年后，丘吉爾在蘇黎世演講，提醒大家，前首相格萊斯頓曾呼吁舊敵間學習“遺忘”。

兩種智慧都值得我們學習，但是卻無法輕易地融合為一體。我所能夠想到最接近的做法，便為讓時間引領大家走過發掘一記錄一反芻一繼續前進的過程。這是我所知道的各種尋求真相但也同時妥協的方法中缺點最少的一種，適用于不同民族之間（如波蘭人與德國人，英國人與愛爾蘭人），適用于同一個國家的國民中（南非人與南非人，薩爾瓦多人與薩爾瓦多人），適用于男人與女人，以及你我之間。同時，它也適用與我們與他們，我們與我們，他和她，以及我與我之間。

德國人，以及德國以外的人，都需要理解為什么在20世紀的后半葉，德國人如何在德國的土地上再度建立起一個極權的軍政府，沒有用到如第三帝國的殘忍手段，也沒有進行第三帝國的種族屠殺，但是卻無所不在地掌控了國內社會。這個國家如何操控了納粹所建立起的心理習慣、社會紀律和文化特質，以及與納粹同樣的致命“次要美德”——責任感、忠誠、準時、清潔、勤奮。為什么這種事情可以在這么多德國人毫不察覺的情況下，在德國社會中繼續下去如此之久。德語這個榮耀而過于有力的工具，又一次讓自己被利用來將邪惡偽裝成良善。簡單地說，德國為什么至今仍不能走出歌德橡樹的陰影？

# 第十四章 英倫諜影

斯蒂芬-維津采伊（Stephen Vizinczey)在他的小說《愛上熟女》（In Praise of Older Women)中，描述了令人難忘的一景：那是1956年蘇聯人侵匈牙利時，在奧匈邊境的一個小鎮市場旁停放著一整排全新的銀色巴士，車頭各以鮮黃的大型手寫字標示著它們的目的地——瑞士、美國、瑞典、英國、澳洲等等。“你想要到哪里度過余生？一對夫婦，抱著一個新生的寶寶，決定搭上往比利時的巴士，但是到了最后一秒，卻下車，沖上寫著新西蘭的巴士。”

大部分人的人生選擇并不如此突兀，但是當我們回顧過去，都不禁看到那些時刻，人生原本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路：

沿著我們沒有走的路

走向我們從沒有打開的門

進入了玫瑰花園

每個生涯中的選擇。每個或許可以成為妻子的女友。對東德反情報頭子克雷奇將軍而言，那扇沒有開的門或許就是《打鐵鋪》雜志上的那一則廣告。如果他成為南非某一家打鐵鋪的助理，人生將是多么不同！就我而言，我的人生或曾出現過好幾部沒有搭乘的巴士，一部是成為外交官的，一部是成為傳統學院型歷史學家的，一部是成為一般駐外記者的，另外還有一部，隱藏在道路角落，上面沒有標示目的地，但是我知道是為政府那無名單位工作的。

我沒有坐上前述所有的巴士，而選擇見證并記錄下中歐從蘇聯霸權下解放的最后一段過程。在冷戰結束后，我展開我的工作，使用傳統歷史學者的方法，研究那些我剛經歷過的事件，在檔案室消磨無盡的時間，閱讀一直到不久以前仍被視為最高機密的政治局決議文件。這些被傳統歷史學家視為珍貴信息來源的文件，能夠幫助我發掘事情的真相嗎？就在我心思搖擺之際，我發現了國安部的檔案，開始思考用另類的方法，探索剛發生不久的過去，從研究我自己開始，研究歷史。然而，“我們能夠知道什么？”這個大問題當前，或許我們還應該有第三種方法才是？

在整個上述的過程中，我幾乎從來沒有想到過我們英國的秘密情報世界。我從報紙上偶然會看到有關MI6、MI5的新聞，這兩個主管秘密情報的單位似乎正小心地踏出陰影，適應外界的關注。在冷戰結束以后，政府比以前更難對任何政府機構保持全面性機密，而秘情機構如果想要生存——并獲得預算的話，就必須要對公眾有個交代才行。報紙上陸續出現的相關新聞，如政府首度公開任命MI6和MI5長官，國會通過法案為這兩個機構的存在設定了法律基礎，MI5局長第一次公開演講，國會成立“情報及秘密委員會”等等，都反映出秘密機構正逐漸走向公開化的歷程中。我還注意到，MI6搬到一棟新的辦公大樓中。事實上，那棟大樓，四面以綠色玻璃環繞，就在泰晤士河南岸，非常引人注目，毫無隱秘感。我當時并不知道，MI5也搬到泰晤士河另外一岸的一棟白色的后殖民式建筑物中。事實上，這棟取名為“泰晤士大樓”的建筑與國會大樓在同一條街上。我經常經過這一條街，卻不知道MI5就在那里。

人生至此，我已完全淡忘了少年時代對秘密情報工作的憧憬，更不記得還曾申請過相關的工作。但是就在我開始研究我的國安部檔案時，我發現有人并沒有忘記我。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神秘電話。來電者說他就在那個1976年時曾與我取得聯絡、外交部不存在的單位中工作。他有件事很想與我談一談，不知道我是否能夠撥冗接待他。我們同意在倫敦一家旅館內喝茶、晤面。

他不多話，很快便言歸正傳。他說，牛津大學不時會來一些學生或學者，他們懷疑是在為敵對力量工作；我能否考慮關注一下他們的動向？我告訴他，我不能。雖然我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有這么做的必要，但是不希望自己與朋友、同事或學生間有這一層隔膜。

當我停息下來稍事思考后，發現他們的工作模式必然向來如此。當然，他們會有人在牛津大學、在其他大學、在其他職場、其他人生道路上。這些人在全職或半職工作之外，還擁有這一份秘密的生活。而所有的秘密情報網都需要人脈、需要線民。如果因為線民的幫助，使得有關單位能夠找到愛爾蘭恐怖組織IRA所放置的炸彈，或從中東被派來謀殺薩爾曼•拉什迪[10](#__10)[1]的人，那么線民的所作所為不但善良，而且勇敢。

然而，他們的做法令我感覺很不對勁。經過了這么多年以后，他們顯然還在跟蹤我。另一方面，他們顯然對我的追蹤工作做得并不怎么好。如果他們曾好好讀過我的作品，就會知道我不會再玩他們的把戲了。或許他們僅假設大家說一套、做一套。就一般而言，這也沒錯。

我與不知名情報員的晤面雖然只有十五分鐘，卻相當令我感到不愉快。不過，由于它，我重拾過去的回憶，并開始思考：如果我曾追求那秘密世界的話，今天會如何？如果當時搭上了那部沒有標示的巴士，我現在會在做什么？馬可•沃爾夫與我在今天已經統一的柏林市晤面時所做的陳述中，有無任何真實成分？東德之類共產黨國家的秘密情報組織，與英國之類民主國家的秘密情報組織之間，不一樣在哪里？

所有英國人都喜歡閱讀間諜小說，市面上這類書籍之多，大概只有色情與園藝的書刊足堪比擬。當然還有報告文學、回憶錄、學術研究、電視小說、無窮無盡的小說與恐怖故事。我的國安部檔案中第106頁，是一項XX/4組記錄：“‘羅密歐’替‘山毛櫸’安排妥當，將于1980年2月25日與駐華沙記者蒂莫西•塞巴斯蒂安(Timothy Sebastian)見面。”最近有朋友告訴我，蒂莫西•塞巴斯蒂安出了一本間諜小說《出走柏林》（Exit Beriin),非讀不可。

書架上有許多好書，但是問題在于：你怎么知道他們所寫的，有哪些是事實，哪些為虛構，哪些還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細節？因此在印刷品的大海中泅泳了一段時間后，我展開一連串的訪談，有的訪談對象曾針對英國秘密世界寫過不少東西、但是現在相當愉快自己能夠脫離文字苦海，有的則是在冷戰期間以政務官的身份管理過英國秘密工作的政治家。

這段期間，我曾經遠赴康瓦爾，與作家大衛•康瓦爾（David Cornwell)筆名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沿著海岸高崖散步，并與俄羅斯大使共進了一次午餐，在那次難忘的午餐會上，俄國大使特別對約翰•勒卡雷這位西方最偉大的間諜小說家，表示了他的敬意。我還走進許多美麗的英國鄉村花園中，與許多退休的紳士促膝長談，我感謝他們在謹慎中所表達出的坦誠。經過這個過程，我感覺到自己進人了這個保存了濃厚的古老英國紳士氣息的小圈子：格子襯衫、小馬甲、整齊折疊的雨傘、完美無瑕的禮儀和青綠的草坪。相較之下，裝潢粗俗的小木屋、啤酒肚、人造纖維的運動服，那些令我聯想到國安部情報人員的特質，就美學意識上，好像屬于1000萬光年以外的事情了。秘密國家已不存在，宛如進入了一個秘密花園一般。我也與1979年時請我到泰晤士河邊“河之南”餐廳吃過一次飯的英國官員又見了一次面，發現他文質彬彬，聰慧風趣，極具個人風采。但是當我進一步探索，走出那秘密花園，而來到那閃耀著光芒的泰晤士大樓白色大廳時，首先映人眼簾的是一個大型標志，上面畫著一頭勇猛的獅子和美人魚的尾巴，下面則寫著“保衛國土”的驕傲字眼。然后，我通過了幾扇令人不知不覺會聯想到《星際大戰》電影里有高度安全設施的自動門。為順利走過最后的幾道門，我不情不愿地同意，所有的談話記錄都將“不列人記錄”——也就是說，我不能明白指出誰曾對我說過話。

談話結果令人深感挫折。一個已經死亡的秘密情報機構，最大的好處就是它所掌握的秘密不再是秘密。國安部的事，我們可以盡量發掘。但是一個還活得好好的秘情機構，問題就在于它還保有許多機密。“河之南”那一餐的東道主形容他對蘇聯的間諜工作經驗：“好像在深夜中，用一把小手電筒，設法檢驗一頭大象。”其實那正是我面對他所屬機構的感覺。有很多人愿意接見我，與我一談，但是從談話中我便可以看出，他們掙扎于保密與公開的兩極之間。因此，瞎子摸象，最后只能發現大象這里有一只扇子耳朵，那里是一根大鼻子，但是整體依然不存在。

是的，東德是個“很難敲破的堅果”，一名MI6的紳士告訴我。不過，他們在蘇聯陣營的其他東歐國家中表現都不錯。波蘭，他們幾乎搞得一清二楚。不過，他們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先知道東歐會發生如此重大的政治變化。作為一名現場報道的記者，我或許消息還比他們靈通一點。不過，他們還是得到了一些對方正式的重要秘密資料，尤其是軍事情報，對決策的影響雖然不大，但是相當重要。(三名前外交部長都小心地同意這種說法。）

英國情報員因各種你我可以想得到的理由而加人組織：神秘感、好奇心、想探險、愛旅行，像他們的父親一樣，希望“為國家做點事”。但是真正在秘情機構中做事，卻可能相當無聊、沉悶。到了一個又一個的城市中，踏過一條又一條的后街，尋找安全的會面地點，尋找沒有標志的紙盒，有時候他們不禁會自問：“我為什么要如此浪費自己的生命？”然后，還有辦公室的內斗與政治。當然有很多工作還是很有意思的。“有意思”這個相當孩子氣的字眼，經常出現在我與這些人的對話之中。一名退休的秘密組織資深工作者回憶道：“我不敢相信，做這種事，還有錢拿呢。”

他們會比另外一邊更小心、嚴謹嗎？嗯，他們說，我們不會暗殺或綁架，幾乎從來不勒索恐嚇。一名已退休的官員對我表示，那對士氣（morale)非常不好，而士氣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們的方法都是合乎“正氣"（moral)的。“正氣”，在這個灰色地帶，是個何其偉大的概念。我記得國安部的艾克納上校曾對我說英國秘密情報人員“很紳士”一-不過，他是在比較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和西德的BND之后，做此評論的。如果我們將美國CIA在拉丁美洲的記錄一并思考的話，那么西方情報組織與東方之間的差異，就更難辨識了。

一只金龜子和另外一只之間的差別不可能太大。一名退休的秘情機構官員告訴我，當門口有警察把風時，潛入一名嫌犯家搜查證據，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他的話讓我聯想到瓦姆比爾博士不久前才告訴我，一名國安部秘密工作人員偷偷溜進他在萊比錫的家的情況。兩邊的退休官員告訴我，他們的最佳情報員，永遠是志愿工作者，也就是那些基于個人的理由——有些是私人的、有些是政治的——而從事這份工作的人。他們不會被收買，也不曾被恐嚇。這已成為間諜行業中的普通常識了。而且兩邊的人都用同樣的話，告訴我情報員和個案專員之間的微妙私人關系。“那是一種非常美妙的關系”，一位從MI6退休的資深官員表示。“你可以談任何事情、工作、個人問題、妻子，并確定他會替你保守秘密。”我看到了間諜工作中最吊詭的現象：背叛的關鍵是信任。任何一名自國安部退休的官員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便是他從來沒有背叛過他手下的情報員。

這么說來，不同的目的是否能夠合理化相同的手段呢？兩邊都是做同樣的事，但是一方是為自由國家而做，因此目的是崇高的，另一邊是為獨裁而做，因此目的是卑鄙的。我們是對的，他們是錯的。這么說起來，他們并不覺得到外國去做間諜工作是那么錯誤的事，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并不如此。對他們而言，從專業觀點來看，另外一邊只是“對手”而非“敵人”。超出這一點以后，是的，就要看你是替誰工作了。

這里有一條非常滑溜的坡道。20世紀中有許多罪惡，包括共產主義在內，最后你可以說“因為目的崇高，因此可以使手段合理化”。但是我們仍然無法忽略這論點的存在。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拿暗殺希特勒來說吧。1944年，施陶芬貝格企圖暗殺希特勒之舉被視為非常高貴的行為。但是如果暗殺的對象是丘吉爾的話，那么同樣的行徑就變得骯臟齷齪了——雖然暗殺者在行動時可能表現出同樣的勇氣與膽識，甚至也同樣熱烈相信他的所作所為是充滿正義的。同樣的行動卻得到不同的道德評價。

但是，不僅目的要崇高，手段也必須要能夠配得上目標。什么樣的行為才能夠烘托什么樣的目的，我們沒有簡單的規則可循。每個個案中都有一條隱形的道德規范線，因此也都有它們特殊的情況。英國間諜曾經跨越出那條線嗎？當然，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他們多么頻繁地跨出？跨出多遠？在沒有看到檔案以前，我們外人將永遠無法確定。不過就算那些已經退休或仍在里面工作的人，在記憶的萬花筒不斷旋轉中也會忘記或重新記起。

我可以想出幾個理由相信，英國人可能在冷戰中跨越那條線的頻率與距離比我們今天相信的要遠。就算在我的世代中，仍然有許多人受到戰爭的影響甚深，有些人仍然活在戰爭的集體及家庭記憶之中，有些人崇拜文藝作品中各種戰爭英雄形象。雖然在冷戰期間，我們在口頭上并不多談戰爭，但是許多人仍然相信我們仍然處于戰爭的狀態——就和以前沒有兩樣。有些事情在和平的時候不能做，但是在戰爭的時候就能做了。但是如果是在戰爭與和平之間，這種事是能做還是不能做？而且，在我們的心底，我們多少有一種意識，認為“只要是為了我的國家，不論對錯”，都是該做的。但是如果我們國家做得不對，該怎么辦？如果我們的國家在原則上是對的，但

是在個案上是錯的時候，又該怎么辦？

太多道德思緒需要深人思考。然而，打架打到一半時，你無法停下來先辦個哲學研討會。既然如此，我們就只能接受那結果了。

如何評估我們海外間諜——或其他國家的海外間諜——比評估國內安全系統的必要性還要困難。在這里，目的和手段幾乎已不可分。國家偵測公民的行動，直接侵犯了她原來應該要挺身保護的自由。這中間的沖突是明顯的、無可避免的。尤其如果侵犯過了頭的話，就會開始摧毀她原先想要保存的東西。然而，誰來決定到什么程度算是“過了頭”呢？

萬一讀者心中有任何懷疑的話，我必須澄清：從我窺探到的英國秘情單位的規模，和國安部天差地遠。在人數上，MI5的規模大約2000人，另外還有一個2000人的特別部門，而如果我們以一名官員可以管理四個外部人員，而非國安部的一比二來計算的話，該局應該擁有16000名的外圍情報員和線民。在這樣的規模下，每4000名英國成人，才分到一名在背后監視他的情治人員。相較之下，東德每50人中便有一名情治人員。在目標范圍上，英國也無法和東德相較（東德國安部不必處理北愛共和軍的問題，他們對恐怖分子，幾乎采全面支持的態度）。另外，東德方面不必施加壓力，便可獲得民眾的合作；就我的個案而言，大部分線民的動機只是為了要獲得出國機會而已。同樣的情形在英國根本不可想象。難道英國某情報官員會對他的線民說：“伊文斯先生，就在你出國到布拉瓦海岸度假以前，能否先去替我們問瓊斯先生兩件事……？”絕對不可能。英國也無法由恐懼激起人民替情治單位工作之心（英國人會經常懷疑坐在酒店旁邊一桌的人在竊聽他說話嗎？英國本土上有任何人——除了恐怖分子和外國間諜以外——真的害怕MI5嗎？當我的線民“史密斯”嘗試對我解釋他覺得國安部有多么渺小且相對無害時，他就用“就像MI5”為比喻）。

情報單位偵測結果對民眾的影響，英國和東德之間的差異極大(在東德，國安部可以制造極嚴重的后果：如“青年布萊希特”一般無法進入大學就讀，如艾伯哈德•豪夫一般失去工作，如維爾納一般在你的孩子身上復仇，如瓦姆比爾博士一般把你關進監獄，沒有審判就先判下你的刑期，等等）。情報單位所服務的政治體制也不同（國安部被正式稱為“黨的矛與盾”，而它的首要任務便是讓單一獨大的共產黨永遠執政。至于MI5,雖然大部分的工作人員在政治上都偏右，有的還極右，但是仍然無法阻止政黨輪替，有時為保守黨，有時為工黨），情報單位在社會中所占的位置更是不同（國安部不僅是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到最后，它成為設法推動整個系統繼續運轉的力量）。

國安部，一言以蔽之：令人背脊發涼，性感，又好賣。但是，這么說就錯得離譜了。我回想到1980年代時與左派分子的一次爭執。我的“左派友人”——“米夏拉”就是這么記錄他們的——稱呼英國要求政治改革的政治壓力團體為《八八憲章》（Charter88)，以呼應捷克人權運動的《七七憲章》（Charter77)。這個比擬，在我看來，十分不恰當，對愿為信仰出生人死的《七七憲章》創立者的榮譽是一種侮辱。這就好像在自己的胸前掛起一個勛章，上面寫著“英雄”一樣。而且，《七七憲章》的哈維爾再度人獄，團結工會的神父耶日•波比耶烏什科（Jerzy Popieluszko)則被波蘭秘密警察謀殺而慘死。或許再怎么神圣的詞語，最后都不免受到玷污。我有一次看見英國報紙上形容執政黨在下議院的黨鞭，“猶如東德斯塔西的爪牙”。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用別人的壞來襯托出自己的好，基本上是虛偽的、謬誤的。例如，孩子對母親說“這碗湯太難喝，我簡直想吐”時，母親對孩子說：“可是，寶貝，想想看，非洲孩子什么都沒得吃呢。”我注意到MI5局長里明頓夫人自己也不吝使用國安部的例子，來對照她的工作績效。如果你想要讓灰色看起來像白色，最好的方法就是將它放在黑色旁邊。與國安部相較，任何事物都可以看起來很不錯。然而真正應該放在一起比較的，應該是其他西方國家。

在這個標準之下，我發現事態就有一點嚴重了。根據英國秘密情報系統在后冷戰氣氛下最新出版的正式簡介，MI5 1995年至1996年的預算中，只有3%是用在反顛覆活動中。但是從退休及現役的工作人員中，我得到的印象是至少30%。MI5對顛覆的定義為“準備以政治、經濟或暴力手法推翻或毀損國會民主制度的行動”。但是除非到處打探，否則要如何知道別人會有此意圖？

他們把網撒得很大，不僅包括了英國共產黨的每個成員——想必也包括了我的IM“史密斯”，而且還將所有從英國六八世代中成長出來的極左分子，都列入管理行列，這些人包括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社會主義者國際（International Socialists)、IMG、戰斗派（Militant Tendency)等團體的人。另外，所有CND(核裁軍運動）的領導人、國家民權自由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的主要參與者等，也都被建立起檔案。

對了，他們說，大部分被列管的人都不會有什么不良后果發生。就算MI5曾提出明白的證據，指控一名國會議員以前曾經收受捷克情報組織的錢并為它做過事，但英國法庭仍以無罪開釋了那名議員。這的確是事實，而且是重要的事實，但卻不是全部的事實。情報單位有一種負面或他們自稱的“正常背景調查”的東西。也就是說，當民眾去申請某一些特定工作時，在他們并不知曉的情況下，情報單位會將他們的名字與內部檔案相互比對。如果MI5說，雇用這個人必須要承受安全上的風險，那么他非常有可能不會被錄用，而且他們也不會告訴這個人，他不被錄用的真正原因。一般西方國家將這種正常背景調查，運用于一些與安全相關的敏感職務的雇用程序，例如處理國家機密的政府工作，或處理國防合約的私人企業工作。但是，有一些組織，如英國廣播公司（BBC)似乎定期將他們收到的工作申請書，送進MI5做秘密檢查。

這讓我想起來，在1970年代間，一名記者朋友伊莎貝爾•希爾頓，曾想進英國廣播公司的蘇格蘭分公司當記者，但是一直進不去。后來《旁觀者》發現，她沒有通過秘密的“正常檢查”。我打電話給伊莎貝爾，她讓我再度想起事情的細節：英國廣播公司內部，有一個叫龍尼•斯托納姆準將的人，坐在廣播大樓105號房，每天的工作便是將個案送至MI5。對伊莎貝爾最不利的證據，顯然，便是她曾經擔任過一個無毒無害的機構蘇格蘭一中國協會（Scodand-China Association)的秘書。我相信去過那個協會的人，數目絕對比不上我參加過的“英中了解協會”。但是“正常檢查”的負面效果完全無損于伊莎貝爾的職業生涯。不能進人英國廣播公司，她反而有機會去從事更有趣的事情。但是有段時間，她無法確知她為什么得不到那個工作，也沒有機會反駁別人對她的判斷。

不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紳士表示，別忘了，MI5只負責給予建議，最后的決定權在于雇主。這句話不公平。英國廣播公司的人固然聽從了秘密情報程序，并且沒有給伊莎貝爾一個申訴的機會，但是秘密情報組織本身需要檢討的地方也一樣多。為什么它要這么做？因為那僅是“大家都這么做”，因此被認定為后大英帝國體制的正確做事方式？還是因為大英帝國雖已崩潰，但保密防諜仍然是政府內部的不成文規定與合作通則？不過，是否也有可能，在心底，大家還認定“戰爭尚未結束”？無論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幾乎沒有經過任何喘息時間，我們就進入了冷戰。有系統的情報調查是在1940年代末引進英國社會中的。在那時候，連喬治•奧威爾，都幾乎要非正式地向任職于外交部下一個半秘密組織的好友，舉發共黨的同路人。

就算MI5的官員，并不如前MI5官員彼得•賴特（Peter Wright)在《捕諜者》（Spycarcher)—書中所指控的，想要“謀反”，推翻威爾遜首相的工黨政府，每個人都知道在1970年代甚至在1980年代，很多MI5里的人右傾、甚至有濃厚的殖民主義氣息。當時很多人以“叫囂”來形容他們的態度。有什么機制可以制止他們，讓他們不至于沖過了頭？前面提到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們，這時候便滿口仁義道德，說什么“我們整個服務于MI5的道德基礎就是……”“我們的態度是……”“我們這種人……”。也許他們從來沒有從小學校長的陰影下走出來。另外，他們提到，他們受到內政部的嚴格控制：在竊聽電話前必須先申請許可，攔截他人郵件、侵入他人住屋搜索，也必須先得到內政部的公文。任何人都知道，內政部絕非予取予求的。

這話雖然不錯，連彼得•賴特都在書中舉了好幾個例子，證明內政部的家規甚嚴。但是，難道一切就指望在這些家規上了？MI5的一群家伙憑什么覺得自己的行為“合理”、“適當”？就憑著內政部或首相府的另一群家伙不時地查看一下他們的作為？噢，對了，我們不能忘記還有黨里面的政客。但是就算從最理想的英國情況來設想，這一層的牽制作用仍非常薄弱。

習慣、態度當然非常重要。法律和國會控制更是必要的保證。然而，為什么英國兩者都不存在？

自從1989年，世界改變了，英國也改變了。國會通過了限制情報檢查使用于個人的法案，設置了大陪審團、委任官、國會特別委員會等，如果民眾有抱怨的話，更少有地方可去了。而情報單位也在謹慎中適當地開放自己。根據新規定，個人在受到這些單位的“正常背景調查”時，應該先被告知。從個人接觸中，我也感覺到這些單位在管理上有進步，比以前更專業化了。我相信MI5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于應付IRA(愛爾蘭共和軍）炸彈、外國間諜和現在越來越多的有組織犯罪等嚴重威脅社會安全的情事上。但是我們也應該要盡量避免假道學，譴責在背后偵測我們的情報人員，卻享受他們所幫忙提供的安全感。吉卜林有一句名言，提到“嘲笑、愚弄那些當你睡覺時護衛你的安全、穿制服的人”，唯一不同的是，情報人員并沒有制服穿。

然而，經過國安部的經驗后，我變得非常、或許過分敏感，對秘密人員的職權憂心忡忡。我與一名現職的資深官員談到了在新法律和國會架構下的控管方式。“你使用‘控管’一詞，”這官員對我說，“我覺得‘合法確認’更為適合。”MI5決定對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是什么，其他人只是通過法律程序確認他們所設定的優先順序而已。這種做法是對的嗎？

從MI5走出來的男人，散發著一種沉穩的力量：一種從過去、到現在、直至未來都一樣，從因擁有秘密情報而產生的力量。這種力量，因為新科技的發明，必然變得更強了。就在我與資深官員談話之際，我——如間諜一般——窺伺到辦公室的一角放置了一部非常大的電腦，屏幕上掛著成排的圖標，數量之多，比我家中兒子電腦上的還要驚人。我們家的每個圖標，都代表著一個電腦游戲：“碟片世界”（Discworld)、“虛擬都市”（SimCicy2000)、“旅鼠”(Lemmings)等等。不知道他們的游戲是什么？

我想，用不了多久以后，所有的信息都會電腦化。如此一來，那些曾經被待在MI5登記處的少女興奮匯集起來、供我們閱讀的紙質檔案，將何去何從？無論如何，我都想要知道更多有關檔案的事。它們同時也是歷史學家和秘密警察的寶藏。

首先，我想要知道他們到底有多少檔案？

答案：“低于六位數。”

就一個自由國家而言，這數目著實龐大（這還不包括特別部門手上掌握的200萬份個人資料）。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

這么說吧。在冷戰期間，他們想要追蹤每個英國境內的共產黨員和俄國人的行蹤。而這本身就代表了一大堆人。然后，愛爾蘭和其他恐怖分子也在追蹤范圍之內。是的，有五分之一的檔案對象為“非顛覆者”，包括了各種各樣的友善聯絡對象。

而且，檔案中有一小部分，是經常打開而且在作業中的。組織對于什么時候可以打開檔案、應該打開多久，有非常嚴格的規定。事實上，內部有一個交通燈號管制系統：綠色代表積極調查，橘紅代表不必積極地調查，但是隨時有新東西時，要記得加上去，紅色代表關閉檔案。

原來如此。不過，檔案被標示為紅色以后，并不會被銷毀，對不對？

是的，不會被銷毀。

那么，在正常檢查作業中，他們是否會被用到？

嗯，的確。不過許多年以前發生的一些政治小瑕疵，時至今日，是不會被評估為“安全威脅”的。

外部組織是否仍能申請接受“正常背景檢查”？

是的，但是只限于在政府批準的“客戶”名單。

英國廣播公司是否在名單上？

資深官員突然變得語焉不詳，不置可否。

正如我前面所說的，我僅能如夜晚以手電筒觀察大象一般，非常、非常片段地一窺英國情報單位。我事前便知道，除非英國這個國家如東德一般崩潰——我當然不愿意看見這種事發生，我是無法真正知道他們的作業的。不過，我倒為自己得到了一個小小的發現。由于在國安部存有我的檔案，我想要知道MI5是否也保留了一份有關我的資料。我其實并不一定要知道答案，但是既然人已在其中，便不妨一問。

“你們有我的檔案嗎？”

稍事猶疑。深呼吸。他在保密與開放之間搖擺了片刻。然后：“是的，既然你問了，我就告訴你，我們有。你有一份我們所謂的‘白卡檔案’在這里。”所謂白卡就是非顛覆者的意思。

他們保留了我的資料，因為根據記錄，我“曾經協助秘密情報單位SIS”。

哇！我不禁驚嘆，我從來沒有協助過秘密情報單位。在年輕時，我幾乎加入了組織，但是后來又決定不這么做。和秘密情報單位的瓜葛就到此為止了。

我提到了最近有人接觸我的小事件。會是MI5的人嗎？“不，應該是那邊的人。”他一面說，一面向泰晤士河點點頭，眼光落在對岸那一棟綠色玻璃的MI6(SIS)總部建筑上。不過有關那事件的記錄也會保留在這里的檔案中，還有一些我到這里以前，與干員之間的對話。

不過，他說，這是他第一次告訴一個人他們有他的檔案。我可以看得出來，在告訴我以后，他就開始擔心：這種新的開放態度是否做過頭了？

很偶然的，在與他談完話以后，我立刻就將我們的對話做成筆記——就像在與“米夏拉”、克雷奇將軍和其他人談過話后一樣。不過，這一次，我期待與我談話的人也會非常精準地記錄下我們的對話內容，雖然在那一塵不染的咖啡桌下，我看不見有任何錄音機的跡象。

假設他們握有一份我的“顛覆”檔案。畢竟，如果伊莎貝爾•希爾頓能夠因為做過蘇格蘭一中國協會的秘書，就被打上負面記號，我曾經加人英中了解協會，情況應該不會好到哪里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會告訴我嗎？

“通常，我們不會告訴任何人……”他苦笑，“除了剛剛才知道的你以外。”

但是如果我是美國人，我可以在《信息自由法》之名下，申請閱讀我自己的聯邦調查局檔案。為什么英國不行？

是的，首先，MI5必須要有雙倍于現在的經費，才能夠做到對外公開。美國人公開信息以后，才發現所需要的做的事情繁多(過濾、影印、涂黑——讓我想到高克機構內3000多名員工所做的事）。

但是美國人有錢。（他的口氣中不無怨尤。）

而且，這里的情況不同。IRA、國外恐怖分子和其他敵人，可能因此獲得非常寶貴的線索，而且從別人的檔案中，發現MI5的工作模式等等。（我想：是的，這可能是真的。）

那么，老檔案呢？是否對歷史學家開放呢。

嗯，連這個都有困難。只要有了一個先例，就會讓別人知道我們的作業方式。不過，他們想要幫忙。他們希望能夠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檔案開始開放。

隨后，我們討論一些更一般性的問題時，我直截了當地問：我可以閱讀自己的檔案嗎？

不。

為什么不？

因為那是屬于“皇家”的財產。

在大部分國家，你都不能夠看到秘密情報單位中有關你的檔案,但是哪幾個國家會告訴你，那是因為檔案屬于“皇家”資產？

他們另外還舉出了幾個理由。這會設立一個先例。這可能會泄露資料來源。但是，誰會將我的相關信息泄漏給這些人？當然不會是我的朋友或同僚。當然不會。會是那些友善的各地大使館英國“外交官”，在平日的報告之上又把我的事情加上了去嗎？或者，是否可能在1979年我決定不加人他們，與1994年他們再度接觸我之間，檔案中其實什么都沒有？

無論如何，另外一個人好心地加上一句說，打開一份友善聯絡人的檔案有時僅為一種單純的禮貌與致意。但是，當一個人打電話給你，而你根本記不得他是誰時，有何禮貌與致意可言？

“我們今天打開了你的檔案，老朋友——只為了對你致意！”這句話聽在耳里，將是何等刺耳的語言。

在回牛津的路上，我不斷拷問自己。我感覺如何？首先，我感覺非常滿足，因為那是一次事前沒有預料到的成功訪問。如果那個人值得信賴的話，我或許是全英國第一個發現自己有一份檔案在情報單位的人。而我只不過順口問了一句話，就得到這個答案。其次，我感到憤怒。憤怒于他們竟然在背后偵察我。雖然僅非常輕微，但仍然是一種監視。另外，我感覺到淡淡的氣惱。如果他們對我做了一份“顛覆檔案”的話會有多“酷”。這樣我就可以說：你看，國安部和MI5同時跟蹤我。我必定是一個多么勇猛無畏的異議分子！(有很多人因發現自己秘密檔案，而大吹其牛。）但是生活并非如此，至少大部分時候并不如此單純。它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過去從來不完全成為過去。多年以后，當你已經幾乎要遺忘一件事時，它又再度浮現于你的周圍。或許，在某一個角落中，你發現了自己的孩子在另外一個父親的羽翼下成長，或一個檔案在你不知道的角落中逐漸加厚、變大。這些事情你都不會知道。

如果有一天英國檔案被打開時，有多少人會面臨這類的驚奇？制造秘密檔案的人會從他們自己的角度堆積資料。我在我有生之年，從未在有意識下“協助”MI6,但是現在我被告知，他們就是這樣歸類我的。而我開始想象，有一些東德人，當他們打開自己的檔案時，發現被歸類為“友善聯絡對象”或“線民”時，有的會假裝他們并不知情，或故意壓抑了記憶，但是有的是真的不知情。他們是無辜的。

有那么一剎那，我幻想“米夏拉”回過頭來對我說：“嗯，你知道，你們的秘密情報單位也把你列為英國線民！”這當然是一派胡言。她所做的是定期地、詳細地、有深度地報告了所有同事、朋友、家庭的秘密，而她非常知道她報告的對象是秘密情報組織的官員。而我則從來沒有從事過這類的事情——而且，就算曾協助過MI6,我們兩人的事也無法相提并論。幫助像英國這般的民主國家的海外情報單位抵抗東德那般獨裁主義國家，與幫獨裁國家的國內情報單位搜集資料，是兩碼子事。然而，如果我想要對自己誠實的話，就應該不畏懼于在兩者間做比較。

當我搭上5點20分從帕丁頓出發的火車時，內心仍繼續拷問著自己：你難道真的希望自己有一份“顛覆”檔案存在嗎？你真的希望看到那種會將你列為顛覆者的政治存在，而不愿意有你過去和現在所擁有的自由政治氣氛嗎？你難道不想要國安部檔案中非常正確描述的“資產階級自由”政治氣氛嗎？畢竟，你是支持這種政治體制的，對不對？雖然議會式民主有諸多缺點，但是你一樣支持。是的，我毫不猶疑地回答自己：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支持這個體制。

有人說，每個間諜的內心，都存在著一位作家。很顯然，每位作家的內心，都存在著一個間諜。自由國度中的國內情報人員生活在這種職業的吊詭之中：他們必須要侵犯自由，以桿衛自由。但是，我們同時生活在另外一個吊詭之中：我們以質疑來支持這個體制。而這正是我的立場。

# 第十五章  檔案封存

1996年12月，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旅程結束。舒爾茨女士桌上的那份舊式檔案已經成為微軟Word文檔，存放在我面前的電腦中。我的右手邊，鼠標旁邊，放著一杯咖啡。冬天的太陽斜斜地穿過百葉窗，照進房間。我轉動椅子，陷人思考。

為了調查國安部有關我的檔案內容，我歷經艱辛，回到了我自己、其他人、其他國家的過去。連續好幾年，我闖蕩于中歐似乎無盡的記憶之中，測試個人及國家遺忘的能力。一次又一次，我眼看著如奧地利前總統庫爾特•瓦爾德海姆[11](#__3)[1]這般的人，在公眾面前表示失落了整段對過去的回憶，但在各種文件、證言一點又一點、非常痛苦地“提醒”下，恢復了對以往的記憶。

我在痛苦中測試自己對于過去的生活到底還記得多少。即使今天，在將所有檔案、日記、信件等詳細記錄備齊在我面前之際，我仍然需要仰賴想象力，為我重建起過去的生活。就像勒南所論的民族一樣，我們每個人都在記憶與遺忘的不斷組合過程中成長。但是，如果我連自己十五年前的模樣都無法重建起來的話，還有什么資格寫別人的歷史？

那個穿著雙牛津大皮鞋、每天在柏林游蕩的青年“羅密歐”，到底是誰？每個人都像舒爾茨女士一樣，看到人物的代號，就忍不住咯咯笑起來。以前，西德記者喜歡稱呼那些馬可•沃爾夫派到波恩色誘在政府里工作的女秘書的國安部情報員為“羅密歐”。但是那至多只能說是羅密歐被丑化的形象。真正的羅密歐，莎士比亞的羅密歐絕非唐璜或風流才子卡薩諾瓦，更不是什么東德版詹姆斯•邦德之類的無聊人物。真正的羅密歐并非憤世嫉俗，或鎮日只懂得和女人周旋，而是一名浪漫的年輕人：滿腔熱血、充滿好意、立意極高但內心混亂。

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我的代號——我懷疑其實是因為我開一部阿爾法羅密歐汽車而來——湊巧很是恰當。我的確很浪漫，而且不僅對愛，對很多事情都很浪漫。浪漫主義，正如勞倫茨•丹普挖苦地指出，有它危險的一面。浪漫的人很想要幫助他人，但是在過程中，他自己可能會受傷，就好像在莎士比亞的故事中，羅密歐為了阻止他的朋友茂丘西奧與提伯爾特決斗而受傷一樣。另外，羅密歐也很可能因為冒險而受傷，或為了一個不值得的理由而全心投入。

雖然，東德的檢察官或許很容易就根據他們非常寬松的刑法第九十七條，認定我有替“外國組織”搜集情報之嫌，但是我可能從來就不受該法條“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在“非常嚴重情況下可判處死刑”的威脅。到1980年代時，對像我這樣罪名不太深重的敵人，最可能得到的，也就是我最后接受的懲罰便是驅逐出境。然而，那些對曾經與我見面、聯絡過的人，我卻可能造成極大的傷害。例如，維爾納•克雷奇爾，便在刑法第一百條下受到偵察。刑法一百條適用對象是替犯了刑法第九十七條罪行者——也就是我——進行掩護、協助犯罪者，該法條建議刑罰為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至于我對中歐的團結工會及異議分子的支持，20世紀的歷史中，到處都灑著不惜為遙遠國度的政治理想而犧牲的年輕人的鮮血——有為切格瓦拉的游擊隊、有為越共、有為西班牙內戰中的佛朗哥與反對佛朗哥、也有為歐洲反法西斯勢力的共產主義的青年。看看年輕的金姆•菲爾比，在麗絲的引領下成為共產黨間諜，還有R太太，最后竟然成為國安部的線民。年輕的理想主義最后就可能出現這樣的下場。

我實在算是極為幸運的。很幸運能生在這個國家。幸運能有一個優渥的成長背景，有我的父母提供給我這般的教育。我很幸運擁有如詹姆斯和維爾納一般真心的朋友。我很幸運找到我的朱麗葉。我很幸運選擇了我喜歡的職業。同時，很幸運找到了奮斗的理想——為中歐自由而奮斗是一個很好的理想。如果我早生幾年，我很可能會支持紅色高棉，反對美國。如果我生長在東德的巴德克萊嫩貧民區，我可能成為另一名文特少尉。

1939年，托馬斯•曼寫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題目為《希特勒兄弟》。在文章里，曼說，自稱為“藝術家”的他，經過內省以后，發現自己與希特勒之間有許多藝術氣質相同。從這個角度來看，他說，他雖然不情愿，但也必須承認希特勒為他的“兄弟”。我無法讓我自己承認那個替國安部打報告的IM“羅密歐”兄弟，現在成了后共產主義的媒體代表，但是我可以理解我檔案中每個線民，以及每名軍官，甚至克雷奇的行為。當他們對我陳述他們的故事時，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們怎么會做出他們所做的事情：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一個不同的世界。

從檔案中，你會發現，我們每個人的行為受到環境的影響有多深。人的心中所能容納的，可為律法與君王所隨意予奪的那部分能有多大？你所看到的其實并非那么多惡意，而毋寧是人類的脆弱和人性中無盡的弱點。當你和那些與檔案相關的參與者談話時，你發現的也不是那么多蓄意的欺騙，而毋寧是我們無盡的自我欺騙的能力。

在這次尋覓中，我沒有看到一個明顯天性邪惡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軟弱，任由環境塑造他們。人性，他們都太人性了。然而，他們的行為的總和卻是一大邪惡。有人說得好：那些從來不必面對選擇的人，永遠不會知道當自己居于哪個位置，或當另一個獨裁政權再起的時候，會如何表現。這么說來，我們能譴責誰？同樣，我們又該原諒誰？“千萬別原諒，”波蘭詩人茲比格涅夫•赫伯特寫道，

別原諒，因為你實在沒有這種權力

以那些一開始便被出賣的人之名，原諒他們。

國安部的官員和線民也有其犧牲。唯有他們的犧牲，有被原諒的權利。

檔案是一份禮物。當我結束檔案，我心中多了一份“就好像”原則，一份從東歐異議分子身上學來的“就好像”原則：嘗試活在這個獨裁專制政府中，就好像活在一個自由國度一般！就好像國安部不存在一般。不過，我的新“就好像”原則的理論正好相反：嘗試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就好像國安部一直在監視著你一般！想象你的妻子，或你最要好的朋友，上星期六還將國安部記錄上所提到有關你對他們的批評，或你上星期在阿姆斯特丹所做的事，念給他們聽。你能夠毫不感到羞赧地活下去嗎？我的意思是非常嚴重的羞赧。有一點羞赧是無可避免的，而這正是人性扭曲的一面。

為什么有人會變成施陶芬貝格，而有人則變成和希特勒的軍備部長施佩爾一樣的人？經過二十年的時間，我似乎更接近答案一點了。一個清楚的價值系統或信仰？理智與經驗？內在的力量或軟弱？根深蒂固的家庭、社群、民族觀念？我找不出簡單的規則，也沒有簡單的解釋。然而，當那些曾經為秘密警察工作的人，告訴我他們的生活時，我一次又一次地感覺到，關鍵在于他們的童年。例如，我認為黎瑟因為母親的愛，而得到了救贖。不過，作為一名父親，最震撼我的，卻是父親所扮演的角色。

戰后的德國，非常明顯的一個現象，便是父親的缺席：出門打仗去了，在沙場中為國捐軀了，或被關在戰俘營了。有些人的父親是納粹，有的則是納粹的受害者。納粹主義對下一代的心理，產生了非常大的沖擊，并讓他們成為下一回合獨裁專制的目標。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當他們經過童年與成年之間的脆弱年代，在年輕的羅密歐年代中，他們便被獨裁制度網住了。

有時候，國安部成為那些人的替代父親。這種事經常發生。你被叫進校長室，校長介紹你認識一名上了年紀、很有尊嚴、極具啟發力的退役軍人。他引發你的愛國心、年輕的野心和對冒險的饑渴。他成為你的個案指導員、你從未結識的父親。但是邪惡并不僅限于一種面貌。就像是舒伯特為歌德的詩譜寫的《魔王》，邪惡在許多不同的偽裝下，制造出多樣化的誘惑來吸引你：甜美的音樂、鮮麗的花朵、閃亮的華服和有趣的游戲。

我自己也成了父親。不過幾年，我的兒子也將進入從童年至成年的危險之旅，各自到他們的柏林。運氣好的話，他們將永遠不需要面對太多歐洲人在破爛的20世紀中曾面臨的極端抉擇：要成為施佩爾還是施陶芬貝格。但是他們仍然需要面對許多不那么極端的抉擇，而魔王將隨時在一邊，在路旁、在樹影下等候著。

如何為他們做好旅程的準備？和國安部所集合的迷失兒童不一樣的地方在于，當他們出發時，行囊中將有好幾袋愛，一袋是父親的，一袋是母親的。但是，光這樣就夠了嗎？他們還會接受教育，具備了其他時代、其他國家、其他信仰下的知識。我所知道的國安部軍官，生長于窮困、被占領的土地，接受狹隘的教育，終身都被關在圍墻之后，只知道接受上面交代的世界觀，卻不知道如何去質疑。

當然，一個人即使有豐富的知識，仍然可能因別人有不同的思想或行為而迫害他們。這就是我從哲學家伯林身上學習到的。他告訴我們，只有在發現人類文化之多元，看見不同的人所追求的目的是分歧，而且是無法妥協的以后，我們才會看見自己的信仰與做事的方法的相關性。從這里開始，我們知道了容忍。在那篇著名論文的結論中，以賽亞•伯林引用了另外一位作家的話：“文明人與野蠻人之間的分野就在于，文明人知道自己的中心信仰的相對性，但是卻毫不退縮地捍衛它。”

但是，還有一個更困難的問題需要解決。我們要如何建立起一個對與錯的思想體系，而這個體系必須堅定到，當我們生長環境中所認定的對與錯體系與這個體系不同時，能夠挑戰舊的體系，面對那個深植于權力體系中的價值？當我們知道我們心目中的信仰只是“相對性”正確時，我們要從哪里得到那樣的勇氣，“毫不退縮”、甚至不怕面對死亡？而且，我們應該如何將價值，同時也將那份勇氣，一起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我在電腦的光碟機內，放進一張唱片，并用鼠標在屏幕上點了一下“播放”鍵。從我剛正在打字的文件后面，傳出了菲舍爾•迪斯考在1958年冷戰高潮期間所唱的那首舒伯特有關魔王的黑色歌曲。任何一個父親能夠聽了而不覺感動嗎？

父親在黑暗中御風而行，他的孩子在他的懷中。他緊緊地抱著孩子，保持孩子身體溫暖。他的聲音強壯而穩重。然后，精靈王在黑暗中現身，用最美麗的詞句引誘著孩子，告訴他那些鮮麗的花朵、閃亮的華服和有趣的游戲，還有他的女兒會如何擁抱你，與你共舞，為你吟唱，一直到你睡著為止。而如果你不愿意的話——他的聲音突然變得嚴厲——那么他就必須使用武力了。在威脅性十足的音樂背景下，孩子呼喊著：“噢，父親，父親，他正要抓我。”父親不顧生命，全力前行。他終于回到了家中。他的聲音轉弱，到幾乎難以辨識的細微：“在他的懷中……孩子……死了。“

我將檔案以“羅密歐”之名存在電腦中，關上門，去找我的兒子。

# 修訂后記

本書距離第一次出版已有十二年，期間斯塔西（Stasi,即國安部）被全球公認為“秘密警察恐怖”的代名詞。一位德國批評家戲稱，希特勒是最能代表德國形象的輸出品，現在看來，斯塔西也不遑多讓。如今，人們提到納粹（Nazi)就不得不提到斯塔西。兩詞在英語中韻腳音近，仿佛孿生兄弟一般。

德國因為斯塔西被貼上了另一個邪惡標簽。但這恰恰是民主的德國敞開心胸，披露其20世紀第二次獨裁統治，并將一切攤在陽光下供世人檢視的結果。這不啻為一種諷刺。或許，德國這一舉動，是人類有史以來對獨裁罪行最果斷徹底的揭露。然而，這一過程中，斯塔西在人們內心中的形象，也漸漸從歷史事實轉化為某種近乎神秘的事物。

我遇到的很多人都看過《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這部電影在人們對斯塔西的印象轉變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我也多次在其他地方提到這部電影（這里不再贅述）[12](#__12)[1]。的確，這是一部才華橫溢、引人人勝且富有教益的影視作品，但卻賦予了東德好萊塢式的色彩。正如本書所述，現實遠比電影無趣。我們對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筆下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13](#__13)[2]已經耳熟能詳，但我們仍要明白：一般而言，邪惡降臨時并不會腳蹬皮靴，手持皮鞭。

無論如何，結果變成了這樣：針對世人將東德與斯塔西畫等號的看法，我們有必要去糾正，東德不等于斯塔西。人們對斯塔西的普遍誤解，迫使我常常提出反對的意見。比如，1979年很多西方觀察家忽視斯塔西，而我卻一再堅持：東德仍然沒有擺脫秘密警察的控制，我們不該忽略斯塔西！而到2009年，我卻說：沒錯，東德過去的確有秘密警察，但秘密警察并非東德獨有。

本書內容穿插于德國與英國之間。德國部分，我幾乎沒有添加新內容。一方面我渴望加入新內容，希望與海因茨一約阿希姆•文特談談。他是與我的檔案形成最直接相關的斯塔西官員，也是唯一不和我見面的斯塔西官員。今年年初，柏林墻倒塌二十周年之際，我再次通過老友維爾納•克雷奇爾（也就是“山毛櫸”）聯系他——用斯塔西的話說，這叫Kontaktversuch(嘗試接觸）。文特在電郵中禮貌且堅定地回絕了請求。他說自己是德國北方人，脾氣倔強，此外，時過境遷，自己已經記不清很多事情。或許，到2029年，他會拗不過我這個北歐人，與我對坐長談。到那時，我們兩個糟老頭會啜著苦咖啡，發現自己忘掉了所有事情，又或者，我和他都只能像小說家那樣，靠虛構的回憶填補歷史空白。

不過，文特通過電郵向我透露了一個意外信息。他回憶說，國家安全部部長埃里希•梅爾克看到我對東德的描述后大為光火（那時我第一本關于東德的書正在西德《明鏡》雜志連載），并表示“無法容忍我繼續留在民主德國”。于是，由文特少尉簽署，并于1982年1月6日下達的一紙命令，使我無法再進入民主德國，同時這位安全部長下令，禁止我通過連接西德與西柏林之間的通道。我原以為這只是民主德國的官方禁令，如今才知道這是梅爾克的私自決定。對此，我深感欣慰。我希望我在《明鏡》連載的內容好好惡心一下這位安全部長，讓他無法安逸地享受早餐。不過，現在梅爾克已經過世，一切都淪為了陳年舊事。

至于英國部分，我原本不打算增添新內容。無奈的是，我還是做了增添。因為“斯塔西”已經成為今日英國的流行詞，因為這個曾經是全球最自由國家之一的英國，如今它的公民自由隱私正遭到侵犯。2009年年初，一場主題為“現代社會自由”的集會上，公民權利和自由活動團體領導人沙米•查克拉巴提（Shami Chakrabarti)指出，英國人驕傲自滿、放松警惕，“歐陸人則因為對納粹和斯塔西的記憶而居安思危”。此外，一位前安全部門首腦在《金融時報》撰寫文章，警告英國正處在滑向警察國家的邊緣。那篇文章的標題即為“斯塔西國家”，無需解釋，每個人都知其所指。

不過，我們每個人（假如不是太蠢，沒有患上妄想癥）對標題的真實含義都心知肚明：英國并非真正的警察國家。1997年，本書首次面世，工黨也開始上臺執政，從那以后，有兩股勢力的發展為民眾自由敲響警鐘。一股源于技術，一股來自政治。技術對自由的侵犯源自電腦數據庫、監控攝像機、個人郵件、網絡搜索記錄、移動電話記錄追蹤、電子醫療卡和信用卡記錄、政府基因庫、生物指標、Facebook和MySpace等社交網站的個人信息、精確衛星圖片、微型和超敏感定向傳聲器，等等。假如國家和公司將這些技術設備加以利用，進行所謂的數據或真相挖掘，那么對私人生活的監控侵犯也就易如反掌，這也是埃里希•梅爾克做夢都無法企及的（不妨假設一下，如果斯塔西掌握了這些技術，那將是怎樣一番情景）。由此可見，技術約束自由的可能性，已呈指數級增長。

另一方面，在恐怖分子襲擊紐約、倫敦、馬德里后，英國政府以提升國家安全級別和保護公眾生命為由，強化了技術應用，限制個體自由，包括未經審訊羈留、約束自由言論、入侵隱私合法化等等。這種將安全置于自由之上的趨勢也體現在其他領域。比如，以健康和安全的名義制定一系列荒謬瑣碎的規定，把成年人當孩子，把孩子當嬰兒。其他自由民主國家也多少走過類似道路，但很少有政府會像1997年后的英國那樣走得如此之快、如此之遠。我在本書第十四章提到，我和英國MI5的前局長談到本書。我問他MI5掌握的個人資料有多少，他答道：“不下六位數。”我想，現在MI5手上的個人資料恐怕更多了吧。

英國反恐策略的設計師大衛•歐蒙德（David Omond)爵士認為，打擊現代恐怖主義和組織犯罪，需要侵入性的監控和調查方法，不但監控那些實施或準備實施犯罪的嫌疑人，對沒有任何嫌疑的人也要嚴加監視，而這一切都交由一個以管理混亂、遺失資料聞名的英國官僚機構完成。

三十年前，我前往東德居住。我確信自己正從一個自由國度來到一個毫無自由的國家。那時候，我希望我的東德朋友能享受到比我們更多的權利。事實上，到了今天，東德人對個人隱私的保護比我們英國人更好，而這恰恰是因為德國議員和法官親身體驗過在納粹和斯塔西監視下生活的滋味，因此他們比我們英國人更加珍惜這些權利。這也證明只有生過病的人才會感受到健康的可貴。

我再次重申：英國不是一個秘密警察國家。這點毋庸置疑。我們有民選代表、獨立法官、自由媒體。我們可以通過他們抵御政府對個人自由的干涉。但是，如果我們將斯塔西作為一個警示，促使我們警惕對個人自由的侵犯，那么，斯塔西勢必會帶給我們一些福音。

蒂莫西•加頓艾什，2009年3月于牛津

注釋

[[←1](#1)]

[1]巴布拉克.卡爾邁勒（BabrakKarmal),時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國總理。

[[←2](#9H5K1_ba8e26cf39784ac5a81deafac6)]

[1]羅曼.維希尼克（RomanVishniac,1897—1990),著名猶太攝影家、生物學家，在1935—1939的四年時間里，系統地拍攝了中東歐猶太人聚集區及一些猶太村落的生活場景。這些影像保留至今，為人們研究當年猶太人的艱難處境和整個猶太民族苦難史提供了詳細的圖片資料。

[[←3](#3)]

曼弗雷德·施托爾佩（ManfredStolpe),生于1936年，兩德統一后曾任德國交通、建設和住房部長（2002—2005)、勃蘭登堡州州長（1990—2002)。

[[←4](#4)]

[1]魔鬼山（Devil’sMountain)，德語為Teufelsberg,位于西柏林的一座小山，是由二戰期間被摧毀的房屋廢墟堆積而成的，高出周圍的勃蘭登堡平原約八十米，山頂上的白房子是當年美軍占領地，冷戰時期是反蘇的前沿陣地，配備有當年最先進的監聽設施。

[[←5](#5)]

[2]布羅尼斯瓦夫.蓋雷梅克（BronislawGeremek),曾是波蘭團結工會領導人瓦文薩的重要顧問，1997—2000年擔任波蘭外長，2004年以后擔任歐洲議員。2008年因車禍不幸身亡。

[[←6](#6)]

[3]約瑟夫.蒂施納（JdzefTischner,1931—2000),波蘭神父和哲學家，1981年在巴黎出版了《波蘭教徒的對話》，后被譯為德文，標題為《不可思議的對話：波蘭的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1999年，波蘭總統授予蒂施納白鷹勛章。

[[←7](#Di_Shi_Yi_Zhang___Fu_Shi_De_Qun)]

[1]姬達.謝利尼（GittaSereny,1921—2012),匈牙利出生的英國傳記作家、歷史學家和記者。她的寫作主要集中在大屠殺和受虐待的兒童。著有《德國創傷》（The Germa Trauma)等。

[[←8](#8)]

[2]Niche 一詞來源于法語。法國人信奉天主教，在建造房屋時，常常在外墻鑿出一個不大的神龕，以供放圣母瑪利亞。它雖然小，但邊界清晰，洞里乾坤，因而后來用來形容大市場中的縫隙市場

[[←9](#9)]

[3]指東德政權垮臺給東德帶來的政治、經濟轉變。

[[←10](#10)]

[1]薩爾曼-拉什迪（SemanRushdie),小說《撒旦的詩篇》的作者，該小說引起極大爭議,受到穆斯林世界的抗議，作者遭到暗殺威脅。

[[←11](#11)]

[1]庫爾特•瓦爾德海姆（Kurt Waldheim,1918—2007),著名外交家，曾任聯合國第四任秘書長，奧地利外長，奧地利總統。在被選為奧利利總統后，其在二戰期間與納粹之關系的個人歷史問題被媒體和公眾質疑，成為輿論熱點。受奧地利政府委托.由多國歷史學家組成了國際歷史學家調查委員會，專門調查此事，調査結果顯示，沒有査到瓦爾德海姆參加納粹黨的證據。

[[←12](#12)]

[1]參見拙作《我們頭腦中的斯塔西》，載拙著《真相即顛覆》的簡體中文版，已納入“理想國譯叢”出版。

[[←13](#13)]

[2]取自漢娜•阿倫特1963年的作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平庸之惡的報告》記述前納粹德國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審訊的過程。阿倫特在書中嚴肅指出，歷史上的罪惡大多由普通人犯下，而他們往往并不認為自己當初的罪行是作惡。

[[←14](#14)]

[1]瑪德萊娜蛋糕（Medeldna)系法德交界處洛林（Lorraine)地區的傳統甜點，法國大文豪普魯斯特幼年時期經常與姑母配著花果茶共享的扇貝型小蛋糕，在他撰寫《追憶逝水年華》一書時，瑪德萊娜蛋糕的美味往往勾起他強烈的鄉愁，讓他文思泉涌。

[[←15](#15)]

[1]金姆.菲爾比（Kim Philby,1912—1988),原名哈羅德·艾德林·拉塞爾·菲爾比（Harold Adrian Russell Philby),系英國“劍橋間諜圈”（Cambridge Spy Ring)中知名的“第三人”(The Third Man)。1934年間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和其他兩名同學柏吉斯（Guy Francisde Mincy Burgess)和麥克萊恩（Donald DuartMacLean)為蘇聯諜報單位吸收，三人分別潛伏與滲透到英國情報機構，為敵方工作幾達三十年，其中菲爾比曾經被喻為“本世紀惡行最為重大的間諜”。菲爾比在1941年進入英國秘密情報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簡稱MI6)，隨即多次獲得組織拔擢，稍后并晉升為MI6第九組首腦，負責對蘇聯反間諜滲透工作，在菲爾比內神通外鬼的協助之下，英國不但對于蘇聯間諜活動一籌莫展，己方情治單位還經常為敵方破獲。金姆•菲爾比最后在1963年，自知即將被捕之前，畏罪潛逃到蘇聯。

[[←16](#16)]

[2] 中國習慣上譯為“偵查部”

[[←17](#17)]

[1]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1905—1981),德國建筑師與納粹行政官員，也是少數加人該黨的知識分子之一。1940年代掌管相關軍需與經濟方面事務，效率之高，使得德國的經濟生產達到史無前例的最高紀錄。德國戰敗后，他被判將近二十年的監禁，1966年方獲釋。

[[←18](#18)]

[2]包豪斯（BauhauS)藝術學派：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藝術學派之一，包豪斯設計學校創立于魏瑪，其目標不僅在于拉近手工藝與藝術之間的距離，還強調手工藝和科技之間并沒有無法調和的矛盾，以講求建筑功能、技術和經濟效應為特征來創造最實際的解決之道，也就是將教學和學習、理論和實務都融合在一起，這至今仍是現代建筑和工業設計的指導原則。

[[←19](#19)]

[3]包豪斯設計學校在1933年遭納粹政府關閉，訛指該學校系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溫床。前東德時期又因不容于“社會寫實主義”，一直遭到當局打壓，直到1977年，原始的包豪斯設計學校校舍才改建成博物館并展出作品。

[[←20](#20)]

[4]恩岑斯貝爾格（Hans MagnusEnzensberger)，生于1929年，系詩作、散文、戲劇與文化評論之多產作家，1965年創辦并編輯《讀本》雜志，對I960年代的學潮極具影響力。其重要著作除《泰坦尼克號沉船記》外，也曾撰寫《數學小精靈》（The Number Devil) 一書。

[[←21](#21)]

[5]施陶芬貝格伯爵（Count Stauffenbery),德國貴族后裔，二次世界大戰時擔任德國軍官,1944年行剌希特勒失敗后遭槍決。

[[←22](#22)]

[6]麥考萊爵士( Sir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國史學家、文學家、政治家，維多利亞時代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張漸進式的改革,倡導英國議會政治,宣揚進步的歷史觀,其傳世之作《自詹姆斯二世登基以來的英國史》,對于英語系國家歷史意識之覺醒有相當重要的貢獻。

[[←23](#23)]

[7]以賽亞·伯林爵士( Sir Isaih berlin,1909-1997).英國社會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其著作主要在討論個人意志,其中《兩種自由概念》對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分辨,評論家公認可以媲美約翰·穆勒的《論自由》。

[[←24](#24)]

[8]盧蒙巴( Patrice Lumumba),剛果民族解放運動領袖和剛果民族運動黨主席,為剛果1960年獨立后的首任總理,同年發生政變,遇刺身亡,在第三屆全非洲人民大會上被追謚為非洲英雄。

[[←25](#25)]

[9]羅莎·沃茲尼考斯卡(Roza wozniakowska),生于1954年,波蘭女政治家,曾擔任團結工會學生委員會發言人,加入援助政治犯及其家庭的工人防御委員會。現為歐洲議會波蘭代表

[[←26](#26)]

[10]瓦迪斯瓦夫·巴托謝夫斯基( Wladyslaw Bartoszewski,1922-2015).波蘭外交部長(1995;2000-2001).1940-1941年被關押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里,后被波蘭紅十字會營救

[[←27](#27)]

27[11]人們通常把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頒發的三個級別的圣米迦勒及圣喬治勛章——CMG、KCMG、GCMG理解為，CMG是Call Me God(叫我上帝），KCMG是Kindly Call Me God(請叫我上帝），GCMG是God Call Me God(上帝叫我上帝）。

[[←28](#28)]

28[12]馬科爾·蒙格瑞奇（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英國記者、作家和藝術家。二戰期間，曾當過士兵和間諜。1969年，拍攝了一部以特莆莎修女為題材的紀錄片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

[[←29](#29)]

[13]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德國基督新教神學家，重視現世及人類自身的能力，反對納粹干涉教務與排斥猶太人，因參與暗殺希特勒行動遭到處決。

